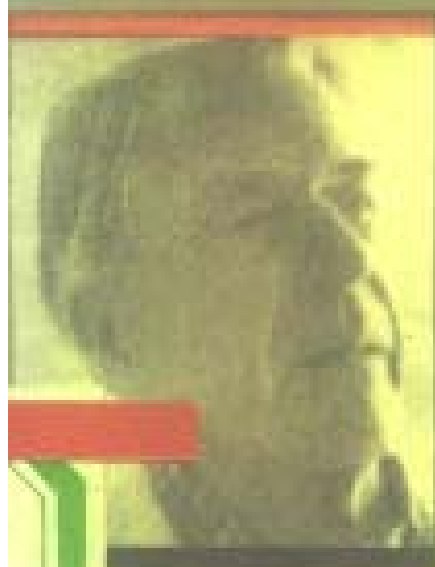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COEXISTENCE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与 和平共处



——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

〔美〕加尔布雷思与〔苏〕帕希科夫对话录

武汉大学出版社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

——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

[美]约翰·K. 加尔布雷思 著
[苏]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

刘绪贻 刘 末 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Coexistence

From the Bitter Past to a Better Prospec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Stanislav Menshikov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

1988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

——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

(美)约翰·K. 加尔布雷思 著

(苏)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

刘绪贻 刘 末 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6.625 139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 000册

ISBN 7-307-00389-9/D·58

定价：2.30元

译 者 序

世界在不断地、迅速地变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不断地、迅速地变化。这些变化牵动着世界上亿万人民的心，引起人们无穷无尽的关注和忧虑，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思考。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改革的性质是什么？改革的困难何在？改革的前景如何？

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在经过本世纪30年代空前危机以后不独没有消亡，反而不断提高生产力？为什么在经历1/4世纪的繁荣之后资本主义又陷入困境、不得不寻求自我调整的新途径？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如此之久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也有其长处？它的前景如何？

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的交往日益频繁，世界各国日益相互依赖、日益广泛和密切联系，那么，牵涉到全世界1/3人口的社会主义制度和2/3人口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是继续进行冷战呢？还是进行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是对抗呢？还是对话？这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也往往使那些

悲天悯人的人士夜不能寐。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和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加尔布雷思半个世纪以来名满国内外，他的著作被译成10余种语言，销售量达数百万册。缅希科夫现为《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编辑，对苏联经济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具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其著作亦深受欢迎。他们两人都曾从政，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两人相识近1/4世纪，为加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理解，为把两者“辛酸痛苦的过去”变为“较美好的未来”，他们于1987年有计划地进行了约10天的交谈，并于今年将讨论成果用英、俄文分别在美、苏同时发表，书名直译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共处》

(译者据书中所谈内容，译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此书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的反响与关注。由于他们二人对世界和人类前途非常关切，都较能不囿于成见和各自的信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两者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虽然只是两家之言，我们也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有助于我们摆脱旧框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两者的关系，并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参考。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原因。

本书除第3、13、14、15等章由刘末翻译外，其余均为刘绪贻翻译；刘绪贻总校。

刘绪贻

1988年12月1日于珞珈山

美国版序言

24年前，我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参加一次文化交流会议。有一天，我和我的几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同僚——戴维·洛克菲勒、诺顿·西蒙、诺曼·卡曾斯、巴克明斯特·富勒——到美国大使馆官邸斯帕索大厦去参加午宴。在座的苏联朋友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是一位知识非常丰富的学者，他对当时可说是初人晚景的赫鲁晓夫政权的政策，向我提出了一番深刻的评论。他对美国的经济事务几乎同样熟悉。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他在莫斯科大学所授的课程。

从那时以来，我和缅希科夫交往不断；我们相遇于莫斯科、纽约（他在那里联合国任高级官员6年）、剑桥和佛蒙特。当多少有些出我意料地我的两本书——《我的回忆录》和《新工业国》——由一位苏联出版商发售时，我发现这是受到缅希科夫的鼓励；他通过这种办法成为我的赞助人。

我们最近一次约十天的会晤，是1987年迟夏在佛蒙特举行的。每天下午我们共同考虑第二天上午的议题。每天上午我们讨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成为本书一章或一章以上章名。我们的计划是：将这些探索的结果，大体同时在苏联和美国发表。这正在成为事实。我们更深一层的目的在于表明：具有不同观点的美国人和俄国人，能够对于我们不同但却共有

的问题，进行民间的、而且我们希望是有教益的讨论。也讨论我们在这个日益紧密互相依赖并日益缩小的世界共同生存的条件和迫切需要。我们还力求在讨论这些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时，不要太严肃，要有些轻松气氛。一定程度的超脱、甚至消遣，和运用深刻的智慧，并不矛盾。

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我们的讨论会于去年8月举行。书的出版、好书的出版是一个高度精密的过程。在一本书出现在书架上之前，可能发生很多的情况。当我们上次的讨论进行时，10月19日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尚未出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对华盛顿的访问尚未进行。在这次访问中，美苏签订了中程核武器协定，总书记还和美国几个不同的官方和非官方团体进行了会晤，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所有这些，如果发生在我们讨论之前，我们无疑将涉及。但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过，一本书不象报纸或电视那样，可以评论昨天发生的事件。我们选择讨论的问题有一种持久性；我相信它们决不会是明日黄花。

还有些次要事情应当谈谈。在过去数十年中，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行为，已深深渗入我们的文化之中。它有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在学术界或者说文化界的既得利益也不少。人们总是认为，所有苏联发言人都是其上层官方的工具，最多不过是无休止的欺骗。那些和苏联发言人争论的人，要么是自己受欺骗，要么是可怕的天真。

我生性对这种反应是宽容的。我说过，这牵涉到一种信仰的寿命，它将受到保护。但有些人从与苏联人持续紧张的关系中得到更大的利益——经济的、军事的、官僚政治的。这些人也时刻准备着进行批评和谴责。的确，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大家都是我们自己过时的信念、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俘虏。因此之故，我就不那么固执己见。我个人坚信，在我们的时代，民间的会话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必需的；本书对此仅作了即使不是适当地、也是充分地表述。共存的重要性应该得到更多、更大、更高的承认。而且，诸君不用相惊：我不相信在讨论中总只对一方有利。

不过，在会话中得分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苏联合作者的。我们不把这些会说看成一方取胜、一方失败的争论。我们把它们看成对于我们同样希望共享的更大胜利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和共同的生存。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1988年1月

目 录

译者序.....	(1)
美国版序言.....	(1)
一、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1)
二、现时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减缓 的原因.....	(18)
三、现时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减缓 的原因(续).....	(27)
四、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是革命？.....	(44)
五、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是革命 (续)？.....	(57)
六、资本主义的回顾.....	(66)
七、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	(78)
八、“加尔布雷思改革”.....	(94)
九、资本主义的前途.....	(110)
十、社会主义的前途.....	(120)
十一、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134)
十二、超级大国综合症.....	(144)
十三、和平共处的条件.....	(156)
十四、合作的项目.....	(176)
十五、合作的项目：结束语.....	(193)
关于作者.....	(198)

一、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约翰·K·加尔布雷思（以下简称加） 又在美国和佛蒙特见到你，非常高兴。作为主人，我先提问可以吗？美——苏关系和美、苏两国内部状况固然影响世界，然而，为什么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既有趣而又有益呢？

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以下简称缅） 我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人类文明史的一个转折点。有一个极其显著而又异乎寻常、但有些人只是近来才发现的事实：美国和苏联、两个代表两种不同且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强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可能引起人类文明以至两种制度的终结。可能许多人、或者甚至多数人尚未认识这种情况。人们面临着与此不同而且更为迫切的问题。世界上有的人在挨饿，他们想的是食物，想的是怎么活得下去。另一些人处于局部内战或争取民族主权的战争之中。还有些人处境较稳定而且过得去，他们想的主要是更高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核威胁似乎也很遥远。

加 我同意，但还要加一点我以前常说的想法：在核战争的余殃中，即使是对那些是讲究意识形态的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也不会明显。

不过，更紧密联系实际来说，当前苏联、或者还有美国

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是要求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进行讨论吗?

緬 对,我想是的。但先让我把我要说的观点说完:尽管大多数人尚未认识到人类文明可能因为核战争受到灭亡的威胁,但这是事实。因此,重新考虑问题的时候到了。我们必须再一次考察一下两种制度的关系和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有没有核战争,两种制度还将存在;而且,即使我们避免直接对抗,它们仍然存在。制度不会停止存在,所以我们之间总会有问题。

加 让我就此进一步提个问题。我同意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将继续存在,但是,我们是否真正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只有那些深患妄想症的人,才真正以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将接管美国或西方国家呢?而且,不管目前苏联发生什么变化,如果以为它将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是愚蠢的呢?

緬 为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应进一步深入了解两种制度当前的情况。不过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两国必须学会共处;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不管我们是否认为各自的制度优越于对方的制度,或者相信自己的制度将最终取得胜利。

加 我同意,而且无疑我们也必须允许自己有那种使我们双方快乐的优越感。

但是告诉我,近来的变化是否使目前成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年代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戈尔巴乔夫先生推行的改革。你认为那些变化具有决定性的的重要性吗?

緬 我认为那些变化实际上是革命性的。我们国家的许多人谈论着象70年前发生的十月革命那样的第二次革命。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这个特殊论点,但事实是,近

来的变化在整个苏联被认为具有革命性质，而且影响深远。

加 这是我们的读者想多听听你的意见的事情。至于美国，我不认为目前发生的任何变化特别具有决定意义。不过我有一种感觉：也许我们濒临一种新事业的边缘，也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在其中存在缺陷的某些领域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们大城市失业问题、少数民族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失业问题有新的关注。我也希望对农业和我们认为日益僵化的较陈旧的大规模生产工业的危机有新的关注。我们有太多的人无家可归或者居住条件太坏。我认为我们即将承认这些问题以及和这些问题同样严重的其他问题。所以人们可以说，当苏联宣布它的革命时，我们的革命也在望。

緬 对。不管一个人对自己的制度怎么想，不管是否大家都承认必须变革，事实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面临危机或前危机形势，目前都处于一种严峻的必须重新估价的时期。这是在两个社会中都在发生的情况；社会主义如此，资本主义亦然。两者都经过许多种成功和失败。但是，由于认识到核战争和世界上发生其他重大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比如富国和穷国的鸿沟以及超级大国和较小国家的不协调关系），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必须重新估价。危机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实在需要变革。

加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一点与我们的讨论非常有关。我记得，在我过去对你们国家的历次访问中，就象你过去对美国的许多次访问中会记得的那样，双方都有些人有一种倾向；他们说：“我们这里是一切美德的中心，你们那里是一切罪恶的中心。”这种倾向不容许我们进行有

益的讨论。现在，我希望我们各自的发展已达到多少更为成熟的阶段。我们双方都能坦率地看待我们共同的问题——比如我们巨大工业官僚机构的没有效率，都能看到我们双方还有多少问题需要解决。

緬 我希望我们两国、两种社会制度将来进行合作。不管我们是否不同，不管是否一方有罪一方有德，我们必须在关系我们双方的事务中进行合作，还不仅仅是在防止核战争的努力方面。比如世界上的麻醉品问题。

加 或者酒精中毒问题？

緬 或者环境问题，或者能源问题，或者人口爆炸问题，等等。

加 或者如我刚才所说的工业官僚机构问题。或者吸引人们从事地位低的工作的困难问题。我们双方都能承认这一事实：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谋求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象你和我现在避免这种劳动一样。

但是，为了我们下面的讨论，让我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苏联和苏维埃制度时，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在什么时候应当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人们一直告诉我，共产主义是一种最终的、但尚未实现的情境；当我们提到现时苏联经济时，我们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对吗？

緬 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是一种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共产主义是未来的理想社会，其特征为物资极其丰富，分配实际上是免费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资是根据每个社会成员所付出的劳动分配的。

加 而且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已经消亡。我认为，

你并不坚持在苏联国家已经消亡了吧？

緬 没有。不过即使已建成共产主义，国家也许不完全消亡。这完全以人们对国家职能的看法为转移。让我们过一会再讨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是否有必要保留中央计划的职能。

加 你是说我提到马克思的论点时太拘泥于字句吗？

緬 不是。我所说的是：马克思说的国家消亡，可能意味着国家的某些职能的消亡。比如说，如果彻底裁军，公安工作或者防务工作就会消亡。然而从经济管理来说，国家也许还有些职能。

加 我想你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修正马克思主义，但这是完全允许的。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让步。

緬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进行修正。

不过，严肃地说，当我们谈到重新估价时，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应当经常重评作为我们存在基础的理论。

加 我完全同意。牢牢把我们束缚在 18、19 世纪思想框框里的想法，是没有一个明智的男人或女人能够接受的。

緬 那么，就出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任何一种活的制度时时经历变化，是正常的；我们必须试验新的组织形式，以便取得新的生命力。

加 我记得马克思说过，社会处于经常转变的过程之中。

緬 确实如此。

加 记住马克思的这句话，让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社会主义史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自从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俄国出现以来，到现在已 70 年（多或少几星期）。你是怎样看列

宁时代以来社会主义的变化的？

繙 开始我想说，在过去的70年中，社会主义已表明自己是一种发展而有生命力的制度。

加 假如你说它是一种没落或静止的制度，我将感到惊奇。

繙 自然，有些人的确声称社会主义处于总危机过程之中，但让我稍为证实一下我的论点。自从1917以来，社会主义在许多而不仅是一个国家得到发展。欧洲有，亚洲有，美洲有，在某种程度上非洲也有。牵涉到的总人数很多。世界上约1/3的人口目前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象包括世界2/3的人口的资本主义一样的国际体系。1/3属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比例。

加 我认为我注意到，当你提到非洲国家时，你声音里有些犹疑。我想你是把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看成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却不会同意在有资本主义之前会出现社会主义，他会吗？

繙 当然马克思不会。但是，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是这样的国家，它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却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它们甚至力图避免资本主义阶段。实际上，埃塞俄比亚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蒙古是第一个。我的犹豫，是由于考虑是否将它们称为准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尚未成功。

加 让我们回到原题上来，谈谈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情况。

繙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巨大的经济进步。首先，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仅次于美国。我认为，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加起来，约包括世界总人口的 1/3。

其次，对相当一些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是它们取得国家主权的途径。

加 你这是什么意思？

编 我的意思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实际上由于向社会主义转变才获得独立的。以前，中国虽然不真是一个殖民地，但却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

加 这一点我承认。

编 古巴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这一点很重要，它们走向民族解放的运动，是和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它们迅速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

加 我将在下面强调：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苏联的影响一直在下降，正如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的影响在下降一样。25 年以前，苏联在中国、北非、甚至东欧的影响，比今天的大。

编 我现在谈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任何一国的影响。对我来说，中国只是另一个独立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它至多不同于苏维埃制度，而且如任何人所知，它是绝对独立于苏联的。这不是我们的影响或中国的影响的问题；这是社会体制的问题。从社会体制来看，中国是或多或少沿着类似于我们的路线前进。

我以为，作为一个制度，社会主义已表现出的最重要优越性之一，是它产生一个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社会——一个力图带给其全体成员以正义、平等与公正的社会。

不过，让我再举些我所认为的其他与社会主义俱来的优越性。首先是经济上非周期性的、没有危机的发展的成果，

它们与集中计划分不开。当中央计划组织得当时，它的巨大优越性表现在能够按照必要的战略指导原则重新分配资源，而不致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混乱。也有可能使经济沿着最理想的道路前进，保证最充分而且最有效地利用所有生产资料。

当然，那是理想的情形，但我却看到，在许多情形下，我们脱离了这种最理想的途径。不过，这条途径存在，这种努力存在；而且有许多方法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几十年来非常迅速地发展着，一直到最近。

我将在后面谈社会主义的问题，谈苏联的困难和我们称为前危机的形势，但我愿以谈它的成就开始。

加 我想，我们都承认，从经济方面说，在过去70年中，你们国家从沙皇原始经济出发，已经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缅 如我所见，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就业的优越性，是很大优越性。社会主义一直能够实现人类最高愿望之一：充分就业亦即消灭强制失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有暂时失业，人们从一个工作调换另一个工作。在某个一定的时间，这样的人的人数甚至可以很多，但至少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曾有过由于短期周期危机或者长期结构危机造成的突然关厂或大规模开除职工的危险。我认为这是一种巨大优越性。但是，这个论点近来正在苏联引起争论，因为有些人认为，没有强制性失业，就会造成无纪律现象。

加 还有更多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你要说吗？

缅 的确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社会保障的优越性。在苏联，有许多免费的或部分免费的服务。这些服务不是通过某种市场手段保证的，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其职能自动得到保证的。

加 比如说，那些服务？

緬 比如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大规模的每人可以得到的津贴、享受娱乐设施的机会、低价住宅。

加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的，你同意吗？

緬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的。一直存在着沿这些路线进行的运动。

加 你是说，在社会主义世界，福利国家比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得快得多，而且多少更完善吗？

緬 我认为建立得更完善、更迅速，而且是作为一种通例建立起来的，不是例外。美、英福利国家和苏联福利国家不同。比如，你们美国没有免费医疗，或者只在某些方面免费。

加 不是完全免费，但我希望我们将向此方向前进。

緬 在我国，尽管我们比你们穷得多，这些服务在很早阶段就建立了起来；而且，它们不是由于富裕建立起来的，而且由于有意识地努力创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建立起来的。

我们还取得很大程度的社会平等。原则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贫、富之分。这是个重要的优越性。

加 我要催促你谈谈社会主义起了什么样的变化，不是戈尔巴乔夫先生治理下的，而是前 70 年的变化。

緬 社会主义正如资本主义一样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不断变化的情景中。

加 你将要说的是列宁以后 70 年的巨大变化吗？

緬 如你所知，我们的制度是在列宁领导下首先建立的，

但当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只是刚刚开始。列宁逝世后，社会主义才真正发展起来。所以从这个意义说，是有巨大变化。

加 对。

緬 接下来我谈谈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变化，因为列宁活着时只看到一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

加 作为一个远方观察家，我想更多地了解紧接十月革命之后的年代里你们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清算富农。

緬 清算富农与农业集体化。合作农业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

加 但这不是在某些方面逆转了新经济政策吗？这种列宁领导下的早期政策，曾经对 20 年代体制实际起了某些缓解作用。

緬 列宁看出了苏联农业的前途在于实行合作，象他后来的其他人一样。但如何实行合作，他的想法与后来实际做法不同。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斯大林的领导下，集体化进程如此之迅速，以致对农业引起真正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它在一段时间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停滞，而且如你所说，许多地区导致了对富农——雇有雇工的资本家农民——的清算，还清算了一些根本不是富农的人，亦即你将称为家庭农场上的小康农民。这些人之被清算，意味着凡是不愿参加集体农场的人，都被剥夺土地，并被流放。这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但是实行合作的思想……

加 并不是极其愉快的。

緬 这并不极其愉快，但是完成了。在斯大林领导下，集体化是以强制的速度进行的。虽然事前设想富裕的或小康

的农民将参加，并成为合作社的组成部分，而且将与社会主义和合作农业合作，但实际并非如此，他们是被迫参加的，并非自愿。列宁的合作计划是实现了，但实现的方式，在许多方面离开了他所想象的方式。

加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速度非得如此强制不可，但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早期年代特别强调重工业，是否这种强调对农业有不好的影响呢？

编 从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初期起，苏联有意识地努力建设重工业。

加 是否重工业被看成社会主义骨干？

编 它是我国经济独立的骨干，这种想法是建立民族机器制造业，以便我们不必从国外输入所有类型机器、机械工具、拖拉机。要有机器制造业，首先得建立钢铁工业、燃料工业。这种发展路线持续一个很长时期，实际上一直到50年代。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而且不得不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消费品——为代价来完成。

加 但是在50年代，则更强调消费品工业，是吗？

编 是的。从1953年起，在斯大林逝世后，我们着重促进我们称为第二部门经济的工业。第一部门是重工业，第二部门是消费品工业。马林科夫和其后的赫鲁晓夫不断地促进消费品工业，还有农业。先从理论入手，然后付诸实施；他们认为，消费品工业能够而且应当以相等于或者更快地发展重工业的速度发展。这以前的信息是重工业的发展，应比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迅速。

加 请谈谈赫鲁晓夫与苏联经济。

编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有许多变革。其中之一为经

济结构的变革。他真正对农业很注意,在他的领导下,农业开始可靠地增长。他的成就之一是开垦西伯利亚的处女地。关于这个问题,有时有争论,但是,假如你考察苏联粮食总产量,目前一大部分是处女地生产的。这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一种积极成果。

我认为第二个成就是他扭转了提供适当住宅的潮流。赫鲁晓夫开始了大规模住宅建筑计划,第一次给一些家庭住上单间公寓的机会。以前的通例一直是:几家人共住一套公寓。当我小时,我家住在一个6家人共同居住的房屋里;实际上是个6间房住宅,我家住一间。这是过去的规矩,现在不同了。这不完全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但向着这个方向的巨大变化,是从他开始的。

加 在另一些场合我说过,我每次访问俄国,到达时总是听说住宅严重缺乏,然而当我居留在俄国时,我的印象是:刚建的住宅多得惊人。

缅 我们现在缺乏住宅的情况,是和40年前住宅不足情况不同的。我曾经住过一个建筑于19世纪的小房子,有人住在地下室,一家一间房;而且,如我向你所说,公寓也是几家合住的。那是真正的缺乏。现在我们住房缺乏的情况是:人们不能选择这所或那所公寓,而且许多青年人家庭不能马上得到住房。

加 我不是在批评。

缅 不,不;我也不是在辩解。

加 你还谈赫鲁晓夫吗?

缅 赫鲁晓夫在许多方面是天真的。他以为,一旦苏联建筑了这么些或那么些公寓住宅,生产了这么些或那么些

肉食，我们就富足了。实际情况却是：公寓建得愈多，人民就需要更大的公寓。人民的收入愈多，需求愈大。从这个意义说，他是天真的。他在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加了一长段，说明生产这么多或那么多肉食和建筑了这么多或那么多住宅，将意味着我们实现了共产主义。现在，我们不得不取消这种说法。不过，这乃是扩大经济消费部门的善意努力造成的。

还有些变革与赫鲁晓夫有关，但我们将下面讨论。

加 为什么赫鲁晓夫被轻易赶下台了呢？为什么他完结了呢？

编 他没有完结。

加 为什么他的任职期被终止了呢？我是尽量用一个非常温和的字眼。在美国，我们可以说，为什么他被驱逐了、被开除了呢？

编 他之被解除职务，基本上是由于他自己给自己任期确定了一个期限；他说他到70岁时将辞职。但当他到70岁时，他没有辞职，而且继续作一些不为另一部分苏联领导人所极其欢迎的事情，所以他不得不下台。

加 你必须再具体些。什么是不受欢迎的？我不想逼你太甚。

编 他因人们所谓的主观主义或主观受到谴责。他初上台时，答应在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这就是说：所有决议的作出，都要以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为基础。可是，时过境迁，他开始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的意见作决定，而且把那些决定强加给其他政治局成员；在有些情形下，既未事前征询其他成员意见，也未经过适当讨论。人们感到厌恶。

比如，有一个决定将党组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农

业，另一部分负责工业，这样，在任何地区都将有一个党委员会管农业和另一个党委员会管工业。这是一种非常武断的划分，而且是他的主观决定。然而，更重要的是，除工农业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管。

加 当赫鲁晓夫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晚年访问美国时，我会见过他。我认为他是个令人着迷的人物，言词非常锐利，知识极其丰富。我曾听人说，他了解的情况如此广泛，以致卷入其他人认为是他们自己私人所有权的事务，这是真的吗？

缙 不；我不这样想。他在苏联非常受人欢迎。他也是一个非常机敏的政治家，而且我以为在许多方面效率极高。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首创缓和政策和缓解与美国关系的人。50年代末我们两国关系的解冻是由于赫鲁晓夫。我的父亲当时任驻美大使，是特别派往华盛顿去实施这种转变的。直到1960年不幸的U-2事件发生以前，我们的确在许多方面采取了缓和措施；U-2事件把这种潮流逆转了一些年。

如我已经说过，他在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在他后来的几年，他开始作出一些没有证据真正能实施的决定，而我认为这是……

加 这正是我准备要说的。他卷入了一些他并不充分了解的事务。

缙 我认为这不是了不了解的问题。他对于如何处理某些事情具有错误的思想，而且他开始把那些错误思想强加于别人，别人都不同意他的意见。

加 那么，关于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必要性的近时以来的进一步发展，你是怎么看的？

缙 这正是我准备谈的问题。我前已说过，社会主义已

取得很多成就，但是，有许多我们认为会取得、会完成的事情，我们不曾取得或完成。列宁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只有在大体上取得较高生产率、较高劳动生产率、较高经济生产率时，才能成功地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现在，我们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并未取得世界上最高生产率，在这方面，它仍然低于最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思想还认为，社会主义会带来世界上最高生活水平，我们也未做到这一点。这有各种各样原因。我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自那时以来，四十多年过去了，而且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里，有的国家彻底改变了。日本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生活水准非常接近于美国。与此同时，我们苏联却落后了。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苏联经济在最近10年或15年中增长减速的原故。不过，不仅是苏联经济，有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是如此。70年代开始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以每年约5%或6%增长率增长，但到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低到最多1%至3%之间。这是绝对不够的，而且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长期减速、长期的发展速度下降。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长期的发展速度减缓的情况，我们将在后面谈论造成此种情况的不同原因。在社会主义世界，现时减速仍然继续着；我们仍未扭转这种形势。

这种发展速度的减缓在70年代中期已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苏联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已经认识到。当时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谈到它，也谈到克服它的必要性。同时，这种减缓也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它的出现，部分是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但它也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

而且导致了现在被称为革命性改革的时期。

加 让我再问一个我过去就感兴趣的问题。在整个这时期,尽管有些改进并利用户女地,苏联农业仍然是个困难问题,不是吗?一个证据是:曾经一度被称为欧洲面包篮的国家,却非常大量地输入粮食。对你们国家的农业问题,你的看法如何?

缅 赫鲁晓夫有一个思想:开垦处女地,提高农产品价格,让集体农民对种植什么作物等等稍为有点自由,就可以不用大量投资发展农业。然而,他基本上是想不靠大量投资就实现更高的农业生产。我认为这是个大错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政策变了。我们资源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农业投资。农产品价格再次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农业体制有所放松。但即使如此,并未取得实质性成就。在大多数情形下,农业投资仍然效率差。我认为,基本原因与整个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相同——官僚主义的工业管理失误。

加 我有一个想法,按照所有我所了解的苏联标准看,是很反动的。这种想法是:全世界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只有在自耕农的手下,才真正经营得很好。自耕农宁愿剥削自己和他的家庭,也不愿受制于一个更大的生产机构。你注意到我用“剥削”这个字。我总是这样认为:一个人迫使自己非常艰苦地劳动;其艰苦程度,是他的老板迫使他劳动时不能达到的。你同意吗?

缅 我同意,但也不同意。我不同意并非根据任何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教条。首先,私营农业在有些地区是成功的,而在另一些地区并不很成功。比如波兰,它的农业是私营的,大都是私营的,可是并未取得巨大成功。我不是批评波兰;

我只是说明事实。至于美国的土地所有者经营农业，一直是成功的。但他们之所以成功，乃由于他们的农场是我们称为工农业的组成部分。它也许是在个人或自主的基础上组成的，但它是农业综合企业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你们国家大多数人是承认这一事实的。工业为农业服务得很好，而且不仅工业，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服务，比如金融业。从基本上说，我们苏联目前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甚至有个农业综合企业部。不过问题是，农业综合企业是否能由一个行政组织的形式或者一套非生产的协调组织来经营管理呢？或者，工业与农业必须象目前在加拿大或美国那样在生产水平上一体化呢？

加 我想我了解了你的论点，但请说清楚点。

缅 我的论点是：愈是少干涉那些在农业或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中真正从事生产或组织生产的人，事情就更顺利。不过，憧憬一种自己在自有的、周围尚未开发的土地上辛苦劳动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在现代技术世界中，这种想法是陈旧的。

加 明天，让我们讨论苏联经济的问题，接着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前景。然后，我们可以回头讨论资本主义及其问题和它的前景，再讨论两种制度的共存问题。你看这样如何？

缅 很好。

二、现时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减缓的原因

加 你对俄国革命以来半世纪左右社会主义的成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相信这时期的经济生活比沙皇统治时期富裕得多。现在让我们谈近些年来发展速度减缓的原因吧。为什么会减缓？原因何在？

緬 减缓开始于70年代下半期，80年代初尤其显著。如我前面所说，直到那时为止，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直是5~6%，而到80年代开始时，则降为2~3%。

加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那些年代也剧烈下降。你们没有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也没有试行强硬的货币主义政策，是吗？

緬 我们没有。我认为我们两国发展速度减缓的原因有些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别。

加 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未受重视。

緬 也许弗里德曼教授从美国大使馆或通过美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插了一手，我真的不知道。

至于增长率问题，对于联合王国、甚至美国而言，2~3%看起来也许相当可观，但在俄国，人们认为这种增长率等于停滞；而实际上这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对我国当前经济情况的描述。这确是个严肃的问题，我现在来谈它的原因。

加 你将谈最重要的原因吗？

加 也许开始我应该谈最不重要的原因。最不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有的，这就是70年代中期能源价格陡涨。社会主义对石油高价的适应过程是相当缓慢的。

加 对我们所谓的石油冲击吗？

加 对，石油冲击。燃料价格猛涨，不仅石油，还有天然气和煤的价格。这种情况，使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东欧国家尤其如此。

加 苏联是石油生产与出口国，并未因此受到损害，但到80年代初，我们石油生产达到自然极限，停止上升，处于停滞状态。

加 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冲击的原因与此不同。你们石油生产没有达到自然极限，你们是受到石油价格陡涨的影响。我们有个生产能力的极限，这是影响我们经济的主要原因。

加 价格高，我们有更多的石油；你们价格不变，但石油更少，或者没有增长。

加 没有增长；而对东欧国家来说，实际上还有所下降，因为我国自己要用更多石油，能够输出的更少。

加 石油就谈这些吧。在那些日子里，我国很有几个经济学家想把自己的缺陷归罪于阿拉伯人的政策，我们慎勿为此！

加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责备自己，因为我们生产石油，而不购买石油。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石油不足归罪于阿拉伯人，我们只能责备自己。

加 经济发展减速的其他原因呢？

加 除能源价格上涨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市场滞销，向西方国家出口非常困难。这种情况

引起许多问题，特别是贸易差额恶化，在许多情形下成为逆差，苏联和有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债急剧增长，有时甚至不得不减少进口。这就加重了一般说来不利的经济局面，因为进口物资是很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生产能力的。

加 而且象波兰那样，已经欠债很多吗？

缅 对。罗马尼亚也受到损害，因为前些年它曾设法成为一系列工业品的有实力的生产者，这些产品包括超级油轮，但到它能生产这些产品时，出现市场萎缩，它无法销售这些产品。

加 这是流向社会主义世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困难吗？

缅 的确是。不过我认为我们经济发展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的，而且我认为大多数人和我有同样想法。

加 哪些内部原因呢？

缅 有些人认为所谓孔德拉季耶夫周期——一种自发的经济活动长波——多少同时影响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我们社会主义世界的内部运作目前正处于孔德拉季耶夫周期之中。

现在，我知道你不相信孔德拉季耶夫周期，但我相信它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世界情况完全不同，我认为孔德拉季耶夫周期并不适用。

然而，我们目前经济发展是在减速，而且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减速同时出现的。让我们看看它们之间的差别。当70和80年代资本主义受到大规模失业打击时，社会主义遭逢日益严重的人力不足。当西方国家有大量生产能力——特别是在钢铁、机具等基本工业中——闲置时，社会主义经济却很难以维持其传统增长率的必要速度提高其生产能力。所以

总起来看，两种社会中经济问题的性质似乎是很不同的。

加 我们生产过剩，你们生产不足。

缅 我们生产不足，而且无力克服。

加 我想再谈谈你们劳力不足的问题。这是由于没有足够的人愿意而且能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吗？

缅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一般的人力缺乏。

也许我应当这样说：70年代某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苏联经济的总情况达到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我们一直有丰富的劳动力、多数必要原料的资源，石油和其他燃料供应也很好。但在70年代某一时期，我们却骤然感到所有这些生产因素的不足。

加 我不是想干扰我们的讨论，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没有墨西哥人、西印度群岛人及其他国家的人，我们也将发生这种劳力短缺；对一些人们看不起的工作来说，尤其如此。我想你们没有想到吸收中国人和印度人以减缓你们劳力短缺问题吧，是不是？

缅 一度提到这个问题。这是5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人建议向我们提供他们过剩劳力。我们考虑过，但未成为事实。那时——赫鲁晓夫时期——劳力短缺在我国尚未成为问题。你知道，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我国从农村来的脱离农业的劳力很丰富。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不断，特别是年轻人，服过兵役的人；他们不愿再从事农业而进入工业。所以，当时的工业企业在补充劳力方面没有困难。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妇女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

由于有这种源源不断的劳力供应，工业企业实际上无须考虑节约劳力成本的问题，也不曾真正去寻求劳力新来源；它们的门前有工人等待就业。我不是说当时有人失业。不，这些人刚来到城市，就能找到工作；工作在等着他们。

加 我想请你谈谈另一些事情。一直有很多人谈到——我们前面对话中也有所涉及——苏联经济的效率特别低。对此，你能略加阐述吗？

缅 可以。如我所说，这种丰富的劳力供应到 70 年代有所变化，而且终于枯竭。在那些较早年代，我们 92% 的全部成年男女强劳力从事劳动，而且从就业情况来看，是适得其所。现在，我们出现劳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使用的劳力，不象从前那样使用得当。他们的劳动效率不象我们认为应该的那样高；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也是低的。

许多工厂积累着拿工资的过剩工人；它们将他们储备着，只在需要时使用他们，特别是在一个计划期快结束需要突击增产的时候。

加 储备劳动力吗？

缅 正是。劳力储备着，而且一般说使用得没有效率。比如，一个月、或一季度、或一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没有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加 资本增值情况如何？资本货物也储备起来吗？

缅 不，不完全是这样。苏联的资本货物总是不足的。在 50 和 60 年代，我们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基本投资的部分是很大的，可能不象日本的那样大，但很大，达 35%。日本是 40%。这都是很高的数字。它使我们能够在全国建设

大量的工业企业。假如那些年代你在苏联，你可能见到大规模建设。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可看到建设事业正在进行。许多资金用于建设工业企业、新电力站、采矿设施，等等。

加 我在昨天读的一篇苏联文章中看到，那个时期太强调建立新工厂，太不注意现有工厂基本设备的改进和改造。你这样看吗？

缅 的确如此；过一会我将谈这个问题。但首先我想说，从赫鲁晓夫时代起，实际工资开始增长。我们有意识地增加社会开支、即增加低工资工人工资。人们实际收入提高了。

但是，由于人们实际收入增长迅速，国民生产总值中能够用于基本投资的部分便有所下降。于是，我们一步一步地陷入一种境地：我们生产成果可用于基本投资的较少。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多，而用于基本投资的部分减少，资本货物的短缺便更为严重。

加 这又很象西方的情况。在美国，每天早晨有几千个经济学家醒来便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储蓄，更少的消费。你说的情况与此很相似。

缅 我们正从一种颇低的工资水平进到一种较高的工资水平，人们花钱很爽快。我记得可能是30年前，有些物资供应很丰富。比如，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用相当低的价格买到鱼子酱，不必到市场上去。现在经过70和80年代工资提高后，我们没有足够鱼子酱出口，甚至也没有鱼子酱在地方市场上出售。

加 让我们谈谈某些其他出了毛病的事情吧。

缅 昨天我谈到赫鲁晓夫的住宅建筑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将用于基本投资的资源再拿出许多来用于建设事业，这就

减少了基本投资。如我们前面所说，苏联的工业潜力是 30 年代、40 年代晚期和 50 年代建立的。到 80 年代初，所有这些工业企业都需要认真的重建；即使是 50 和 60 年代安装的设备，也日益接近于其生命周期的末日。现在，资本货物与投资资金简直就不足以满足这些增加的需要。所以，尽管仍在建设新工厂，但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的问题很严重，更谈不上创造新的生产能力。

加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工厂的建立是以牺牲旧工厂的现代化为代价的。

缅 对，但不仅是现代化。在某些情形下，对旧工厂的维修也不够，致使它们非常陈旧、过时，有时甚至解体。这就加重了产品匮乏的程度。

加 让我再问你一些我读到的问题。当人们提到近年来农业危机时，是什么意思？

缅 我想农业危机是使我们总形势更加恶化的事物，因为我们不得不用我们从输出石油得到的硬通货去购买谷物；要不然，我们可以用这些硬通货去进口更多的工业现代化必要的机器。这方面的计划未能实现，只是由于农业达到了一个极限，不再能增产。在 70 年代晚期以前，农业是发展的，但到 70 年代晚期，它停止发展了。

加 为什么停止呢？

缅 我认为我们达到了某种自然极限；超过此极限，我们就不能依靠集中管理农业的旧体制了。农业一直是由中央当局和地方当局管理的。农民实际上并不决定生产什么，他们的日常活动不得不要受到干涉。在开始用于生产的处女地上，这可能是发展生产并将人们投入生产活动的好方法。但是，

为了提高现有的作物生产与牲畜饲养的农业生产率，这并不是好的体制。

加 你是说苏维埃农民需要更多的市场刺激、更多的资本主义自我利益的刺激吗？

缅 我认为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劳动和自我决策的可能性。他们需要的是少受这样一些人的干预；这些人不了解各地土地的具体情况 and 如何在各特定地区进行生产，却负责制订计划和确定各种标准——这些计划和标准可能适用于全国，但不适用于各有关特定地区。

最近我读到一篇有关爱沙尼亚农业的好文章。这篇文章将爱沙尼亚农业与邻近俄罗斯共和国地区农业进行比较。两者都属于同一社会主义制度，但爱沙尼亚农业生产率高得多。爱沙尼亚农业受的干预较少，而俄罗斯共和国农业受的干预较多，爱沙尼亚人喜欢说：“我们宁可用我们自己的笨脑筋想问题，而不愿别人的聪明脑筋为我们想问题。”

加 你又差不多是说：当个人自作决定和自得报酬时，农业经营情况最好。

缅 我所说的是：各个集体农庄应自作决定，不受干涉。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体私营农民应该这样。

加 你们仍然不反对集体农庄吗？

缅 我们仍然要维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相信集体农庄内部的对个人和家庭刺激的体制，也相信由农民在其私有地段上经营而会有的对他们的更大刺激。这种体制，将在没有外来的不断干预的情形下产生良好后果。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当前改革时再讨论它。

现在再重复一下：我们已陷入需要进口包括饲料在内（这

非常重要)的更多谷物的境地。

加 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购买我们的谷物。

缅 你们高兴我们购买谷物，而我们的人民则高兴多吃肉少吃面包。它们都可以说是重要商品，但如果我们要有肉吃，我们就要喂养牲畜。这样，我们就需要饲料，而一个时期以后，我们就需要从西方进口饲料，而不能进口我们工业现代化所需的机器。这就导致工业的停滞和我们用非常宝贵的燃料交换饲料的情景，从而使我们无法按照我们希望的速度实现现代化。

加 你们是在收买我们的农业集团而不是我们的机械——工具工业吗？

缅 对。

加 但是，怎么改革呢？我曾听你说，有些必需的改革将牵涉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

缅 到人们称为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起始于1964、结束于1984年的一个长时期——结束时，对戈尔巴乔夫先生称为“前危机形势”的这种社会主义现状进行果断的重新评价的时机成熟了。苏联当前对这种前危机形势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讨论，对于理解未来数十年内我们社会的前途，是带有根本性的。

这种讨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超越了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些当前问题和困难的范围。它对我们现在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提出了疑问。我们将在下次对话中进行全面的讨论。

三、现时社会主义发展速度 减缓的原因(续)

加 现在,让我们谈谈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具体原因。为什么会出你称为革命的这种剧烈变革呢?

缅 自苏联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改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不仅是经济基础,而且包括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基础。原来我国就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调整的步子为什么如此缓慢呢?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每个人都已认识到存在问题。我们经常提到劳动力、基本商品的供应、燃料,等等。那么,为什么要经过如此长的时间我们才改革呢?

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经济发展减速和停滞的主要责任者,是现存的计划和管理经济的制度。这个制度过于中央集权化;中央机构实际上试图与经济生活的每个细节发生关系并进行干预,致使企业即使有刺激也非常弱小,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即使有也微不足道。

加 对个人的刺激被官僚主义的监督取代了吗?

缅 的确如此。企业对更高的效率、更迅速的工艺进步愈来愈无动于衷。从最高领导一直到实际生产部门,都由那些自己不参加生产或不理解所从事工作的人发布官僚主义命令。这已成为普遍作风和经济管理方法;而且,我想重申,这特别有害于农业。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在农

业方面，不仅中央机构，而且地方当局也进行干预。

加 我听说这一切被称为官僚主义控制和官僚主义命令的体制。是真的吗？

緬 不错，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的。的确是官僚机构在发布命令。而且，重要的是，官僚机构虽然发布命令，但都不对命令的后果承担责任。

加 对那些从事控制的人来说，这倒很惬意，他们有权无责。

緬 的确如此，有权无责。这恰恰是我国人民正在谈论的问题。这不仅反映在农业方面，也反映在工业企业中。效率高的企业创造的利润被拿去资助低效率的企业。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刺激效率高的企业更好地工作。它们不能利用它们的利润或折旧费改善工作条件。它们的折旧费需上缴，因此它们甚至不可能更新机械设备。那就是我们与一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工艺进步方面落后一些的原因之一。

加 我想问一个由此而引起的明显问题。这种制度的确取得许多成果。但既已知其缺陷，为什么还让它起作用呢？

緬 人们也提过这个问题，而你提得多少有点婉转。当30年代建立这个制度时，它是促使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我们已指出，仅在几十年内，它就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大工业强国，从而也是军事强国。在钢铁、石油、甚至鞋子和其他许多工业产品方面，我国成为最大生产国。然而，麻烦的是，一段时间后，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因为从来不曾有过巨大工业潜力的我国现在有了。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生产新产品所需的特种钢。低质鞋数量很多，但顾客不愿购买。他们偏爱式样更时髦、更好和质量更

高的进口货。

加 这正是我想回头讨论的问题。

緬 不错。在生产除去外部辅助装置的计算机、私人用计算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方面，我们的工业也是落后的。

加 你们将技术成就应用于实际的过程很缓慢吗？

緬 的确如此。电视磁带录相器和其他许多新奇的电子产品——我们总是落后的。这不是苏联或俄国人或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情况。你看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个特殊领域里，即在需要时生产所需产品方面，都是落后的，即使它们有这样的生产潜力。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在创造新工艺方面，它们也落后，尽管它们的经济迫切需要这些新工艺。不过，社会主义是一种迅速发挥巨大工业潜力的好制度。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相当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和选择那条道路的原因。他们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加 由于受到苏联的某些鼓励。

緬 哦，是，也不是。我们不可能真正鼓励他们。我们是鼓励过古巴，援助过古巴人，但选择社会主义的是他们自己。我在这儿不想谈东欧，因为你可能说是我们用武力帮助了它们。但中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

加 是的，我非常同意。

緬 还有越南和北非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

加 我们也许可以说，在轻微的程度，你们在东欧起了一定的鼓励作用。

緬 是的。然而，重要的事情是，你不应该低估中央集权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基础的能力。我认为那是重要的。它可以

发展工业基础,但问题是它是否能继续有效地使之发挥作用;我担心的是:事实已证明,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社会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国第一次认识这一点是在50年代晚期。

加 那么早吗?

缅 是的,30年前。

加 我对此很有兴趣,因为1959年我在苏联时就听说过这方面的讨论。

缅 那时我是个青年人。我记得当时问题已经很明显。50年代末开展了一次讨论,当时赫鲁晓夫和我国其他领导人说这个制度过于中央集权化,过于复杂,复杂得由一个单独的指挥部门来计划和管理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并没有什么新内容。

而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1958年,中央集权制各部实际上暂时不起作用了。这些部是30年代初斯大林时代建立的,战后50年代初更大量增加。当它们暂时不起作用时,所有企业的管理权都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地区经济委员会。

加 它们的俄国名字是什么?

缅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加 当我1959年在那儿时,有大量有关它们的讨论。

缅 是的,政府各部建立之前,原已设有人民委员会,那是20年代的事。赫鲁晓夫的思想是恢复列宁管理经济的方式,从过于中央集权转向由地方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进行更分散的管理。

这是第一次真正有意识地努力全面分散权力。如我所说,那是50年代末期。然后,在60年代初期,哈尔科夫的经济

学家 E·利别尔曼第一次提出，苏联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在利润的基础上运转。为此，世界感到意外，人民群众说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资本主义。

加 我在意大利讲学时曾偶遇利别尔曼。我回想起，当我听见苏联正在恢复利润制度时，我的印象多么深刻。

缅 这也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而经济讨论则始于 60 年代初。当时的总口号恰如现在的一样，给企业以经济自主权。这样，就把利润动机置于计划和管理为中心。这导致了 1964 年和 1965 年的工农业改革，这些改革在那时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新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完成。改革正式规定，企业有权把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基本投资、社会领域投资和工人奖金。这一切听起来不错，但与此同时，政府各部也得以重建。换言之，在改革给予企业以自由权的同时，也为政府各部的重建提供了条件。

政府各部恰象它们现在被认为的那样，是这样的战略机构：它们发展并帮助追求工艺进步，并在企业需要时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它们不干预工厂的日常管理，这是如同现在一样作了详尽规定的。从一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恢复我们当时希望做的事。政府各部本未被授权进行干预，但实际上，在后来 10 年里，它们接管了日常管理，并把自己完全重建为过于中央集权的工业领导者。

加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

缅 好吧。农业方面有些改革，但我想把它放在后面去谈。

加 在非常有趣地概观历史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很明显的。它可能对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些现实意义。你是

说集权有一定的必然性吗？你们一再努力去对付它，它却总是再现。这不是从政府部门或官僚们对权力的欲望派生出来的吗？不是从后者的以下自我表白中派生出来的吗？这种表白是：“哦，这是我的职责，如有什么差错，我将受到谴责，因此我必须进行控制。”

我要提的问题是：你们是不是在和特权的作用进行斗争呢？当我们谈到戈尔巴乔夫先生面临的问题时，这是特别有趣的。

緬 我认为你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问题之一。确实，我们两国制度中官僚政治的权力已经扩大；我们将在后面的讨论中论及。我们在讨论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领域时，自始至终都将涉及官僚政治。

加 还有官僚政治集权的趋势——

緬 我们将谈到官僚政治集权问题。

加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趋势之一，对吗？

緬 是的。但让我回到农业问题上来吧。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先生应对农业方面的中央集权负完全责任。事实上，他在农业方面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促进地方分权的改革。这是他在1965年3月中央委员会全会讲演中提出的。他说，应给予集体农庄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超产的无论什么农作物的权力。农民们第一次用他们的劳动换钱，而不是以他们为集体农庄付出的劳动换取实物。现在，农民们开始得到生活津贴；老农第一次得到社会保障，即老年津贴；大量基本投资投入农业。但是，实际上不过说说而已，对农庄管理的日常干预制度仍然存在。这导致了生产停滞，并使勃列日涅夫改革拟议的经济刺激不起作用。

加 让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不曾提到，却给我极深印象。这是有关社会主义消费品经济方面的问题。列宁或斯大林时代的经济体制生产少数非常简单的商品——钢铁、机械。某些其他资本货物、基本食品、衣服、燃料和栖身之所。其他东西不多。在这些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投入产出关系是什么。计划上的问题很容易看出来。但现在，十月革命70年后，生产种类极多的消费品是可能的，而这种类极多的商品又各自有其不同的型号、不同的设计、不同的服务和修理要求。这种千变万化的消费品供应已经定型；这是西欧和美国的**标准**。这不给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硬加上一种特别重的负担吗？

缙 我认为，你指出的当代经济与20和30年代经济间的不同之处基本上是正确的。确实，现在生产的商品数量和种类，与那个年代的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原则上说，我认为解决当代投入产出关系的问题是可能的。我觉得数学上讲是可能的。

加 你们可以用计算机计算出结果，并使之发挥作用吗？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缙 世界各地都有跨国公司正在那样干，而且干得相当不错。美国也有非常集中的大公司。

加 但是，它们周围有一批小型服务企业。虽然福特汽车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汽车，但都不提供售后服务。

缙 重要的是，在那些大公司的中央管理部门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府各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下层之间各有任务，应有合理的平衡。必须有明确的分工。

加 这是为了适应市场而必须作出的反应吗？

緬 是的，是为适应市场作出的反应；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之一。

加 让我谈谈我几次途径苏联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问题：通货膨胀。人们听说，自 1947 年以来，面包的价格没有变动。

緬 最近有了变动。

加 而且有其他许多东西的价格是非常稳定的。

緬 例如，住房价格。

加 是的。但在苏联，人们看见等待进入商店的人排起了长队，这是苏联式的通货膨胀。货币的数量比商品多。你们国家银行的官员们曾告诉过我，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制度提供的收入，常常超出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这是不是你们国家和一般社会主义经济的大体趋势呢？

緬 你清楚，原则上讲，计划当局制定国家计划时，人们是期望其做到供求平衡的。随后，它们把国家计划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商品等等计划。基本要求是：在计划得到采纳前，它们应取得平衡；它们取得了平衡，但只是在理论上取得的。它们制定的生产计划可以满足预计的需要，但后来它们却不向企业提供完成计划的充足原料。于是，企业生产它们能够生产的无论什么产品，以图完成定额，但这些产品并不一定是社会需求的特定产品。不需要的东西生产出来了，与此同时，人民需要的商品却没有生产。

加 高统皮靴也许生产出来了，但不是漂亮的女鞋，是吗？

緬 企业愿意生产鞋子，但不是人们需要的种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是因为它们愚蠢，而是因为，比方说吧，

它们的定额告诉它们必须生产这么多或那么多鞋子。定额按人们的需要被分解为各种类型，但企业得不到按计划完成定额的足够原料。

加 你是说这造成了百货公司门前的长队吗？

緬 我认为这是你谈到的隐形通货膨胀、缓慢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加 国家银行里的人说，苏联每次改革都给收入较少和地位较低的工人增加工资，以鼓励提高生产率。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使收入超过商品供应——这就是我所称的苏联式通货膨胀。

緬 对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没有一种简单的解释可说清楚的。我给你谈了一点，国家银行的官员们向你谈了另一点。他们说的是工厂对节约人力或成本不感兴趣。原则上讲，国家制订的计划，是使工资总额与能够吸收这些工资的预计售货量相平衡的。实际上，工资总额持续超出了平衡。实际付给工人的工资，大于计划预计的工资总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企业不关心节约劳力，因此，它们付出过多的报酬和雇佣过多的劳工。他们超出规定支付工资，因为它们希望工人提高生产。

加 我想，我们也许除了官僚政治问题还要说几句外，其他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已涉及了。你还希望补充点什么吗？

緬 关于官僚政治，有许多话要说。我认为，我们改变计划和管理过于中央集权的情况如此缓慢的原因是，这种集权已造成一个社会官僚阶层、一种维护官僚自身的既得利益的官僚政治。也许我们可以以后再谈各种不同的官僚政治和人们希望掌权的心理原因。但是，只要有过于中央集权的制

度，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集中管理经济的重要社会阶层。现在，苏联的这个阶层由从事商品规划及分配的各经济部、局中不断增加的高中级政府雇员组成。

加 他们自认收入相当不错，是吗？

缅 其中有些人收入相当可观。另一些人较少，但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非常稳固，而且，除开报酬外，他们还有社会声誉。

加 权力呢？

缅 有时，地位本身没有任何既得权力，但在匮乏经济中，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谋取权力。

加 请继续往下谈，因为我对官僚政治的动力学非常感兴趣。

缅 戈尔巴乔夫先生说，现在，我国 2.8 亿人口中有 1800 万人——劳动力总数的 15%——属于那个官僚阶层。他们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官僚，但他们在管理部门和管理及行政部的各种不同岗位上工作。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这个百分比太大了。

在 1964 年那次目的在于消除中央集权的改革后，这个官僚体制迅速扩大。政府各部重新建立，人员从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归来。他们着手扩大和巩固这种机制，力图保证它成为永久性的，而且是破坏不了的。他们努力使之成为在公众眼里、在他们自己眼里和在公共意识形态中不可缺少的机制。

事实上，赫鲁晓夫由于建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摧毁政府各部，受到了有些人的批评。他被指责为破坏中央计划和削弱社会主义基础。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央计划并不

等同于政府各部的存在。后者并不垄断中央计划。

中央计划的首要职能与政府各部的监督作用是不同的。它的职责是预测、预计经济的全面发展，规定供求间的综合比例。它还执行基本投资、社会发展、防务和其他重点工作的既定政策。中央计划经济是给予手段，以便根据国家经济总战略提供必需的资源，并得以监督计划的贯彻执行。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政府各部实际做的大部分工作，却与预测和总体战略毫无关系，也与维护你谈到的供求总平衡毫无关系。日常活动集中于对包括日常生产品在内的资源的定量和分配，换言之，中央机构和政府各部成为标准市场机制的某种代替物。它们希望接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市场来做的事情——企业之间直接进行商品交易。显然，如果企业能够在完成政府合同之外，按它们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购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或销售它们可以生产的任何产品，它们就没有必要向政府各部或其他任何机构提出申请。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官僚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那 1800 万人——没有做它们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应该做的事情。它们正试图取代市场，试图代替市场运转，然而它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好的意图，但那就是不可能的。

加 我曾听见你和其他许多人说，从某些方面来讲，官僚政治是匮乏经济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经济的反响。那是真的吗？

緬 是的。我一直在描述一种一切由官僚机构集中分配的制度。这是个一切定量分配的制度，而这样做的借口，则是匮乏的存在和供应不足。因为什么东西都不充足，商品就

不可能通过市场分配，而且不得不集中分配。为此，就需要某种不生产产品而长期从事分发、配给产品的人。

加 那么，配给和定量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过多的函数吗？

缅 是的，但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倾向于再引起或制造经济匮乏的条件。由于窒息了刺激性，它不断地再制造和再创供应不足和需求量大、甚至超大量需求的形势。

换言之，官僚体制——一种如我所描述的经济官僚体制——与物资不足是同时出现的，它们相辅相成。官僚体制助长供应不足，供应不足助长官僚体制。

加 让我问一个有关官僚政治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我对美国的观察：在大型组织（包括巨大的法人团体在内）里，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用守成的标准来衡量人的智力是否优越，用是否与已在组织中的人或正主持提拔工作的人的智力相似，来衡量正待加入该组织的人或正要得到提拔的人的智力。你在苏联观察到这种情况吗？

缅 绝对是那么回事。官僚体制或多或少是一种在不同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内起同样作用的共有制。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稍有差异，但在两种制度下都倾向于具有某种特性。我们不必假定官僚政治实质上是有害的，它不过使人们在某种条件下不可能有效地工作。让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某个在政府的部内工作的人想想吧。他手中控制着许多工厂，并从最高领导层得到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确凿命令。然而，他不曾得到完成任务的足够资源。那些资源在不同的政府各部控制下，或在其他部属下的工厂里，而那些工厂又不处在听他命令的位置。

唯一听命于他的人，是他手下的人。因此，他命令手下的工厂经理们生产不在计划之列，但可能是贯彻了上级机关命令的产品。他要求工厂经理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他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经理将不是为本企业的利益或促进本企业效率工作。

加 他是在为他上级的利益工作吗？

缅 是的，而且上级总是企图将那些很听话的人委任为企业的经理。因此，即使从理论上讲，如我们苏联人所说，企业经理们似乎对获取利润和生产效益感兴趣，他们实际仍然是按上级的意图行事。

加 让我们再谈谈我们先前谈到的官僚政治动力学。这位在政府的部里工作的上级告诫自己：“我毕竟负有责任，如没有成绩，我将被撤职。”因此，作为自我保护措施，他不会总是自掌权力和自树权威吗？

缅 是的，他当然会。例如，假定钢铁工业不按照中央管理部门的计划生产钢铁，谁将受到指责呢？首先将是政府部里的人员，而不是生产部门的人员；而政府各部则将指责生产部门的人。

加 因此，政府各部工作人员将抓住权力以防备受指责的时刻到来吗？

缅 是的。

加 我想问另一个我曾听人说过，但我们不曾谈到的弊端。当经济在供应不足的条件下运转时，就出现影子或地下经济，对吗？当经济不提供某些服务，比如汽车修理时，于是人们不受制度的约束去修理汽车，以捞取额外收入。你怎么看待地下经济呢？谈谈吧。

缅 商品不足的状况和定量分配(不是根据价格进行分配)

的制度，有助于贪污、黑市交易和地下经济的产生，而且无法将其消除。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已成为苏维埃经济的基本特征，60年代以来尤其如此。

加 为什么那时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呢？

缅 实际并不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时是它们的发展期。随着官僚体制的发展，商品匮乏的状况更加严峻。供给不足的状况蔓延至所有经济部门。这就导致地下经济大肆活动。

加 对消费品及更多劳务的需要，计划体系的日益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不也是地下经济产生的原因吗？

缅 在一定程度上确如此，但我必须说地下经济有时与消费者全无关系。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所谓乌兹别克棉花丰产地。你听说过吗？

加 没有。

缅 一两年前我国新闻界曾广泛宣传过这件事。中亚西亚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有一个完整的棉产部。该部多年来超报棉产量、不存在的棉产量，每年高达100万或100多万吨，通过虚构帐目和贿赂苏联其他共和国纺织厂的经理们，这批棉花被供应给那些纺织厂。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除固定工资外，都获得数目巨大的非法收入。这一整套阴谋诡计并非为任何消费者服务，可以说纯粹是一场骗局。

加 这是地下经济中的虚构棉花吗？

缅 地下经济中的虚构棉花。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各地零售贸易，多年以来已成为一种异常邪恶的骗局。它有意造成商品缺乏；这种缺乏不是经济本身造成的，而是特意造成的。一般消费者买不到的产品都以极高的价格出售，而地方当局的员工则定时接受真正第一流消

费品的贿赂。

加 让我把这问题弄清楚。商品之所以能被高价出售，是由于用一些供应品贿赂那些可能了解情况的人，否则那些人就采取反对行动，是吗？

缙 的确如此。贿赂是这样进行的。

加 一种表面上很难识破的安排。

缙 表面上很难识破的安排。你瞧，它部分是合法的。如果你按政府牌价将短缺消费品不售给普通老百姓，而售给你想售给的那些人——比如官僚们——你的行为是合法的，别人无法起诉你。然后，你的非法经营就有官僚们的支持。

加 这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先前的论点：你们的制度给消费者提供的钱，他或她不容易用完。

缙 是的。但我想这样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一种私营企业，但不是促进供求平衡的私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既不致力于扩大供应，也不通过以较高价格提供更多商品以满足需求。如果是那种情况，它也不会受到非常强烈的反对。

加 让我问你另一个人人们曾使我注意的例子。你有一辆汽车，但很难得到人们为它效劳，于是，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利用业余时间维修汽车、安装轮胎、矫正发火装置和从事一切必要的劳务，他们为此得到报酬。这是地下经济吗？

缙 不是，那不是地下经济。那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正在实行的改革之一所规定的合法行为。如果这群人不耽误本职工作，在业余时间里干这种活以换取额外收入，是完全可以的。让我给你举一个地下经济的较好例子。有人来到一个汽车修理场、一个政府办的修理场修理他的车，但他发现那

里排着长队。人们告诉他，一周或一两个月后来取车，但他准备为立即修理自己的车付高价。如果他按这种方式修车，那就是地下经济，因为为他修车的人不是按先来后到的秩序帮他修车，而是因为他付了额外的钱。修理场的人们以高于政府制订的价格，并利用自己不花一分钱的国家原料修理了他的车，而他们的固定工资还始终由政府付给。这是地下经济。

加 这也不合法吗？

缅 不合法，应该是不合法的。我认为，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服务站的私营站长会允许工人无所顾忌地私自利用材料给打算付出高于老板定价的价格的那些人提供服务。

加 那是合情理的。1987年2月我在莫斯科时，一个经济部门的资深人物告诉我，随着地下经济合法化的扩展，以前的贪污腐化现在合法了。他说，不是每一个因此而得到法律保护并靠正当手段获利的人，都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缴税。请给我谈谈这种情况。

缅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情况是这样的：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律，允许工人在工作时间外为消费者服务，赚取额外收入，但须缴所得税。

加 这是新近通过的一项法律吗？

缅 是新的；自1987年5月起生效，是1986年11月通过的。在某些情形下，税额也许过高，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许多习惯于在为政府企业工作的规定时间内外出揽额外活的人，并不真正准备利用业余时间干额外的工作。他们更喜欢旧体制，因为在旧体制下他们不仅无须缴纳任何税款，而且可得到双份报酬。他们领取国家发的工资，并利用公家时间

揽额外活取得报酬。

加 他们宁愿要不付税的地下体制，而不要付税的合法体制吗？

缙 他们有些人是这样。从他们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加 听起来不错。

四、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是革命？

加 我们听到了被描述为改革也被描述为革命的近来在俄国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你自己用的是革命这个词。这些变化到底是改革呢，还是一场革命？而且请问：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

緬 它们称为改革。但是，如我前面所说，你可以将它们看成一场革命。它们不仅是我们社会经济组织的通常变化，而是影响深远并且深刻的变化；它们确实相当于突然性革命变化。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解除经济的官僚主义负担和束缚，是铲除影子经济和各种不同形式的贪污腐化和黑市。由于这样做，它们就将大门向个人和集体的首创精神敞开着，并将此和集中计划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

加 所以，这就是你称为革命的变化吗？

緬 这是真正建立一种新体系，而不是保存我们上次谈话中描述的旧体系。

加 让我们下面讲得稍为系统一些吧。我前面听你说过企业的自由。其内容如何？自然，我们说的企业是指的生产实体。

緬 新近通过一条法律，为我国经济中的企业确定一种新地位。这个1988年1月开始实行的法律的突出内容，是增加企业的决策自由。

加 假如我去到苏联并出示我的苏联公民证（这似乎有点不可能），要是我想，我能开始建立一个企业吗？

緬 不能。你也许想建立一个小规模的个人企业，而我提到的这个新法律只适用于政府企业。按照该法规定，政府企业地位有所变化，它们有更多的自由。

加 具体说，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

緬 具体说，这意味着企业自由地将它赚的扣除了成本与税款的全部收入用于基本投资、付给职工奖金或向社会领域投资。

加 后者是投资办学校、幼儿园——

緬 幼儿园、学校和住宅、俱乐部、电影院。

加 但是，建立企业的决定将仍须由官僚机构作出吗？

緬 那种决定权属于监督计划的部门，这是事实，但一旦企业运转起来，它就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加 所以你对我的劝告是：不要带着建立新企业的想法马上到苏联去。是吗？

緬 你又是谈的私营企业，那有单独的立法。我们现在谈的是属于政府的企业，让我们继续谈吧。

以前集中分配的折旧费将由工厂保留，而且可用于机器更换和更新。事实上，企业今后通常得在自筹资金的基础上经营；它们将得不到集中的基本投资。

加 但企业能确定自己的价格吗？

緬 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我想稍等一下再讨论价格机制。

加 我们倾向于认为确定价格的自由对自由企业制度说是很重要的。

緬 我们并非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我们现在谈的是给予

政府企业以更多的自己作决策的自由。你必须记住社会主义企业是属于政府的，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对它们授权的程度问题。

加 对经理们授权吗？

缅 对经理们，也对企业内部产生的集体管理机构。

关于自筹资金的原则让我再说几句。以前，企业对于自己经营活动，其基本投资都依靠政府。现在，基本投资一般必须自筹；如果不足，必须向银行贷款。通过政府预算筹措的中央基本投资，将只用于重大基本投资项目。

加 也用于创新企业吗？

缅 是，用于建设全新工厂或大规模地扩大旧厂。

加 所以，了解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构架内部和国有财产、国有公司内部的放宽限制，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缅 重要的是了解我们现在谈的是政府企业的自治。这多少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企业的自治相似。在西方，法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国家，有些工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这是和那些工业部门发生的情况类似的。类似，但不是完全一样。这种类似意味着：从出售给其他企业或消费者的生产成果赚取的收入扣除成本与纳税后，企业可以用于基本投资。对于纯收入的分配，由他们自己作主。

加 我们时代阴暗事实之一，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公共企业——如你所知，其数甚多——日益成为那些国家经济的拖累，被那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视为它们的灾难。这使你忧虑吗？

缅 不。我认为关于那些企业的拖累言过其实。那些企业有许多是很赚钱的，而且在私有化的过程中，私人投资者

正对它们毫不犹豫地狼吞虎咽，这就表明这些投资者认为它们是十分盈利的。

加 我想，对目前正发生的情况，我和你看法不同。

缅 也许有些领域的公司还没有很盈利。在那种情况下，它们是保留在政府内部的。

加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抢购钢铁与造船企业的事件并不普遍。

缅 那些企业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长期一贯停滞的阶段；而在美国，它们却完全是私有的。

加 我会说，特别在美国。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海军，我们的造船工业简直就不会存在。

缅 从你们的钢铁工业看，它是一种大工业，近来也并不很盈利，但它是私营企业。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关系到国营企业的问题。

加 让我们还是谈改革问题吧。这些改革授权给个体企业。个体企业就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以及如何投资以便进一步或更有效地生产。那么，计划机构、计划体制剩下的职能是什么呢？

缅 中央集中干预企业事务的范围将急剧减小。国防和某些其他中央集权政府急需的产品，将由政府通过特别合同取得，而各种各样企业将有义务尊重这些合同。

加 请解释得稍为充分些。我没有理解。

缅 这就是说，每一年度开始时，戈斯普南(Gosplan)——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与之配合的各部将决定国家的国防需要、集中基本投资需要、其他非国防领域政府开支需要等等。然后，大抵在竞争的基础上，和各种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订

立合同。一旦签订了合同，合同上规定的货物的生产将是强制性的，而且有优先生产权，但这并不垄断企业的全部生产；只是其生产的一部分。

加 前几年我访问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本部，实在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的组织。在改革充分展开后，这个机构真正有所缩小吗？

缅 是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其他许多中央机构，包括各部将保留，但它们的工作人员将大大削减。

加 我国精简任何组织的规模都有很大困难，你们能够很容易地裁减这些工作人员吗？

缅 有一些部已经这样做了。自然，问题是有的，这就是如何给这样失去工作的人找工作。他们将不得不调换工作岗位，大多数人参加生产工作；大体上说，不去行政部门。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管怎么说是有资格的工程师，在其他部门可以工作得很好。

加 他们会抵抗这种工作调换吗？你知道，官僚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

缅 我不这样想。他们可能抵抗，但他们将别无选择。

刚才你问我关于价格的问题。中央管理部门将确定一些重要产品的价格，这些价格将维持一个时期。它们将是稳定的，但最后是灵活的而且要服从计划。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企业愿意按照总经济战略决定的特定方向前进。

加 为什么？就让价格由供需决定不更简便吗？

缅 因为价格由供需决定将不会反映总经济政策的战略发展路线。假如我们想在我国建立一种特殊工业，或按一定方向发展，仅仅是当前的价格并不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作

出正确的决策。基本投资决策通常是在预测到的某个未来时期的价格的基础上作出的，所以中央管理部门确定的价格将用作未来年代社会需要的指示器，而这将是未来投资的指导方针。

加 你还是在用十足的旧社会主义名词在说话；说什么政府当局比市场英明，是吗？

缙 我是说，从它提供的信息来说，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

加 自然，这话我同意。

缙 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司在为其 10 或 15 年后项目投资时，并非以现时价格为基础。它们得想将来是什么样子。这恰恰是中央当局应该做的事情。

加 但我们之间仍有基本分歧。你说中央当局较英明；我对是否如此有所怀疑。

缙 我不是说中央当局必然英明些。我是说个别企业预见所有未来发展不容易，而中央当局有些象你们的大公司；它们两者都有获得使它们能够预见未来年代并为未来年代作决定的信息的能力。

加 我明白了你的论点。你说的是让社会主义以通用汽车公司为榜样。

缙 不必一定以通用汽车公司为榜样，但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司计划学习。

加 不要把我的话太当真。

现在我想问你，在企业一级的刺激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激发那些仍属于公有并由政府建立的企业的积极性呢？

缙 改革将使企业的工人与经理对他们劳动成果、他们

工厂的效率、他们行政管理水平的上升直接产生兴趣。顺便说一句，根据新的法律，工厂经理将由企业工人选举，而且还将有工人委员会监督管理工作。

加 这里请停一下。这是我已听说讨论过的事，我有个问题问你。我知道俄国工人是非常勤奋的，但是，当工人们聚在一起而且选出一个他们能找到的最随和、懒散而柔顺的头头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缅 这是一种可能。

加 如你所知，我不喜欢体力劳动。假如我是一个苏联工人，我想我会选一个最和蔼可亲的、宽松的头头，可能象你这样的人。

缅 好吧，我对你这样的人可不会特别宽和。不过，新法律规定：由企业工人选出来的管理人员还得经领导这种工业的部批准。

加 这样，集中计划体制仍然紧紧地控制着工厂选举，使我难于选上我喜欢的头头，是吗？

缅 有关的工业部得注意使选出来的人合格。不过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工人真正会选一个太随和的头头，因为如我所说，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自己正被置于对自己劳动成果有兴趣的地位。他们将对工厂的效率感兴趣，因为工厂增加的任何收入，将作为奖金分配给他们，而且这将是他们工资以外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加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们是把赌注下在工人将选一个很想赚钱的人作经理这种可能上吗？

缅 一个不想赚钱的经理，将使企业走下坡路，而且最终会宣告破产，这也是新法律规定了的。这时，工人将失业。

他们将失去收入，而且对每个人——包括经理和工人——都将是一种困难处境。

加 这使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新体制允许某些人失业吗？

缅 是的，但这是你们称为摩擦失业的失业：即从一个工作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造成的失业。在我国，已有一些人提出——而且我在前面已谈过——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增加失业以便向工人们增加点压力。这将加强他们在工厂的纪律性和他们在劳动中的兴趣。

加 这不是我们在美国听到的一种说法：穷人必须鞭策才能摆脱贫穷吗？你们是不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呢？

缅 不是。

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企业经营不善，未必一定是工人们劳动不好的结果；这也是经理部门管理不善的结果。可是，当企业关闭时，首受其害的却是不一定应受谴责的工人。这样造成的失业影响大多数或许是最不应对企业不盈利负责的人们。美国的钢铁业和钢铁工人就是例子。钢铁厂的关闭，难道是由于工人不出产品、工人懒惰、工人不知道做什么吗？很可能，他们大多数人是非出成果的，而且是艰苦劳动的，但是，总的形势使这个工业不景气。

加 我同意。我们钢铁业之所以情况不妙，部分是由于管理不善，部分是由于这一工业总的倾向是向太平洋盆地——日本、朝鲜、台湾——迁移。

缅 从苏联情况来说，我们是企图建立一种合理体制：我们必须了解，工人不应该对管理上错误负责，不管是企业管理，或是中央部门管理。如果计划部门把一个工厂建错了地点从而必然关闭，工人为什么应当遭殃？

加 我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论点。实际上，你是在说你并不认为失业是一种鞭策，是吗？

缙 不，我不认为失业是一种鞭策。我们认为充分就业的制度是一种合适的制度、一种社会正义的制度，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成就，而且我认为我们不会抛弃它。

加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想问你的一个旧的马克思主义论点：这个论点在性质上是更有哲学意味的。马克思谈到过劳动脱离生产工具而异化，没有工人会感到有责任。你觉得过去曾经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并将通过改革加以纠正吗？

缙 当马克思写到异化时，他是说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脱离生产工具的异化。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生产工具属于另一个阶级的人。工人则受雇主剥削，因此他们对效果不感兴趣。

加 你觉得苏联过去曾经有这样的异化吗？

缙 实际上是有的。马克思认为，用公有财产代替私有财产，将自动结束这种异化。可是，实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且几年前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时这种论点得到承认——我们认识到，企业公有制并不使企业按照社会主义的完整意义自动成为社会主义的。经常有这种可能：某一特定企业的工人将被异化，如果他们个人的、物质的、文化的利益不保持与企业利益一致的话。所以我们有根据全社会利益使工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的问题。这是很困难的事，是我们将来必须通过改革处理的问题。

加 对我来说，这太一般化。你不能说得更具体些吗？你就把我当作一个工人并告诉我怎样克服我的异化吧。

缙 首先，你被允许参与企业管理。你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员。你选举企业的工人委员会亦即你们的代表，这个委员会在日常基础上监督管理人员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你更紧密地参与企业的所有事务。

其次，你的工资受所谓集体合同支配。集体合同是企业与在特定车间劳动或从事特定任务的特定工人小组签订的。这些工人一起劳动，并对其生产的成品具有集体利益。如果他们劳动成绩好，他们就得到较高报酬，除其原定工资外，还有较高奖金。

加 利润共享。

缙 对。但我愿称为收入共享。

加 我理解你不喜欢“利润共享”这个词。

缙 不，不。我称为收入共享的意思是说，企业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工人。根据新的企业法，有两种形式：利润共享与收入共享。这不是词性的问题；这是机制的问题。

加 我必须告诉你，这种区别对我来说是很理论性的，但让我以下述声明放下这个问题：我并不充分理解认同与异化的区别。我认为，象在我国一样，你们国家有许多人是晨出工作晚回家；在他们劳动的工厂里，并不很感到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感到他们是工厂的所有者并参与工厂管理。你是在把工人刻划成一种比我认为的他们的真正形象更好的、更皈依社会理想的人。

缙 基本问题不是使他们成为理想的企业辅助经理，（按照这个名词的完整意义来说），只是使他们对自己劳动成果更有兴趣；而且我认为，通过提供更多的刺激，这是可以做到的。顺便说一句，在日本体制中就有这种性质的刺激，而

起作用。

加 现在我将不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在我们讨论资本主义时，你在这个问题上逼我太甚。

所以，总起来说，市场的作用是什么？请你谈几句，根据你们的改革，市场将是什么样子？

缅 首先，市场的作用将增加。这就是说，每个工厂都将不得不考虑为其某些产品找到市场。目前，在旧体制下，企业并不真正为销售其生产品负责。一旦产品生产出来并完成计划，配给产品就是中央管理部门、我们谈过的官僚机构的任务。工厂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刺激其出售产品或找买主。改革之后，工厂将不得不更加关注市场与顾客。它也将不得不向其他企业寻求原料与机器，而不是只向中央管理部门申请。在新体制中，中央管理部门除了在供应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将不给工厂提供物资。

加 你认为在新体制下出售产品时有广告的用武之地吗？

缅 我认为广告活动将增加。我们已经有些企业作广告，但在目前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市场、不仅当前市场而且还有未来市场，需进行研究。企业将不得不考虑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40%至50%，也许60%——在完成我说过的政府合同以后剩余的产品。而且，根据政府合同生产的产品将不是消费品，所以企业将不得不更关注消费者的情况，以便出售其非政府产品。

加 你曾经提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将增加和国外市场的直接接触。

缅 是的。

加 请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缅 以前，苏联出口任何产品都要通过外贸及其组织。现在，许多企业被授权直接和国外市场接触，并在国外销售其产品。

加 所以具体说，如果我是苏联鱼子酱、海豹皮大衣或任何其他无产阶级产品的大买主，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和生产者接触吗？

缅 这个，鱼子酱我不知道。购买鱼子酱可以通过某种贸易组织，因为大多数鱼子酱生产者是小企业。不过对大企业来说，你是可以和它们直接接触的。在外贸领域，也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建立有我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共同参加的联合企业。

加 我想稍后再谈联合企业，在我们讨论了资本主义之后谈到合作方法之时。

缅 当然，企业也将有更多的可能用它们外汇收入在国外购买商品。

加 它们将不必把外汇收入交给政府而且自己能用吗？

缅 它们可自用一大部分，而这将引起经济内部更多的竞争。顺便说说，竞争的兴趣非常重要。新体制中市场作用增加的一个方面，将是各工厂之间的竞争。特别注意避免垄断，免得一个或一小批工厂得以为其产品确定较高价格。

加 这样，一个工厂将成为规范，衡量其他厂将以它为标准。一个买主将能在工厂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你说的意思吗？

缅 我说的是：如果你现在想买什么东西，你不能选择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在新体制下，你将能选择生产你要买

的东西的工厂。

加 是的。我明白了。

缅 我也认为这是重要的，但必须小心促其成功。

加 为什么要小心促其成功呢？

缅 因为，由于任何一个工业内部的专业化，有出现垄断的倾向。你知道，我们的工厂一直在努力成批生产产品，而在那种形势下，很容易造成一、两个大企业生产大多数某种产品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有了也许在其中出现确定价格机制的垄断。

加 既然在你们制造企业之间有更多的竞争，如果一个工厂认为以较低价格出售商品有利，那么，这种竞争会容许一个工厂以较低于另一工厂产品价格的价格出售产品吗？

缅 如我所说，尽管主要商品价格仍将由政府机构确定，但大多数价格将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这就是说，它们将是买卖双方同意的价格。假如一个工厂有足够效率以较低价格供应好商品，自然它将能这样做。

实际上。市场将确定价格，因为到底什么是市场呢？市场不仅是我们买黄瓜或某种东西的农民的市场；市场是真正在企业之间进行贸易，而价格则是在企业之间直接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在市场确定的。

加 回头再谈同一个问题：根据新的改革，任何一个更有效而且看到扩大其市场机会的企业可以削价吗？

缅 是，可以。假如我们谈的是其价格不由政府机构确定的产品。

加 让我们喘一口气吧。

五、戈尔巴乔夫：改革还是革命（续）？

加 我们再来谈谈农业。戈尔巴乔夫农业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听说你们集体农场或国营农场内部现在有家庭农场，其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你们曾经大量出口粮食而现在却大量输入粮食呢？

缅 我们现在输入较多粮食的原因是：和沙皇俄国时期的消费量相比，我国每人平均粮食消费量有很大增加。沙皇俄国的确向其他国家输出过不少谷物。

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现在平均每人生产粮食量，却与美国的大体相同，只略微少一点。不过，由于储藏不良和其他原因，许多粮食浪费了。

现在回到你所问的体制变化和家庭承包上来。这就是将集体农场或国营农场的部分财产，承包给每个家庭，以便每个家庭按其自己想法经营、生产以及使用它的生产收入。

加 这是一种退回到我们将称为自耕农场的步骤吗？

缅 我不认为这是后退的步骤。

加 那么，是一种前进到自耕农场的步骤吗？

缅 对。在我们整个制度中，总有人在有意识地试图缩小人们脱离生产工具的程度；而在这种情形下，就是缩小作为集体农场成员的农民脱离生产工具的程度。

加 我接受你的纠正。

緬 顺便说说,这种特定改革已在最近几年中付诸实行,并且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加 这样,农民及其家庭就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及如何出售其产品吗?

緬 对。不独农民及其家庭,集体或国营农场也能这样。他们都能按照不是任何人确定的价格出售其大部分产品,也就是他们根据承包合同完成了国家任务后剩下的任何产品。

加 我在莫斯科时,在那里看到两类粮食商店。一类是国家亦即政府经营的,其商品价格比较低。另一类是农民(更多的是他们妻子)出售其家庭自留地上产品的市场,其价格高得多。家庭农场仍将在这种市场上出售产品吗?或者它们将出售……

緬 家庭农场能够通过这些市场出售产品,也能通过合作社出售产品。顺便说说,在你提到的那种市场上农民不仅出售他们自留地上的产品,也出售集体农庄即集体农场的产品。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是在那里出售的。

加 这就是它们称为集体农庄市场的原因吗?

緬 对。现在,我们正试图把更多的集体农场产品拿到城市市场上去卖;不一定到集体农庄市场上去,而是到城市里正在形成的特别市场上去。在那里,集体农庄可以把它们的产品直接售与公众。

加 过去,我曾听说苏联农业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向农场供应包括肥料在内的农用物资;未能使农场得到运转良好的拖拉机;农场产品的购销渠道不通畅。这些问题正在怎样解决呢?或者,它们已经得到解决吗?

緬 现在的想法是:大多数农场需要的拖拉机、肥料和

其他生产物资，将在市场上向出售这些物资的公司购买。它将是一种市场关系，是市场将进入的领域。

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时讨论市场的作用。不过，我想告诉你，从农业这个问题开始，有些人提议市场关系也应该更多地用于其他领域，比如医疗服务以及（或者）住宅方面。

加 人们应当为医疗服务付费吗？

缅 对，房租也应提高。目前，房租低，政府有津贴。可是，我不同意这种变革。我不认为人民准备为这些服务付费，而且我认为，向医疗事业和公共住宅直接投入更多的资本，而不是要求消费者付更高的医疗费和房租，医疗服务与住宅服务的质量将更好。人民向政府纳税，这些税可用来发展医疗服务。

加 你的这种立场与一般美国人的立场有某些相似之处。为医疗照顾付很多钱在美国也是不受欢迎的。

缅 问题是：如果要求人们为原来由公共服务部门免费提供的医疗服务及其他服务付款，如果增加房租，就得增加工资，而这将增加企业负担。这将是一种恶性循环，我看不出什么好处。

加 你是说你满足于一种混合经济吗？

缅 不，我是满足于这样一种情况：医疗服务或多或少是免费的，房租很低。这是大多数人目前的愿望。

加 增加房租将造成太大的破坏性后果吗？

缅 是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有益的事。

加 我来总结一下：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思想是鼓励社会主义经济大结构之内的私人主动性，对吗？这样

说是否确切？

緬 对。我想是确切的。我认为我们希望在政府不能提供足够产品和服务的经济领域和范围中有更多的私人企业参加经营；政府企业应该受到私人企业家更多的竞争。这样，我们将能增加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应。

加 也许我可以用实例来谈。我又一次成为一个苏联公民。我不能建立工厂制造摩托车或者汽车。我能独自维修汽车，或经营洗衣店、或经营饭店吗？

緬 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可以按合作社方式——合作社的或合营公司的——与其他平民联合做你打算做的事情，你也可以独自经营。

加 我必须得到允许吗？

緬 重要的是你不能雇工。

加 我开饭店必须得到国家允许吗？

緬 你必须得到国家允许，并为此付出一笔钱。

加 实际上，得到允许需要多长时间呢？

緬 实际上，如果你愿意付一笔钱，我想时间不要很长。

加 付多少钱呢？

緬 可能很多；这要看你经营哪一种企业。价格是不同的，付钱的方式也不同。你可以为你被允许经营企业每年付一次固定数目款项，你也可以付所得税。

加 这是不是表明：即使经过改革，你们对允许个人独自经营企业，仍然有些勉强呢？个人不能雇工，他开业必须得到允许，而且必须为此付大笔款项。这不是表明某种相当程度的勉强吗？

緬 雇人劳动的私人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根据法律，

资本主义企业在苏联是不被允许的。有一个领域是例外，这就是在与外资合营的企业之中。你可以把这些企业视为一种混合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企业，由外国资本家或私营公司与苏联企业合伙经营。

加 在不干扰社会主义总结构的情形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允许某人开饭店并雇佣少数工人，开洗衣店并雇佣两个助手呢？匈牙利人这样做；波兰人这样做。为什么苏联不允许？

缅 自从 20 年代以来，我们就不曾有私营企业。苏联人民很不愿意再有私营企业出现。

加 这是否表明苏维埃制度在这些事情上有点封闭呢？毕竟，一个饭店老板或洗衣工将何所为而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道义呢？你们不是把他们当成资本家害怕他们吧？是吗？

缅 一旦这种事物广泛传播，新的小资产阶级就会建立起来。

加 非常小。

缅 这将是小的，但他们将是资本家。

加 我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害怕一个布恩·皮肯斯，但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害怕我们佛蒙特地方小店里的老板。

缅 如果他和他的家人或同伙一起经营，我们不害怕他。当他开始雇工时，就不知道会雇多少。今天他雇 5 个人，明天 10 人，那么在两年之内，他可能雇 100 人为他劳动。这就将走上过去资本主义走的道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能证明它有更大优越性，能变得更有效率，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们应走回头路。

加 我同意你的论点。你是说你仍然对社会主义有强烈的神学信仰吗？

緬 我对社会主义有坚定的信念。

加 “神学的”这个词使你厌烦吗？

緬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是：假如人们为别人劳动，他们就感到自己有点象二等公民；所有者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当消灭贫富差别成为我们革命的巨大成就之一的时候，我们应当恢复这种旧日的差别。

加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再追问你；我只想说，你好象不反对一个政府雇员为另一个政府雇员工作，一个官僚为另一个官僚工作。

緬 官僚不一定由于有另一个官僚为其工作而取得物质收获。如果这样，那是非法的。

加 好，这个问题就这样。我还想问你几个有关改革的其他问题。

緬 请，但让我对前面问题略谈片刻。你可以经营一个仅有 10 人的合作企业。这并不比私营企业有多大不同——不比雇工的企业人员有多大不同。差别何在？

加 我对此的认识是：尽管有了改革，我仍然碰到一堵不能突破的石墙——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石墙。

緬 社会主义是建筑坚固的石墙，而这就说明了改革的性质。改革是用来力图改善社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的，而不是撕毁它并回到资本主义。你是对的；我认为你指出了我国改革的实质。

加 让我问你两个最后的问题。当我们研究这些改革时，有一种情况已很清楚。你们允许很多人从服务企业获取报酬，只要他们不雇佣别人从而成为群众的剥削者。你们大大扩大

了自我利益的全部作用。你们在试图将自我利益的道德标准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假定每人都为公共利益工作的道德标准——结合起来时，是否出现问题呢？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美国曾经出现些有害的经验。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人把追求自我利益的目的带进地方、联邦政府中去，将他们的政治职务视为赚钱途径。我们称之为贪污腐化。现在，当你们在苏联扩大自我利益活动的领域时，是否有类似问题呢？

緬 我不认为会这样。我认为这将不至于成为问题，因为象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是建立在自我利益之上的。工人不是为整体社会主义社会工作。他必须为自己工作；他的确是为自己工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按劳付酬。所以原则上他劳动得愈好，他的收入就愈高，他得到报酬的门路就愈宽大。他的个人利益、自我利益是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诀窍和问题是把这种自我利益和整个国家利益以及整个集体和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怎样使它们一致或共同运作呢？这是困难之所在。

加 那么，你承认困难存在，是吗？

緬 对，但这是与你提出的不同层次的困难。即使工人个人不拥有各种生产工具——它们属国家所有——如果他对自已生产成品有兴趣，他就觉得生产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属他所有。他是企业的共同所有者，他得到企业获取的部分利润或收入。在一种意义上，用于生产的机器和物资也是他的；它们不仅仅是在他被剥夺这些生产工具或者对企业活动并不真感兴趣时可能认为的不属于任何人的物资。如果工人只想到自己，而且想谋求最大自我利益，那他就可能偷工厂的物资和其他东西，或者在上班时间利用政府物资和设备为别人

干私活。这也是自我利益，但这是他个人的自我利益，不是工厂或社会的自我利益。或许我们的问题与你们的类似，但属于不同层次。我猜想，你谈的乃是具有私人财产、进入政府工作而且贪污腐化的人。是吗？

加 大概是。但让我谈得具体些。我到苏联来开个饭店，而且我变得很富。在社会主义构架内部，这如何适应呢？你们将允许我变得很富吗？

缅 假如你独自经营一个饭店，可能在你妻子的帮助下，你怎样将变得很富呢？我想你可以变得经济宽裕，但我不认为你将变得特别富。人们不会靠经营一个作为家庭企业的饭店致富。

加 所以你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吗？

缅 我不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基本上，人们是靠操纵别人大量的金钱致富的。

加 现在我想问问改革、公开性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怎样互相适应的？

缅 公开性和民主被看作非常重要的工具，用以控制官僚政治，并防止官僚机构追求也许不是集体或国家利益的利益。自然，公开性和政治领域有关系。但是，当公开性在苏联报纸和电视上现身时，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针对经济体制运作中的各种不同缺点的。

加 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批评制度吗？

缅 这是一种新的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活动实行公众监督的制度；这种制度谴责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做了的不应当做的事情，或者批评它们做不应当做的事情。比如，有许多实例，说明地方政府在其日常活动中一直在干涉集体农场、甚

至自耕农的活动。

加 所以它们就成为公开批评的目标吗？

緬 对，严厉的公开批评。今夏，有许多文章批评地方政府在农业及其他领域对促进个人主动性不愿出力。你曾提到私营饭店和其他私营企业。在许多地区，地方政府对待这些企业一直很官僚主义。它们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对私营饭店和维修店不予帮助，对私营服务业、私营商业等等收税过高；它们用这些办法禁止人们自由地发挥主动性。它们正受到谴责。

加 那么，你是说公开性已成为经济改革的工具吗？

緬 我认为它是经济改革的工具，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有意识地努力扩大民主的又一事例。它是类似于我前面提到的工厂管理负责人选举条款的例子。我同意后者是一种妥协。工厂经理必须由工人选举，但同时必须由有关的部批准。这是妥协，是一种中央计划部门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的调和。这是一种有意识地将工厂所有职工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努力。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改革没有和扩大民主结合起来。民主和经济改革是必须互为补充的。

加 我们遗漏了其他应该强调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某些方面吗？或者说，我们是否讨论了应该讨论的一切呢？

緬 我认为，我们已经很恰当地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改革。

六、资本主义的回顾

緬 我们已经仔细讨论了社会主义某些优越性和现代社会主义遇到的某些问题。那么，资本主义怎么样？你是怎样看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方向的？

加 你已经和够多的拥护资本主义的人打过交道，知道我将说的是：资本主义是完美的，没有问题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前途。

緬 这是我打算和你讨论这些问题时就料到了的，但是，你是否愿意更深地谈谈并解释你的意思呢？

加 假如要我谈，我愿意。我们有一定数量自称为资本主义学者的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1776年由亚当·斯密一手制造出来的，而且自那时以来没有变化。但我极力主张，我们必须象看待社会主义一样看待资本主义，它也经常处于转变的过程之中。

緬 听起来你象个马克思主义者。

加 约瑟夫·熊彼特将马克思描述为亘古以来最伟大学者之一。我坦率地告诉你，我认为他是个太重要的人物，不能由你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垄断。

緬 到头来，马克思自己说，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加 那是在他晚年某个时候。

緬 对。

加 不过，让我谈谈转变过程。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在 18 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之后——没有问题，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巨大的促进。工厂制、资本家的策划，把工业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緬 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对扩大生产具有无限推动力的制度。

加 在某种程度上我接受此说，但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也产生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工人和某些其他集团人民的异化（用现在人们熟悉的一个短语）。

这是资本主义固定在所有者或资本家手中的巨大权力和工人只有极小权力造成的。而且，也是由于资本主义迫使少数不幸的集团遭受非常的苦难。老年人被抛弃，没有收入。工人们在资本家不需要时被解雇，没有任何补偿。特别是妇女受到剥削。还有儿童。实际上，还有许多带根本性的工作——住宅建设、保健、交通运输——资本主义完全没有做好。

緬 马克思曾对此予以总结。他说，资本主义剥夺大多数人；工人阶级的任务是剥夺剥夺者。

加 你也许猜得出，我并不完全接受这种说法。不过，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不久就出现四种新的情况：我冒昧地认为，你也许会承认这些新情况。其一是工会的成长，它大大促进了雇主和雇工之间权力的平等。其二是福利国家的发展，这起源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德国。

緬 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工会出现得相当早，不是吗？

加 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在有些国家比在另一些国家早得多。在美国很迟。

緬 早在上世纪中期，不列颠就有过工会运动。

加 对。但在美国，直到大萧条年代工会运动才兴盛起来。

緬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他们之后的列宁，一向认为工会的建立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新形式。

加 我力图有礼貌些，但我不能接受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一切论点。比如这一说法就是胡说。

緬 你愿意稍加说明你何以认为此说不确吗？

加 工会并不谋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假如这是你的话中含意的话。工会使工人阶级得到新的支持，而且如我刚才所说，在促进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平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緬 你的意思是说工人为他参加生产所费的劳力正逐渐取得充分补偿吗？

加 这要看我们对充分补偿怎么看法。你是在尽力要我说：即使有了工会之后，工人还有剩余价值没有收回来，这又是我不能接受的论点。

緬 还是让我们谈福利国家吧。你刚才说，它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你是说和俾斯麦有关吗？

加 对，福利国家是从俾斯麦时期开始的，而且由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而发展着。从政治上说，也许当时德国的工人阶级是世界上最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共同体。

緬 你也许想到，恩格斯讥笑过俾斯麦的福利国家，称之为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加 这我不知道。我承认你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知识比我的多。

接着，由于不列颠的劳合·乔治在 1910 和 1911 年执行的政
策，和美国的新政以及 1935 年的社会保障法，出现了
资本主义的另一次转变。这是一次即使不完全成功也大体上
成功的努力，它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残酷性，最后
是它在公共住宅、医疗照顾、自然还有教育等领域的缺陷。
无人可以认为，没有那些补救它的弊病的努力，资本主义还
会生存下来。

緬 你是在谈美国福利国家的开端吗？

加 我是说福利国家在美国出现也很迟，1935 年才起
步，但这是很大的一步。

緬 明白了。你承认福利国家或许是一种潜滋暗长的社
会主义，就象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发展起来的某些
私营的、资本主义的形式那样，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展起
来的社会主义形式吗？

加 我不在乎人们用什么术语。在美国，把福利国家称
为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通常的反动说法。我宁可说
这是一种绝对不可少的挽救资本主义的计划。如果不通过福
利国家除去其粗棱恶刺，资本主义将不会生存下来。

緬 所以你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是披着社会主
义的伪装吗？

加 假如你说资本主义移植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优点，我
会承认。

现在回到促使资本主义转变的影响上来，第三种影响出
现在 30 年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
著作和影响分不开的。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日益严
重的企业周期（经济繁荣与萧条轮流出现），或者马克思所

谓的资本主义危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巨大问题。你看，我完全用起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了，我在对你让步。

緬 我不是要逼你在术语上作任何让步。也许你能谈谈为什么经济萧条日益严重。我的看法是：这与大公司的成倍增长、而大规模的需求赶不上很有关系。大规模需求赶不上随着大公司而来的大规模生产，这就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很不稳定，而这也许是 30 年代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加 大体上我是同意这种说法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付给职工的工薪不足，社会上没有足够广泛的人群得到收入以购买产品。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但它接触到事物的本质。

的确是这样：生产能力巨大；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与获取收入的能力小得多。

緬 你将再谈谈大公司或者一般说大企业因此给许多小企业（包括农民）带来大量困难吗？（我这里用的是西方术语；按照马克思主义术语我们称为大垄断公司。）

加 我过一会谈好吗？

緬 当然。

加 这是个非常重要问题。

緬 我是这样想。

加 我已说过，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第三种发展是随凯恩斯而出现的。这就是由国家对于经济的生产水平负责任。其基本构想是：政府预算将补偿私人开支任何不足。当经济中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总需求不足时，国家就将插手。通过减税，或者增加开支，或者两者并用，国家将增加需求、增加生产并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这是凯恩斯革命的基本思想。

緬 不是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证券交易的改革吗？我记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一位主席是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他本人就是 20 年代的一位著名的（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话）证券交易操纵者。罗斯福就这样按照凯恩斯思想，或者与凯恩斯思想巧合，将富裕的或者部分富裕的资产阶级引向资本主义改革。

加 据我看，这是个有趣的、但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无疑罗斯福委任约瑟夫·P·肯尼迪来整顿华尔街，是想到狐狸不独将惩戒鸡子，也将强使其他狐狸守纪律。

緬 但约瑟夫·肯尼迪当时不是被人认为是他的阶级的叛徒吗？

加 还有好几个其他的人，比如艾佛里尔·哈罗曼，还有罗斯福本人。但是，我们对这个论点不要过甚其词。这投合你的新闻工作者的意识，而不投合你的经济意识。

緬 不，我说的这个问题是重要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发现自己据此论点能够产生出一些比看他们自己眼前（在利润与投机中）利益看得更远的人。这有助于引起资本主义的改革，而改革则产生新的体制。

加 我承认这是个很好而且很有趣的论点，我同意。

緬 这个论点出自资产阶级内部，不是从外面来的，尽管受到你在其他地方所称的革命情绪的影响。

加 这确是事实，但我愿加上一点作为脚注。这就是：这些人都认为对社会对自己负有一定的义务。他们认识到公共问题是存在的。他们以为解决公共问题远比私人赚钱（他们已有很多）的工作更重要而且有趣。因此，象老肯尼迪、哈里曼和其他一些当时到华盛顿的那些人，都在为公众服务

的事业中找到感情上的解脱，这种满足之情，是他们在日常资本主义的紧张活动中找不到的。

不过，我必须回到我的主要论点上来。在那些年代里，还有影响资本主义的第四种发展，我也认为很重要。这就是旧式资本家的最后消失并由经理即公司官僚代替。两个也是30年代——那个精神产品非常丰富的10年——重要的美国学者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指出：在许多大公司中，权力已过渡到或正在过渡到经理人员手中。这个观点，在40年代初已为一位最保守的经济学家詹姆斯·伯纳姆在其《管理革命》一书中所采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家已失去权威，至少是他的旧式权威。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緬 我不完全同意。

加 我想这将使你感到困难。

緬 不，没有困难。在我写这个问题的《百万富翁与经理们》一书中，我论证道：不仅在30年代，而且后来60年代甚至今天，你们国家的富人和高级经理骨干都是控制大公司的。有些公司由经理控制；有些由很富裕的人、大股东控制；有些由他们联合控制。所以我那本书的主要论点而且至今仍坚信的论点是：那种由于你们的管理革命而获得成功的经理，真正是与资本主义公司利益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我想，你们美国有些作者是同意此论点的。

加 我想有些人也许同意，但我则是尊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维持资本家的概念不至于消失的需要。

緬 我相信你正在说明的论点极其重要，因为它接触到资本主义而且还有社会主义不断转变的影响的实质。资本主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永远不变的。它分阶段变

化。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主要人物是个人企业家。然后，出现了公司，与经理阶层一道代替了个人企业家。再后来是国家财产、国家干预与大公司的结合——两者之间的混合。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不是坚持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术语，我要说的是：这些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巨大变化和巨大生命力。而且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的类似变化。据我的看法，引起这些变化的是生产技术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之故，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些变化。在现代技术时代，私人企业家不再是主要人物，而且自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不是。

加 现在让我进一步谈谈这些发展。我相信我说的这四种转变因素对保证资本主义的前途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控制劳动与工作条件的全权仍然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如果没有福利国家，如果经济萧条继续而且日益恶化，如果经理没有代替资本家，资本主义不会存在下来。如我刚才所说，在本世纪早期，异化现象已经很严重。而现在大体上说，人们已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

缙 不是被工会和工人阶级接受吧，你说呢？

加 是被工会和工人阶级接受。整个说来，美国工会是非常保守的。

缙 是吗？

加 在许多方面，美国工会运动比我更保守。

缙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来接受吗？

加 至少，他们象我一样倾向于接受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緬 这是因为他们的工资高于(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吗?

加 我不怀疑高工资使得人们一定程度地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我发现,优厚的报酬甚至让我心里也感到高兴。

緬 我想我要回头再谈谈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其余部分的工资之间的差别,不过现在请你继续谈。

加 我重复一次,由于上述四种发展,在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中,资本主义制度已大体被人们接受。战争使美国经济回到充分就业的状态,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当时必要的极大公共开支的结果。战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此,我认为自己有一定功劳,因为我是直接控制物价的负责人之一。战后25年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真正非凡的时期。物价稳定,生产不断增长。在这25年中,只有两年生产未增加,而且整个时期几乎都是充分就业的。这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可靠性。

緬 有少数论点我不便同意。实际上,在此期间,欧洲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货膨胀很厉害。美国不象那样厉害,不过在朝鲜战争和越战期间,美国也出现过通货膨胀。

加 和后来的程度比较很轻微。

緬 也许和后来程度比较是如此。至少5%或6%。但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的失业很厉害。

加 不很厉害,通常约5%或5.5%。

緬 我想高于此数,最高达到约7%,而且当时被认为是美国的问题之一,在一个时期并被民主党称为美国的第一号问题。

加 民主党人可能夸大；甚至共和党人也如此。

緬 我大体同意在美国和欧洲这是一个真正的增长时期，在日本更是如此。但是，你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和日本力图赶上美国吗？自然，它们曾受到战争破坏，而美国则在经济上颇得益于战争，所以欧洲人和日本人为赶上美国有一大段路要走。而在赶美国过程中，它们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刺激、还有市场。

加 我同意这有其作用。在此期间，日本人和德国人光顾和资助包括机械工具工业在内的我们的资本货物工业。无疑这是重要的。但我将说，更重要的是造成大萧条的一般紧缩倾向的继续存在。这些倾向限制了通货膨胀；政府又对此作出反应，出来大力支持经济，办法是减税、增加社会开支从而维持需求，都是些非常得人心的事情。

緬 我同意在那些年内仅有短时期的衰退。但是，由于技术的新发展和革新，也有许多新工业出现。我相信这些新工业的出现，有的得到政府支持，有的没有。即使没有凯恩斯革命和政府的支持，它们也会迅速发展，因为它们是新工艺，和旧工艺竞争起来很有力。飞机制造业不是没有凯恩斯革命发展起来的吗？

加 电视不也是吗？

緬 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不也是吗？

加 我同意，但我仍然很强调在那些年里国家在维持几近于充分就业方面的成功作用。

緬 你是否同意为其会员即工人阶级设法获得国民收入中相当固定的一部分的工会增加了需求呢？

加 绝对同意。

緬 除了政府的措施外，是否工会也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呢？

加 肯定是。我认为工会运动对维持需求具有积极的作用。

緬 据此，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是有良好影响的，是吗？

加 是的，如果你想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也无不可。

緬 在你谈论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你没有提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巨大组成部分——殖民制度。殖民地现已变成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大体已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并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发展。

我的感觉是：在过去，最发达工业国家是以牺牲世界另一部分即所谓第三世界而得到实惠的。它们很容易得到便宜劳力、便宜物资，总而言之是地球上所有的巨大资源。这些，使得它们有可能取得较高的生活水平，付给它们工人高得多的工资，而所有这些又有助于工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并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与经济稳定。你同意这种估价吗？

加 仅在有限程度上同意。人们必须记住的是：从美国的情形看，直到最近，我们大体上是个内部支撑的经济。相对于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我们的外贸，输出入同样是很小的。因此之故，直到 15 年以前，你举出的那种发展的任何影响是有限的。

緬 让我举个例子。在某一时期，锡和天然橡胶对美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我不说是关键性的，但是重要的。它们产自英国殖民地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比如玻利维亚，而相对

说来，它们是真正价格低廉的。这是由于殖民地条件造成的低劳动成本之故。如果锡与橡胶不能以低价从国外购买，美国人就必须发展自己的锡和橡胶工业或者这些产品的代替品。

加 我不象你那样太强调此种情况。但我的确同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对我国机械的需求，和海外原料供给的总形势，整个说来，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

緬 你谈的是美国经济，但也许对欧洲和日本经济说来，这更是事实。

加 十分可能。

緬 回溯到更早的时期，这种事不是导致了殖民地的争夺、而且在某一时期导致了一次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吗？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战争是为了获取殖民地而打起来的。

加 你的确回到了一个更早的时期。

緬 是的，因为我认为这是欧洲和美国高度发展而资本主义制度其他地区相当低度发展的原因之一。

加 我上面谈的是较近的时期。你是回到列宁的论点：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活，是以牺牲殖民地被压迫人民为代价的。

緬 列宁指的是工人贵族，不是所有的工人。发达国家的有些工人被垄断组织所腐蚀，后者用它们从殖民地获取的超额利润来付给他们高工资。

加 我对较早时期的看法不象你那样肯定。我不认为美国从它在菲律宾、波多黎各、甚至巴拿马(除运河以外)的殖民地得到很大好处。你所谈的情形，也许和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有些关系。

七、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

缙 你已谈了许多关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凯恩斯革命、福利国家以及工会的积极方面，但是，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再也不合口味了，至少福利国家和凯恩斯革命是如此。我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出了什么毛病？

加 很好的问题。从1945至1970年，我们有过25年好时光，但好运气不再继续。有一种解释我希望看到它广泛流行。这就是：一代经济学家是所有那些幸运的原因；我属于这一代人，他们日渐老迈，较年轻而能力较差的一代正取而代之。不过，我不认为这种分析将被广泛接受。

缙 但是，这种说法可能与已发生的情况有些关系。如果更能干的凯恩斯主义者现在真正管理着经济，或许资本主义会更有成就。

加 我将谈正经的。有几种事态已经损害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其中有些和我们前面谈过的损害社会主义运行的事态一样。大公司和管理革命已使大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官僚主义化，而这又导致某种你在社会主义世界已发现的动脉硬化。

缙 关于这种公司官僚主义化消极影响，你能举个例子吗？

加 比如美国和其它国家钢铁业、巨大钢铁公司的衰落。

缙 也许，为你所说的官僚主义辩护，我应当指出：钢

铁业的衰落情况遍及全世界。这可能是新物质与钢铁竞争或物质密集程度较低的经济竞争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公司官僚主义的失败。

加 我也认为原因不只一种，不过，假如你很熟悉美国重工业的管理，你就不会怀疑一直存在着这种动脉硬化症。当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导物价管制时，我表述了我希望将被称为加尔布雷思的“行政才能第一定律”。这就是：所有重要的总经理从智慧方面来说，最后都象他们制造的产品。直到你终于和钢铁公司的最高官员打完交道，你都不会真正欣赏一块钢坯的智能。

缅 这种衰落是竞争日益减少、大公司垄断的结果吗？或者是内部僵化的产物。

加 我认为是后者；不过，人们还是不应当只限于一种解释。过去15年中我们遇到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可以继续谈吗？

缅 可以，但请稍待。在战后年代，其他国家与美国竞争不多，当时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享有一种优越性。这不是加强了你所谈的大公司的官僚主义化和僵化吗？

加 没有疑问。戴维·哈伯斯塔姆对美国汽车工业的这种情况写得很详细，指出一种欣然自得的满足感是怎样导致它的衰落的。

缅 列宁曾说过，没有竞争孕育停滞；我说导致官僚机构僵化的情形是一样的。请继续谈其他的论点吧。

加 当然，第二件不利于美国的事态发展是新兴国家和地区——不仅日本，还有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日益增长的力量。它们的工业已经侵入美国的市场和其他较

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而且对旧的大规模工业具有特别不利的影响。

緬 是否美国、日本、也许还有欧洲的资本主义将它们大公司的某些生产转移到新近工业化的国家去，对于在那些国家建立竞争性的工业起了作用呢？

加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这个论点可能容易被夸张。新工业公司中最成功的日本公司和美国的多国公司极少联系。

緬 我是说的南朝鲜和台湾。我认为你说的是新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当你说“新”时，不是意味着它们吗？

加 我心里想的是日本——我认为我说的是它。而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作为跨国制造公司的区域不曾是那么重要。

緬 我听信别人的话：新近工业化国家中的许多工业，或者是与跨国公司签订契约建立起来的，或者是由跨国公司特许建立的。

加 这是你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公司是全能的而且无所不在的。

緬 不，关于这个问题，我读过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书。

加 让我们继续谈资本主义运行恶化的其他原因。在过去 15 或 20 年中，我们在凯恩斯主义体制中也发现内部矛盾。当需要政府支持经济时，解决办法非常容易——减税、增加开支。这是些政治上非常受欢迎的补救办法。但如你所知，在 70 年代，通货膨胀成了问题。显然，这要求政府减少开支，提高税收，也提高利率。所有这些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这里，就是我将描述为凯恩斯体制的政治上的不对称现象。

緬 通货膨胀是凯恩斯体制本身的结果。这不确吗？

加 不，我不这样认为。它部分是我们在先前谈话中我说的四种有利因素之一的结果。这就是工会的发展。

缅 工会怎么有这种影响呢？

加 工会有力量提高它们成员的工资。这就引起补偿性物价增长，物价增长又引起较高工资，于是在公司经济中造成一种独立的工资—物价螺旋线。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只能通过很严厉的反通货膨胀措施才能控制；只有通过大量失业才能控制。这是这种形势下的新因素。

缅 但是，高工资不是较少失业的结果，而较少失业不是凯恩斯体制的结果吗？

加 仅在一种边际程度上。高工资更多的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期中工会力量的增长。

缅 但是，不是较少失业帮助它们取得这种目标的吗？

加 我还是要说：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大公司和强大工会交互作用的力量。一种独立的工资—物价动力。再说一次，这只能通过大量失业被遏止。

缅 为什么公司不能通过提高生产率、使工厂与设备现代化来解决其因提高工资而成本增加的问题呢？

加 这里，你又回到我们已谈过的问题之一——资本主义制度官僚机构的僵化。而这当然是革新的天然限制。在某个一定的时间，只能产生那么多发明。

缅 但这是个技术进步非常迅速的时期。我认为美国工业的生产率直到 60 年代晚期一直是迅速提高的，不是吗？

加 是的。不过大体从 1970 年起，这种生产率的增长有些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另外我没有说过的原因。我们把过多的技术才能和资本用在军事方面去了。

緬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加 这是我打算在后面要问你的涉及苏联的问题。

緬 好，让我们以后讨论军事问题，现在再谈一谈关于工资的论点。你原来谈到凯恩斯没有预见到的工资问题的严峻性。

加 不是严峻性，而是由于物价上升造成迫使工资上升的压力，反之亦然。

緬 是否大多数这种上升的压力源于上升的物价而不是源于工资的增长呢？作为二次大战时期管制物价的长官和后来的物价观察家，你同意有很多习称为管理价格的东西吗？这种价格导致价格的严峻性和物价与工资上涨的压力。不能只看到高工资造成的紧张，是吗？

加 让我根据我的看法彻底说清楚这种工资—物价螺旋线是怎样形成的。现代公司有力量提高物价——如果你愿意，就叫管理物价——而不是让物价在市场上自然地确定。工会也能提高工资以赶上物价。如我前面所说，其结果是造成工资—物价动力；在这种动力中，工资推进物价，物价又拉上工资。无疑我不想完全责怪工会。也不想完全责怪公司。我将责怪两者之间制度上的关系。我可以再加一句吗？

緬 请。

加 看到有些国家在控制这种倾向方面取得了成功非常有趣。

緬 你说的是工资—物价螺旋线？

加 是。我以为最好的例子是奥地利和它的“社会市场政策”。奥地利人限制工资只能提高到现存价格结构经受得住的程度，而且监督公司不让其利用这种限制，并将之作为

正式的公共政策。但是，在另一些国家——日本、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有不那么正式的办法。由于不插手工资—物价动力，说英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例外。而它们正自食其果。

缙 我明白了。你对于凯恩斯方法的不对称现象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印象。看起来，凯恩斯主义是为存在大规模失业和低通货膨胀压力的时期提出来的。实行的结果是：凯恩斯体制在有了大公司、大工会时不那么有效。

加 工会和公司的力量使得它对付通货膨胀不那么可行。

缙 你的意思是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管理或控制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容易也不适合吗？你们必须有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的简单办法更有效的办法吗？

加 绝对是这样。

缙 但是，即使如此，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把凯恩斯经济学从国家运用的武器中清除出去，不是太早了吗？看看经济政策中的货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吧，它们不是管理经济的甚至更简单化的药方吗？

加 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政治上的困难——提高税收与削减开支的困难、由工资—物价螺旋而产生的附加困难——导致美国和英国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寻求一种魔术的、无痛苦的公式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我们找到的魔术是货币主义。一切由中央银行负责。固定货币供应量，只在经济增长时加以调整，于是问题就解决了。发现我不是货币主义者，你将不会感到意外。

80年代早期，我们了解到，这种魔术能起点作用的，

只是在它制造出极其大量的失业者和很大闲置工厂生产能力的时候。还有个重要的情况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它只有在极其严重地削弱雇佣公司的时候才起作用。

编 你愿意更详细地解释一下吗？

加 可以。货币主义通过非常高的利率起作用。因此缩小公司投资。高利率还鼓励外资流入，这种外资还哄抬美元价格，使输入品便宜，而这又进一步削弱我们的钢铁、汽车和其他工业。接着是：工会再不能要求提高工资，除非冒雇佣公司关闭的危险。于是，不但工资不能增加，它们还得协议后退。象在钢铁工业中那样，仅仅为了使公司不致倒闭，这也是必要的。这就是货币主义实际运行的情况。它既不会遏止通货膨胀，反而使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比它谋求诊治的疾病还要坏得多的补救办法。

编 你是否同意：除了货币主义的所有这些缺陷以外，70和8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速度减缓还有其他原因呢？有燃料价格的增长和因退出基本工业而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迁。这意味着许多曾经一度领先的工业的停滞，而另一些象微晶片、微型计算机工业、生物工艺与新物质的发展呈现新的繁荣。是否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有助于引起一个目前仍在继续的增长非常缓慢的时期呢？

加 我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关于石油价格增长对通货膨胀和工业运行的影响有些夸张。那些在卡特政府时期负责经济政策的人，工作没有做得很好，而且在经济学家中有一种明显的寻找替罪羊的倾向。这样，把我国的问题归因于阿拉伯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很方便。不过，我同意变动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因素。这不仅出现在你所提到的技术领域，也

出现在很大范围的其他活动中。

緬 例如？

加 有一种向娱乐、电视、一般服务业转变的倾向。在事物运行良好之后，人们要求它们好看，于是艺术变得重要起来。这是人们尚未充分认识的趋势。

緬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货币主义是一种过度简单化的理论，不仅因为它冒充全面宏观经济管理，而且因为它绝对忽视深刻的结构变化(包括你所说的)。

加 我高兴听到你这样说。我相信货币主义将不会在社会主义世界变成一种流行的风尚。

緬 我不认为会如此。但请对这个问题略微进一步谈谈。

由于近来执行的某些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你是否责备货币主义者过多呢？不是由于凯恩斯让位，还出现了其他思想派别吗？

加 我不准备谈凯恩斯让位。我准备谈凯恩斯主义政策遇到的困难。而且我想把货币主义者对我们当前问题所作贡献的全部功劳归于他们。

緬 但是，供应学派经济学和所谓里根经济学(它把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经济学、预算平衡等等真正结合了起来)怎么样呢？

加 我原就担心你提到供应学派经济学。我认为这给你一定有利条件来对付资本主义。

緬 在那一方面？

加 供应学派经济学从来就没想被人认真对待。这是加利福尼亚一位叫阿瑟·拉弗的经济学家的著作。

緬 这是从“玩笑”^{*} 这个字来的吗？

加 不是，尽管也许有联系。拉弗教授表明：假如不收税，政府便无收入，这是对的。他还表明：假如税率为 100%，即政府把全部收入拿到自己手中，就没有人纳税，这也是正确的。然后，他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手画一个曲线，并且说，在此曲线上有个一定的点（这是他任意选择的）；如果据此点减税，政府的岁入就会增加。经济学家们并不认真看待他的分析。

緬 但是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的想法。我告诉你，在苏联当前改革中，对企业收入减税，肯定会由于企业及其工人加强主动性而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供应。

加 在美国没有迹象表明：对个人或公司收入的高税收实际上阻碍增加生产。

緬 那为什么减税呢？

加 减税是为了富人的利益。但是如前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所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中，这是决不可能被人们承认的；你只能得到一种真情隐蔽了的说法。而且，如斯托克曼先生所指出：供应学派经济学就是这种为了给富人减税的托词。我讨厌承认此事，但我们在这里是为真理而斗争，而这是真理。

緬 减税也是为了公司，这是真的吗？我现在说的是里根经济学。

加 这是个很好的改正。总之，从整个时期看，对个人收入的税收有实质性削减，但对公司税收削减不力。多少有所减少，但不多。

^{*}拉弗(Laffer)和玩笑(Laugh)两个英文字有些谐音。——译者

緬 现在公司税约为 34 % 或将为 34 %，而不是 46 %，这是否确实？

加 这个问题很难答复，因为阻止了公司的大量逃税，所以不能肯定公司税下降了很多。确有人争论说，公司税增加了。

緬 当我写《百万富翁和经理们》时，美国最富有的家庭（那些一年有 100 万美元以上收入的）实际纳税的税率为官方税率的一半。假如官方最高税率在 70 % 左右，由于逃税，他们纳税大约占收入的 35 %。

加 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总有些人完全按官方边际税率纳税。

緬 不过，供应学派理论的确一点也不是新理论。凯恩斯主义者不也总是说：通过减税能够给经济提供刺激吗？

加 有些凯恩斯主义者采取这种立场：我不属于这些人。在 60 年代早期，我曾与我的一位重要朋友，已故沃尔特·赫勒进行尖锐争论。他主张减税，而我则主张通过较大——而且很重要的——社会开支刺激经济。

緬 我认为在那次讨论中，你也许比你的对方更正确。假如一个人考察里根经济学的结果，我认为他会承认低税收只导致了较大赤字，而不是较多生产。

加 我认为这是对的。

緬 你是否同意我的这种看法：里根经济学的结果是造成联邦预算和国际收支中的毁灭性赤字，而且，首先是大量的失业呢？美国近来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在采取类似的新保守政策的西欧还是高达 10 %。

加 我不是里根经济学的支持者，而且在适当的时候，

我将提出我相信将被认为非常英明的某些代替办法。

续 新保守主义还有另一种影响我愿意说一说,那就是:预算赤字和较低经济增长率有助于引起一种反福利国家的运动。我现在说的是广泛为人所知的福利国家危机:在军事开支日益增长的同时,只要可能就削减社会开支。你觉得这也是由货币主义和保守主义经济学造成的当前困难的一个惹人注目的方面吗?

加 这是我已屡屡提出的论点:的确,我可以指控你读过我过去的某些著作。我曾经攻击过这种观点:在美国这里,富人一直不工作是因为他们钱太少,而穷人一直不工作是因为他们钱太多。福利国家也自食其成功的苦果。当人们确信其到了老年有收入、确信有失业补偿、确信有其他福利时;当家庭收入增多时,人们有变得更保守的一定倾向。这削弱了给我们带来早期福利国家的政治责任感、同情心和忧国忧民之情。

续 在社会主义下,我们有些人提出通过缩减免费医疗服务、免费教育、低价住宅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以精减我们的福利国家。这些人自称为进步的改革者。在你们这种情况下,这种人被称为保守派和反动派。

加 我准备承认这种术语上的差别。

续 他们是在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条线的两边被称为这些不同名称的,这是否值得注意?

不过,现在让我再提提集中这个问题。你知道,马克思写过集中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集中到了这种程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公司攫取了企业的主要部分。你是怎样看当前的集中的?

加 我相信在我们经济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全部生产的约 2/3 来自 1000 ~ 2000 个大公司。而且这是所有工业国家的一般情况。马克思认为，最终将只有如此之少的公司，它们将容易被推翻——这将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但我不认为关于资本主义这种预言正在实现。

缙 我记得列宁在探索这个特殊问题时指出：垄断组织或大公司不能消灭中小企业。所以两者是共存的，而这造成这两部分经济之间的某种冲突和矛盾；一部分倾向于实行垄断——管理价格，另一部分代表自由竞争的旧世界。

加 你的意思是有一种企业家的企业和巨大的经理人员管理的公司的共存吗？

缙 完全正确。

加 我接受这种看法，不过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们可以与之共处的。

缙 你的意思是你不觉得大公司的经营是以牺牲小企业为代价的吗？

加 并不特别是那样。我有许多问题要担心，我很高兴把这个问题完全置之—旁。

缙 不过，这个问题存在吗？

加 我简直不能肯定它存在。

缙 好，我近年来一直在观察的一种集中形式是跨国公司以及跨国银行的出现。我以为现代资本主义正向这样一种局面前进：资本主义世界整个企业的大部分日益由这些全球性企业经营，这些全球性企业的利益是跨国的，而不是一国的。我感到这对民族国家及其经济政策造成危险。你同意这个命题吗？

加 我的许多自由主义(美国意义的自由主义)友人花了很多时间操心跨国公司(有时称为多国公司)的问题。我没有。我相信它们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特征。我倒是赞扬它们的这种趋势:建立相当于国际行政机构的组织,削弱国家主权的某些更为咄咄逼人的特征。在整个上世纪和本世纪的前半叶,我们极大地遭受主权国家之间冲突的苦难,而每一方的大工业却因此大为得益。今天,当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法国和德国经营企业时,它并不象 100 年前大钢铁公司那样,欣赏那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我渴望有多国公司在苏联与美国之间经营业务的那一天。

緬 我认为跨国公司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这是我们不能反对的趋势。这是一种未来的趋向,这个浪潮是不能逆转的。

可是,在跨国公司的经营方式中,有许多消极面。比如,一个消极面是它们忽视存在于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在过去几年中,有许多时候跨国公司关闭了在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工厂,而不管该国当时的就业情况如何,并把生产转移到另一国家——有时是劳动成本低的国家,有时只是因为第一个国家的企业总形势不利。

现在,我想你将同意这样的行为的确真正影响当事国家的就业政策;它造成许多困难。我了解有些困难也许是由于实际企业问题引起的,但应当和这些国家政府和有关工会讨论这些困难;有关各方的利益不应被忽视。

加 我同意应当和工会及政府协商。这在美国特别重要,因为最近几年我们由于工厂外迁到那些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

(包括太平洋盆地的国家和最近时期的墨西哥)遭受很多困难。不过,如我前面所说,在这些情形下,最大的关注应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要有固定收入。如果他们已成年,其收入应能保证生活。较年轻的人应该通过重新训练或者重新安置来得到帮助。不过,我准备承认这种国家之间的工厂迁移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

緬 这是否是事实,当一个国家政府施行充分就业或相对充分就业,或者只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支持或增加总需求以缓和周期衰退影响的政策时,或许完全无视这些政策的跨国企业的行动,由于削弱这个国家政府的管制,将造成更多的问题呢?

加 我不这样想。

緬 你的理由呢?

加 我不相信包括国际公司在内的大公司对于影响就业的总需求的增加或减少的反应,和小企业家企业的反应不同。

緬 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小企业是在本国之内,并将留在本国。它除了力图在本国疆域内继续经营之外,无其他路可走。跨国公司则不然;遇到衰退时,它将关闭其工厂,并且完全放弃在那个特定国家的生产活动,使该国政府支持总需求与充分就业的工作困难得多。

加 象我的许多自由主义友人一样,你太看重跨国公司了。我们将只好同意彼此保留不同意见。

緬 这显然是个彼此意见不同的问题,不过我想说,这也是个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小国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象你这样生活在生产一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产品的美国也许你们不

象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深刻感觉到跨国公司的影响。而这和他们是有关联的。事实上，他们的关心反映在联合国之内建立了象跨国公司委员会和跨国公司中心这样一些组织。欧洲和全世界的国家正在试图制订一个跨国公司的行为法典。

你的意见不同，我尊重它，但我只是想说，这儿是有分歧的。

让我再说说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过由跨国公司建立一种国际行政机构。鉴于你在我们以前的一次讨论中谴责公司官僚机构的情况，这种意见对我说来是相当奇怪的。是否你说的国际行政机构不过是具有国际规模的同样的官僚机构？它可能非常具有限制性而且是非常静止的，将导致世界的、而不仅是象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

加 我承认你的论点的一部分。当我说国际机构的好话时，我称之为国际行政机构。但是，如果我说它的坏话，当然我就称之为国际官僚机构。

不过，我的较大的论点仍是可以成立的：这是一种跨越国家主权障碍的组织，而且一般说是我赞成的组织。重复我前面说过的话：在以往，由于防卫国家主权，世界遭受了过多的苦难。

缙 你不担心日本银行正在收买华尔街的一些银行，或者日本公司正在收买美国的一些公司吗？英国公民不应当担心半个伦敦已为国际投资者收买，使得伦敦银行对英国经济前途兴趣较小而对整个世界兴趣较大（这完全有害于英国工业）吗？

加 不特别担心。我将更关心纠正我们自己银行与节约组织（如我们所称）当前的某些活动。以后将说说更为基本的

补救办法。那就是纠正我们的贸易差额以便不将如此之多的钱放到日本人手里，然后又由他们把这些钱拿回美国投资。

缙 我另外的关注是：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倾向于支持美国的超级大国主义。美国已建立一个全球经济帝国并通过跨国公司在世界上传播其活动这一事实，似乎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个总的论点：美国由于其全球利益是一个超级大国。

加 我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指责你非常陈腐。而且实际上你自己已经承认。几分钟以前，你用关于日本银行和日本跨国公司的活动吓唬我。现在你又告诉我：我们应当关注我们自己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力量。我仍然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太固执了。

缙 我明白你不担心跨国公司的问題，而且理解你的态度，但我看不出你拿出过任何合理的论点来支持你的立场。既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互相理解，也许我们应当继续讨论其他问题。

加 这是个有益的建议。

八、“加尔布雷思改革”

緬 在一次较早的谈话中，我们广泛地讨论了苏联的经济改革或者戈尔巴乔夫革命。现在我们可以转而讨论美国变革的可能性吗？在美国，除里根革命或白封的里根革命外，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种革命。你将称里根革命为革命吗？也许你将提出一系列不同的建议吧？或许称为“加尔布雷思改革”？

加 我一直不愿意把革命这个词用于因里根先生而出现的变化。我认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是暂时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和货币主义是过渡性步骤，并将消失。我更愿意我们现在的讨论集中于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应当做的事情。我很高兴你提到加尔布雷思改革，但是我必须对我们的读者指出：这是你的术语，不是我的。我要保护我的极其谦虚的声誉。

緬 你觉得里根革命、撒切尔革命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各样类似的革命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道路，并不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运转的实质性变化。你相信必须有不同的变化。我对你的理解正确吗？

加 对，正确。要理解资本主义就要求我们承认公共政策中一再出现偏差这个事实，而我认为供应学派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就是这样的偏差，是经验和明智的判断将要扭转的、而且正在扭转的偏差。

緬 我多少有点担心这个特定的结论。我觉得这不是些单纯的偏差。人们倒是应该根据下列事态的发展来看它们，这就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内部非常保守的、正力图扭转我们前面谈到的凯恩斯主义改革潮流的势力的脱颖而出。凯恩斯提出的建议，其目的真正在于使资本主义制度按照更好、更有效、更人道的方式运行。也许你即将要提出的改革——我再一次称为加尔布雷思改革——更是按这种路线进行的。

加 让我们谈谈应该做什么吧。首先，我将提出这个总的、根本的论点：现代资本主义已经生产或能够生产足够的货物。我们不会遭受生产不足的困难。

在美国 80 年代早期的衰退—萧条中，我们不思念没有生产的货物。人们对此不曾评论。可是，我们的确非常担心没有得到保证的收入与就业。所以，我认为现时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不是物资或服务的生产；那些是可以实现的。中心问题是保证所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参与者有可靠的丰富收入。

这里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我们一直有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来衡量进步的倾向，这是错误的。我喜欢用在社会中具有充分作用、可靠工作的人的数目来衡量进步。

緬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觉得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经济发展到全部人口的必需产品与服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那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一般生活质量。我认为，这种看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日益得到承认。

加 是的，但对我国的情况，我们将再谈两点。象所有

善意的美国人一样，我对社会主义成就只给予勉强的赞扬。不过我们有两个问题是你们没有而我们必须解决的。

第一，特别是在大城市内，我们有太多的人没有就业，没有收入；这是些我们现在的确称为下层阶级的人。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第二，如果我们考察较大的结构，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的不平等太大。而且不幸的是，在最近的这些年里，这种不平等一直没有得到改进；相反，还日益严重。我们总收入的太多部分到了收入阶梯顶端的一小撮人手里，到达收入阶梯中间和底部的人手里的一部分太少。

编 你愿意稍为具体一点地描述为促进上述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你认为必需的措施吗？

加 你问得对。指出问题，比说明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容易得多。

首先，我将主要强调加强我们的社会与福利计划，以便没有就业的人有可靠的收入。我心里想到的是抚养子女的妇女、有需要瞻养的儿童的家庭、身心有缺陷的人。必须减轻这些人的困苦。我也将为解职的工人制订过硬的重新训练计划。我还要为良好的中小学教育花更多的钱。有一个可适用于全世界的通例：极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穷人；几乎没有受很少教育的人或文盲不是穷人。

编 但是你承认有些受教育极少的人事实上很富吗？

加 我愿意不无遗憾地承认这一点。在哈佛大学从事教学的50年中，我甚至在那儿也遇到一些这样的人。

编 听起来好象现在美国的福利由一系列针对不幸者——没有就业的、残废的、如此等等的人——的措施所组成。

甚至“福利”这个词的内涵也不同于更为临时性的失业补偿。你是否觉得你所谈的社会计划——福利计划——不仅应当针对处于那种情况的人，也应针对人口中的较大部分呢？我心里想的是那些有工作但或许需要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达不到他们需要的数量的人。这些不能满足他们需要量的东西是价廉物美的娱乐设施及其他东西，也许还有保健服务。你认为应该沿着这些路线发展吗？或者，你认为这将由市场来关心吗？

加 不。我不认为这将由市场来关心。约 30 年前，在《富裕社会》这本书中，我认为我们的趋势是私人富裕而国家贫困。我将继续强调改进除富人以外所有人都需要的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我心里想的是我刚说过的中小学教育、娱乐、图书馆、清洁街道、使街道安全的治安服务，当然还有医疗照顾。

缙 也许还有公共运输吧？

加 公共运输和公共住宅。一个奇怪的生活事实是：在任何工业国，市场制度不为穷人提供良好的廉价住宅，这是资本主义的巨大缺陷之一。

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我们做得很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自我评论的时代应该承认的。我们提供非常好的大学教育；我们的州立大学是优越的社会事业机构。而且我是我们公共电视系统的十足崇拜者；我们对此谈得不够。不过，我的确觉得，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共富裕与我们私人富裕并驾齐驱，我们仍然必须做很多事情。我前面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是更良好的环境保护。

缙 我们可以转而谈论宏观经济政策并且看看那一方面

是否需要变革吗？

加 这是我的大多数经济学同僚愿意开始讨论的领域，而我并不完全觉得它到了可悲的境地。那个领域需要巨大变革，而且可以非常简单地加以描述。

在最近这些年里，我们一直依靠货币政策、很高的实际利率以及作为经济管理者 and 反通货膨胀保证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魔术。就在你来到佛蒙特之前，新闻界对谁将出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很是激动。沃尔克先生为格林斯潘先生所取代。事实上，这件事重要性不过如此。我们必须不再为货币政策所迷惑，也不要对与之相关的假定抱幻想，这种假定是：资本主义可以用它的魔术来指导和管理。

缙 他们两人都不是华尔街的人物吗？所以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是吗？

加 我不得不同意；并无任何区别。重要的不是更换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领导，而是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必须更多地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更少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最简单地讲，我们现在应当动手增税，减少现时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大大降低实际利率。降低利率，成本减少，就会鼓励工业投资与建筑。这对经济将是一种刺激，而且将导致主要工厂和住宅的改进。

再重复一次：我们最近这些年太多地依靠假想的货币政策魔术，太少地依靠健全的财政决策。

缙 你的建议将是很不受人欢迎的。增税将使大多数人民象富人和公司一样皱眉头。提倡更高税收不是受人欢迎的事，而且现实主义地说，或许难于实现。

加 作为经济学的控制工具，高税收比高利率好得多。

我还是希望：长远的好处将取代暂时偏好。

緬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长远好处。

加 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太多，你将损害我的名誉。

緬 但是，在我开始对某种其他问题与你发生矛盾时，我总是这样说的。我相信或许增些税是必需的，但在美国的实际情况下，如我所说，将是难于实现的事。

我认为，或许人们将要求更多地削减开支。不过 既然你刚才已谈到发展福利国家的问题，就不能削减这方面的开支，只能削减比如军事和国防开支。

加 我非常希望他们能这样。这是我即将提到的论点。现在让我说一说。这是我特别希望有苏联合作的一件事。

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军事倡议，就促进我国的一个军事倡议。你们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便成为我们提倡新军事开支、发展新武器的借口。我们在导弹方面做点什么，你们就跟上来。这是一种一方的军事权势集团支持另一方的军事权势集团的机制。而且显然能够导致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最终核毁灭。这也极其有害于我们两国的经济福利。

緬 只从最近的过去来说，我认为你可能是正确的。但在这些问题上你稍为落后于时代。过去少数几十年的历史肯定是武器竞赛的历史。在这里，我不认为追究谁首先发难、谁走第一步的问题是有益的。

加 我是小心回避这样做的。

緬 对，这样做不会有结果。然而，在过去两年中，在戈尔巴乔夫先生领导下，我没有看到苏联有任何军事或武器倡议。我的确知道我方曾倡议削减武器，而这些倡议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美国政府配合。因此，我认为有希望。让我们后

面再回到削减军事开支的问题上来。

加 我感到你的说明是极其鼓舞人心。我希望你也感到我的说明鼓舞人心。假如我们不能在任何其他问题上说服我们的读者，至少我们希望在避免武器竞赛对双方有利这个问题上说服他们——我们两国人民。

缅 当然有些人会争论道：削减军事开支将增加你们国家的经济困难。

加 我曾煞费苦心地考察过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而我简直不相信这种说法。要我说清楚些吗？

缅 如果你愿意，那将是非常有益的。

加 首先，清楚明白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巨大的成就，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在日本和西德出现的。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开支相对说来是很小的——日本的军事开支更是微小。两国都得以利用其熟练人力和基本资源改进其民用工业。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则用了多得多的人力和资本制造武器。

而在当前的美国，或许在我国历史上以前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我们面临公共急需的压力，有些我前面已提到。我们的交通系统在倾颓、严重缺乏低价住宅、城市亏空不断发生、教育人力与设备日益严重不足。因此，我们现在用于军事开支的钱，是应该用来应付这些迫切需要的公共开支的。

缅 你说的是用于军事开支的美元“机遇成本”增长巨大。后来的开支相对说来日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昂贵。

加 “机遇成本”——放弃选择报酬——是个很好的旧经济学名词。我高兴你提醒我应当用这个名词。

缅 但是，没有很多人认识军事开支的这些巨大消极后

果。

加 相反，我将说这个论点比人们认为的得到远为广泛的认识。而且一直日益得到更透彻的理解。我认为你这里反映出一种共同的自卑情绪：以为错误的人比正确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更大的道德力量，那是美国的倾向，或许也是苏联的倾向。

缅 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要说一说，苏联有的人仍然相信军事开支有很多有用的副产品流入民用工业，它对民用技术的发展真正产生很大有益影响。我总是驳斥这种论点，你的态度如何？

加 我也驳斥这种论点。过去有个时期，这两者有某种联系。波音 747 飞机是军事技术发展的有用副产品。某种卫星电视是通过类似途径出现的。但这种事情被无比夸大了。我特别希望有人来解释一下：为我们两国现有的极其巨大的常规力量耗费的军事开支，究竟有什么有益的民用后果。

缅 我认为没有很多有用副产品。假如我们军队里的大批士兵被用来筑路或从事其他建筑工程，我将看得见它的有用副产品。那将是非常值得的，而且是很有生产价值地利用他们的时间。但是，显然他们很少在这些领域得到雇佣。

加 我宁可把他们变成平民，按民用企事业标准付他们工资，而不让他们穿军服。

缅 我们付给士兵的，不象你们那样多。但即使作为士兵，他们也可以有益地服务于民用建设事业。

不过，你真认为在最近 20 或 30 年间你们军事—工业综合体扮演的那种有影响的角色的情形下，抑制它的权力并削减军备开支——对所有的人都有益的一种削减——是可能

的吗？

加 我过一会就将问你在苏联的这种可能性。从美国来说，我并不轻视这种困难。不过，当一个人放弃希望时，他就放弃了完成任何事情的一切机会。而我有一种感觉，美国人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下一年的总统竞选中，所有候选人——至少民主党的候选人——将谈论武器控制和限制军事开支的急迫性。这将对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的舆论的反应。但是告诉我，你是怎样看你们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力量的？

缅 在最近几年里，特别是自从戈尔巴乔夫先生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军方在决定国家政策——包括财政与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在显著减少。苏联现在正在施行的改革，其目的都在于增加民用资源——社会领域。显然，如果不抑制用于军事领域的资源，就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还有，在许多情形下，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党的领导在实质性地改变我们国家对于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的立场方面，一直起着作用。我认为，这是由于那些把增加军备作为国家头等大事的人影响下降，才得以实现的。

再谈谈这个问题的稍为不同的一面。我了解到，在最近几十年中，每增加1美元的军事开支，其所增加的就业量，一直在下降。这表明：仅从刺激经济来说，军事开支的效用日益减小。

加 关于就业肯定是这样。军事开支、特别是武器开支，变成了技术专家的相对高薪资和武器公司的利润。只有相对小的一部分用于一般就业。对这种后果进行了仔细的计算，总的表明这种开支是创造就业效力最小的方式之一。

緬 这也是事实：制造导弹用的物质相对来说比制造坦克或大炮少得多。每花一美元制造导弹用的钢铁及其他常规物资，比每花一美元制造坦克用的少。这就意味着减少钢铁工业及其他物资工业中的就业。

加 旧式枪枝与炮弹也有一定杀人能力。我也不大喜欢它们。

但是，只要是我們公共急需，我不相信美国的军事生产转为民用生产是特殊困难的事。苏联的情形如何？

緬 在苏联，把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完全没有困难。我刚才指出过：我们处于劳力不足的情况。因此，任何从军队或军事工业转出来的工人，都可以在民用工业或服务行业中就业，因为这些工业或服务行业总是需要扩大其人力资源。

加 这里有个与此有关的有趣问题。如我前面所说，增加商品生产不是我们最迫切的事。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你们最迫切的事——我是说民用商品。

緬 这是真的，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对转军事生产为民用生产感兴趣的原因。减少军事开支也有助于增加资源，用于发展教育、医疗服务、娱乐设施、儿童抚育等等这样一些公共服务事业。

加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愿意谈谈。过去，美国有些据说是负责人士说过：如果我们在武器上花足够的钱，我们就能迫使你们国家在武器控制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我总怀疑这种说法。在美国和苏联，武器的生产和军事产业的管理是计划经济课题，不是吗？

緬 我们经济的所有部门多少都是有计划的。

加 所以我们的军事机构是在对经济的一个计划部门进

行管理的工作中和苏联竞争，而大体上这是你们比我们更有经验的领域。

緬 是的。但我认为你们政府的基本思想一直是试图使我们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少花钱增加我们经济的效率。我不能肯定这不是一种自我摧毁的主张。在最近几十年中，苏联尽管在许多民用领域比美国技术上落后，但已能在军事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

加 我再同意不过。但我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你们对经济计划有那么些经验，我们还应当指望和你们竞争吗？

緬 如果是为了民用目的，我倒是赞成美国多一点计划性。

加 现在让我再谈个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凯恩斯主义革命遗产之一，是从宏观角度看待所有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税收、公共开支——的趋势。这种趋势分散了人们对经济的微观领域即市场领域相当多的必要改革的注意。不谈这些问题，我们关于急需的变革的讨论就不完整。

緬 现在你将要谈一些特殊工业吗？

加 是的。首先是我们的、虚萎的工业的问题。现在人们对这些工业讨论得很多。我们不能指望、而且也许不应当试图阻止我们相当多的重工业或纺织工业迁往新兴国家的运动。它们需要这些，而这种趋势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组成部分。新近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我们曾经有过的有利条件。也许有时我们想减缓一下此过程，但我反对任何一般的保护办法。相反，我们的政策应集中于对我们失业工人进行重新训练并给予经济支援，这是我们已经谈过的。

緬 但具体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说你赞成支援那些

因迁走虚萎工业而将失业的工人，但你不支持使那些虚萎工业现代化的企图吗？

加 我不会绝对反对那样做。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将去现代化我们的钢铁工业或造船工业。我们在那些工业中再不会显得突出；我认为它们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而这是好事。

緬 实际上你是否在说：有一种企图，即把重工业——有时被称为“肮脏的”空气或水污染工业——迁往工资较低的国家，以便它们能从发展这种工业中受益，而更为工业化的国家则将从这样生产出来的较便宜钢铁和其他产品受益呢？这是否是一种国际剥削的新形式？有些较老的工业化国家似乎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愿望来谋求它们的特殊利益。

加 不，你这个旧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者我应该说新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对剥削问题太敏感了。

緬 是。只要是我们看到存在剥削或剥削增加的危险，我们总是敏感的。

加 日本人、南朝鲜人、中国台湾人、印度人都想要这些工业。它们的人民希望在工业工厂工作，希望逃脱农民生活的更大不幸。对他们来说，工业化是新生活的曙光。我将引马克思的话给你听；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巨大成就之一，就是把人民从他所谓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中拯救出来。你对工业化采取一种反马克思立场使我感到震惊。

緬 我所震惊的是：你试图把你们自己国家不需要的东西迁往另一个国家。是否这是一个好想法：把你们新发展的电子工业即“清洁工业”输往那些新兴国家而留下那些传

统的“肮脏”工业？借助新技术，你们可以将其现代化以便减少污染。

加 首先，我们没有计划经济中的那种巨大运作能力。其次，我不赞成耗费那么大的力量，即使这是可能的。而且我还要指出：我们电子技术革新传往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的速度，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奇迹，而且造成了美国国内工业的巨大困难。

缅 这我知道。我还知道矗立在新近工业化国家中的许多电子工业是跨国公司建立的工厂，而且实际上很多这种工厂是根据与美国军事公司的转包合同进行生产的。

加 显然我不能使你摆脱你的跨国公司。

缅 不能。我觉得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跨国资本主义；我肯定事实上是如此。

加 我想也许我对“跨国”这个词的使用有责任。它们一度被称为多国公司。我认为含糊不清，于是开始称之为跨国公司。很清楚，你是我的主要皈依者。

缅 在联合王国仍称多国公司；我用“跨国公司”是因为美国人这样称呼。

但是，让我们再谈谈某些其他美国工业。你们不是也有个农业生产过剩的重大问题吗？

加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之一；这种趋势是两种情况引起的。

一是农业中出现的巨大生产力。我们今天是在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县内讨论问题。这里只剩下几个奶牛场，也许充其量有12个或12个左右，而它们只用少数人，也许生产的牛奶同75年前的50个或100个奶牛场生产的牛奶一样多。

其他的农作物和农产品也一样。

另一个情况是：在农业中，没有个别农场（无论怎么大）控制或甚至影响供应的事。比起存在于比如汽车业中的对价格的寡头和绝对的控制来，这是一种纯粹的竞争局面。

缅 寡头只是你不愿用垄断这个词而宁可用的另一个词吗？

加 不是，两者有技术上的区别——寡头是少数买主，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垄断者——但是我不想争论经济理论的细微末节。

这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农业体制中，我们将建立某种公共的控制供应的体系。我们希望，这应当和其他处境相似的农业国——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落后得很厉害。对此，现已有法案提交国会，但政治气氛仍然很不利。由于没有管理供应，我们仍然支付大量津贴，对生产过剩造成的低价进行补偿。

缅 为什么美国农业有这么高的生产率，生产农产品的成本还是如此之高（特别是从输出来说），以致要政府津贴呢？

加 我们的农业生产过剩通常使价格低于成本。加之，在最近几年中有些特别情况。在70年代，农业土地价格大大上升，用高价购买土地的大有人在。这就使许多农民债台高筑，并为抵押付出高利率。不过，从更大的情况看乃是：竞争市场、自由市场造成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又通常使价格低于成本。

缅 成本本身应当是极小的。你曾经指出：你们的农业生产率有巨大增长，这意味着你们在农业中实际不雇佣那么

多劳力。你本人论证过高工资要求是工业品价格膨胀的原因之一，而你们农业中实际上不用什么劳力，可是成本还是在增长。这是由于农民购买商品时必须付很高管理价格吗？

加 机械、肥料等类商品有管理价格，而且可能很高，这是无疑问的。但我不过多强调此点。

农业的基本趋势是生产迫使价格低于成本。如我前面所说，我们现在用津贴进行补偿。可是，我们必须通过管理供应来适当对付这个问题。

编 假如你将美国生产牛奶与小麦的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生产同量牛奶与小麦的成本进行比较，你们的成本应当较低，因为你们是一个生产力较大的制度中生产力较大的经济。但实际情况是，你们商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低于成本。我不能真正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加 我记不得数字。但主要论点我已说过：不管我们的成本是高是低，我们有一种在促使价格低于成本的水平上生产的坚定趋势。

编 让我们再讨论一个不同的领域。我们一直在谈公司官僚主义的增长，而且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僚主义也在增长。你有什么方案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吗？

加 正是在这里，发达资本主义与发达社会主义有趋同之势——我们两人都谈到官僚主义及其问题。可是，在我们认识到官僚主义就象个人那样上年纪而且发生变化之后，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还没有可能的代替现代大官僚企业的事物。

编 你实际说的是：在这个特定领域你没有任何治疗办法。

加 你把问题说得简明而正确。让我也问你这个问题。和我们比较起来，你们苏联和官僚主义问题斗争得更厉害，因为你们有工业企业和国家的联合集团。你看到了任何防止你们官僚主义增长的容易途径吗？

缅 不，没有，而且我认为这将是影响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因素之一。

对你提出的改革建议——所谓加尔布雷思改革——是否将在今后（比如说）20年内真正实现你是怎么想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些即将到来的年代里资本主义将如何发展，你的总看法是什么？对最近将来你有什么预测？我们知道你的处方和对当前问题答案。仅就资本主义来看，你认为前景如何？

加 这是结束今天讨论的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提议下次我们先考虑我对资本主义前途的看法，然后听你谈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九、资本主义的前途

緬 我们略微谈谈资本主义的前途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深刻危机的可能性，你能说几句吗？有人声称：华尔街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证券交易所的广泛投机活动，已酿成一种形势，使人回忆起 1929 年。那是上次大萧条的前夜。我们将难免一场新的大崩溃吗？

加 我赞赏你提到大崩溃。这是大约 35 年前我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假如我可以离题的话，这件事使我得到关于书名的一个重要教训。有一次我在机场询问人们是否携有《大崩溃》这本书，一个女售货员深深怜惜地看着我说：“那种书名的书肯定是不能在这儿出售的。”

緬 不过在其他地方销路很好。

加 在其他地方，它的销路不错，至少是差强人意的。但没有一个作者认为自己的书象它应当有的销路那样好。

不过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美国有种小小的家庭手工业经常出些警告下次经济灾难的书籍。我一直有点怀疑它们。然而，当我们在 1987 年迟夏坐在这里的时候，华尔街和日本的证券市场确实有重大的投机活动。而且有很多我们称为公司票据倒换的东西：合并、攫取以及包括具有一个奇特名称“废债券”在内的新金融手段的发展。

关于这种活动，我们知道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它对

我们制度的工业生产效力没有任何贡献。这是那些成为购买和重新组合公司财产的专家的青年人的一贯活动。他们这样作，不是为了改善那些公司经营活动，而是（哎呀！）为了自己赚更多的钱。而且他们还真赚得不少。

其次，这种活动使我们制度具有一个巨大的债务结构。在下一次通货膨胀中，联邦储备委员会将提高利率，紧缩信用。这可能造成一种严重经济紧缩状态；可能出现破产和其他极其令人不愉快的后果。

不过，我不是在作预言。我提醒你，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当经济学家作预言时，不是因为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而是因为他被问到要发生什么事。

緬 对又将 1933 年以来已经分离开来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结合起来的金融界，你有什么改革的建议吗？据我记忆，这两种银行是根据格拉斯—斯特高尔法分离开的。这是罗斯福第一批改革中的一种。

加 我总是对你记忆你早期讲授的美国经济课程的细节留下印象。总之，我强烈反对废除格拉斯—斯特高尔法，因为这将使商业银行投入高度投机的金融投资活动。有些商业银行将使自己表现得可敬可佩；另一些将表现得极其危险。格拉斯—斯特高尔法是在 20 年代发生重大投机活动并造成损害之后产生的管制条例之一，是不应废除的。

緬 我们谈了证券市场崩溃和更深刻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现在略微转变方向，让我提个不同的问题吧。

在整个欧洲，我现在说的是西欧，在我称为新保守派的圈子里，正在讨论一个新概念。这就是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社会的概念。

三分之一是他们认为的旧式无产阶级：低工资工人、还有失业者和靠养老金为生的老人；所有这些人对资本主义的延续没有利害关系。三分之二或者已经有这种利害关系，或者可以引向具有更大利害关系，办法是售给他们股票、政府企业股份（也可象英国那样，售给他们城市所有住宅的股份），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人们声称这是一种彻底转变的基础；这种转变就是背离存在于过去 50 年中的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式的资本主义，并向着一种新资本主义，亦即没有任何改革、因而没有社会民主、没有福利国家、如此等等的纯粹资本主义前进。关于这种下层阶级的理论及其产生的后果，你是怎么想的？

加 应当完整地保留在想象中的一种奇异的想象活动。保守派及其同行新保守派的主要知识消遣之一，就是用一种或另一种时髦的诡计来逃避对穷人福利的责任。

我坚持这种观念：我们必须继续对我们最不幸的人民承担牢固的公共义务。事实上，这是更为保守的方法。它减少或消灭在上世纪或本世纪初期如此普遍的异化现象。我们决不当因为这种荒谬理论而摧毁福利国家结构，我想我们也不会。我认为工业国家人民的常识是足以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繙 但是，你确实接受有一个所谓下层阶级的看法吗？

加 我接受这种看法：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我们有些人民没有充分得益于这个制度。我认为他们是有必要得到政府帮助——公共教育、公共住宅、公共娱乐、公共图书馆——的人。这将不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将保证他们将来充分参与经济活动。

好，上面说了那些，现在让我补充一点：在上半世纪中——在我工作期间——我们缩小下层阶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当然，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缙 从某一方面说，这是否是保守派说的同一件事：你们正在逐渐缩小下层阶级并为一个更保守的社会奠定基础呢？

加 很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人幸福而舒适的社会，将是一个更保守的社会；我将愿意冒这种风险。保守派说这种社会的出现将有赖于奇迹般地运用自由放任主义；我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仍然是政府的主要责任。

缙 现在我明白了你的办法和保守派的办法之间的区别。

加 我感到高兴。

缙 我也明白了这一点：你相信导致所谓下层阶级更好生活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必需的变革运动之一。这是你的看法吗？

加 绝对如此。你比我说的更清楚。

缙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另一个问题。你已经谈过社会里官僚主义力量的增长和改革公司的可能性。你说你没有看到改革公司的巨大可能性，但是有限制前者的可能性吗？我说的是少一些垄断，少一些管理价格，少一些你所谓的僵化。而在政治领域，则是削弱官僚机构的政治影响。缩小公司权力或者加以改变是可能的吗？

加 公司权力是存在的，这没有疑问。但是整个说来，我现在不象 50 或 60 年前我开始研究经济学时那么关注它。当时，公司的权力强烈地表现在它对物价的控制、对劳动市

场的影响和在华盛顿到处出头露面。我认为，大体上说，在过去半世纪中这种权力减小了。从旧式资本家控制的公司转为经理控制的公司，是一个因素。还有由于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生产者的侵入而引起垄断势力的下降。今天我们制度中的竞争，比起 25 年前我写《新国家》时大得多。

所以，在我试图决定我应当忧虑什么时，我现在把我对公司权力的忧虑放在相当次要的层次。

緬 但是你将承认公司官僚主义的确抵制改革的新尝试吧？

加 我已经说过，这是美国与苏联之间最大的趋同点之一。

緬 那么，你觉得削减社会里公司官僚主义的力量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吗？

加 我以为将是这样，但我看不到这样做的任何方法。

緬 做什么的方法？

加 削减公司官僚主义的力量。

緬 你觉得，这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吗？

加 我不得不说，对公司中的官僚机构来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承认它的存在，并且承认它将存在下去。

緬 由民主党政府取代共和党政府也无能为力吗？

加 绝对如此。

緬 在最高层控制中，仍将有庞大的公司官僚主义吗？

加 也许公司的政治力量在华盛顿将有所减少，而且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认为这将是好事。

緬 公司的经济力量将不会减少吗？

加 一点也不会。

緬 你前面还提过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的不断变化（这方面我们已部分讨论过）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据我的看法，这就是主要从事生产的经济向主要从事服务的经济转化的运动。

你觉得有这种现实可能性吗？即作为服务经济、输入别国制造品并向世界其余地区出售服务的经济，美国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吗？美国不是已有巨大贸易赤字、国际收支赤字吗？是否向服务经济转化的运动使这个问题更严重呢？

加 如我前面所说，我将提议控制我们的预算赤字，降低利率，并采取其他步骤以减少贸易赤字。但我把它放在一旁再说。

作为服务经济，我们能生存下去吗？无疑对有些人、许多人来说这将意味着较低的生活水准。当我们的钢铁生产、汽车生产、化学生产、电子家具生产和电视机生产被日本人和南朝鲜人抢走时，这些工业中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人将不得不接受低得多的工资去为麦克唐纳公司工作——你知道麦克唐纳公司吗？

緬 知道。

加 而且往往他们的妻子也得去工作。这可能是一种痛苦的过渡；我并不轻视其社会影响和代价。但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指出，钢铁或造船并不包括全部生产活动。如我前面所说，当人们对实用的事物得到足够供应时，他们就要求更好的式样。还要求有电视或其他享受。因此，我们美国自然应当转向娱乐与艺术领域，而且当然是——人们一直过于强调的——高级技术领域。还有教育领域。我已经说过，我们仍然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到我们的大学里来学习。

緬 你认为将来美国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将自得其乐，教育世上其他人民，并且做许多赏心乐事，而其他国家则辛苦劳动，并生产重工业产品为其消费。是吗？

加 你这是颇有偏见的说法，但我不准备和你多作争论。你一直促使我谈资本主义前途，我并不肯定我们已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问问你，你是怎样看待资本主义前途的？

緬 资本主义经济现在的确在开始一次新技术革命，而这次革命可能引起全面经济上升以取代目前停滞或低速增长的时期。不过，我觉得对这种可能性有两种障碍。

一种是我们已讨论过几次的军备竞赛的继续。我认为技术革命的成果应当更多地为消费者所享受，少用于军事需要。毕竟，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尽管技术上有巨大进展，任何—国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3 用于消费品和服务，这些消费品和服务还是昂贵的。

前面，我们谈过农产品的高价格问题。一包纸烟象一只好的日常用表—样贵，这不令人惋惜吗？

加 肯定不。这仅仅是由于我们在计时器生产方面有了巨大技术进展。我在哈佛大学同事戴维·兰德斯写过一本卓越的、名为《计时革命》的书，他在其中指出，现在每个美国人带有一只比他或她所需要的远为准确的手表。不过，对这些手表相对说来价格不贵这一事实，我并不惋惜。完全不。你这话是白说了。

緬 但难道这不是事实：如果技术革命更集中于消费品及其生产技术，而不是象现在这样—部分新技术用于武器、空间武器制造以及军备竞赛，资本主义经济不就更容易上升

得多吗？我说的是这种情况。

加 这我同意。我刚才说的只限于你提到的纸烟比手表贵的问题。

緬 如果你试图使我陷入困境并说我鼓励吸烟，那你就完全错了。

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另一种我认为应当除去的障碍是近来部分关闭了的第三世界市场。在近一些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债务已相当缩小了它们和工业世界之间的生产交换量。

加 我未谈到这个问题，是感到汗颜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緬 近来，有个你也许知道的美国作家彼得·德鲁克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命题。他一直在写关于主要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在原料和其他商品方面脱钩的问题。

加 请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不懂。

緬 他所说的是：工业国家现在较少依赖第三世界过去大量供应的原料，而这就导致第三世界生产的原料和一般商品的价格相对下降。这样，发展中国家近来就出现大量国际收支赤字。第三世界债务也大量增长。让我补充一句：如果这种债务被取消，第三世界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将向工业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开放。这将是支持世界经济上升的重大因素。

加 我同意，但我将说得不那么具有戏剧性。我们是不会看到那些第三世界债务得到偿还的。

我希望社会主义世界所有的人了解近来已经发展了的债务术语。现在，当债务未被偿还时，当事国家并不被判不履行债务。债务被“翻滚”，翻滚之后仍未得到偿还，则“重定

偿还时间”；重定偿还时间以后仍未偿还，则称为“问题债款”；未得偿还的问题债款称为“不能实现资产”。

这是些新语义。如前所说，我自己观点是：这些无法偿还的债款是永不会得到偿还的。愈迅速加以清理，接受不能偿还的事实并承认损失，愈好。

让我再说一句你高兴听的话，这话是更与你的意见一致的。一旦我们承认这些债务将不得偿还这一现实，那些我们正力争其偿还利息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其紧缩经济（这对民主政府是有些危险的）的债务国，将能购买更多的发达工业国家货物。这种看法，多少是支持你和德鲁克的主张的，即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可能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有积极影响。

緬 在试加总结时，我想说的是：一般说，社会主义世界对工业国家和第三世界经济情况的改进是高兴的；而且，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崩溃一点也不高兴。

我们感到，现时的停滞正孕育着许多新的冲突，并造成一种把生产更多的武器作为刺激经济的可能途径的形势。世界经济情况愈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更正常的政治关系的基础便愈巩固。

加 我承认这种说法，但还有另一点我想提一提。我愿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少卖武器给第三世界。这是我们时代不光彩事件之一，食不果腹的人民，却看着他们的政府耗费大量金钱购买他们不需要、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不能使用的高度精密武器！

緬 你现在看到，市场机制并不是理想的；对有些产品的需求是真正不应使之得到满足的。

加 如果我们同意停止卖武器给巴基斯坦，你们愿意停

止卖武器给印度吗？

緬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提议，而且也许是可能的。

加 这是我们应当谈判的事情。

緬 关于限制向第三世界出售武器的谈判事实上已进行许多年，由于很明显的理由，一直不太成功。不过，我相信将来是会成功的。

我们也应考虑到第三世界的前途，因为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武器，我们就是促进它们的军事化。反之，我们应当在促进它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和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方面，进行合作；这是我们的精力应当指向的领域。

加 我同意。

现在，我们已经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我想再加一句，我很高兴听到你说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幸福并不有损于社会主义世界，繁荣与和平可以并行不悖。这无疑是我们都能同意的观点。

十、社会主义的前途

加 我们现在轮到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了。你是怎样看社会主义前途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发展形势的？

緬 我看有三种可能的前景。自然，这多少有些简单化，而生活可能更复杂。实际可能发生的情景，也许是我将提出的几种可能性的结合体。

加 让我们取得谅解：经济学家使事物复杂化，部分原因是由于事物本身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表明他们比一般公众有较深刻的理解。但我赞成简单的说明。

緬 第一种可能前景的出现是由于官僚政治有阻挠当前反官僚主义改革的危险，而这种前景将意味着现状的继续。

为什么这种前景可能呢？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当前改革将不会通过巫术带来经济繁荣。转向一种新体制是相当困难的。当建立了扩大市场机制的条件时，企业开始将感到不容易找到它们产品的顾主和市场，或者它们生产所需的原料与机器。可能还有其他问题。而所有这些又可能导致经济的暂时停滞或者降低增长率。所以与此同时，国家本来是开创一种试图增加经济发展速度的计划，而官僚体制看到的却将是似乎在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的新体制。它们将迫切要求恢复日常不断地干预和控制企业事务。象这样的事情 1964 年出现过，当时赫鲁晓夫被谴责为摧毁中央计划。这种情况可能

再发生。官僚机制和影子经济界已经在力图证明新体制不起作用。它们甚至假造经济新亏空、特别是消费品供应不足的事实。

加 这似乎与那些组成官僚机构的人一般说来很满足于他们的地位有关。

缙 他们满足于旧体制，而且不愿意适应新情况。对他们很大一批人来说，调整适应确实可能是非常痛苦的。有些人可能(而且已经)被转到生产性企业，而他们却感到失去原先职务赋予他们的威望和权力。不过，加尔布雷思教授，对于官僚体制适应新环境、寻求其自我生存的理由和新形式的能力，我想你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比如，看看匈牙利人吧。匈牙利是个为了一切实际目的已经中断中央计划若干年的国家，人们认为那里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被剥夺了许多权力。但是，如非常卓越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一篇新近文章中所指出：“在匈牙利，直接官僚控制的旧命令体制”，已转变为一种“间接官僚控制”的体制。所以有一种新的控制、一种新官僚体制。

加 这非常有趣，而且我特别高兴你提到科尔内教授。他是我在哈佛大学同事。他在剑桥和布达佩斯各授课半年。这是个非常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的例子，你说呢？

缙 有些人说南斯拉夫在取消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方面是成功的。但现在有许多人谈到那里的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官僚政治干预生产企业的事务。

总之，第一种前景，也就是官僚政治继续在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的结果，将是经济继续停滞；通货膨胀（在某些情形下象南斯拉夫那样阻止不住的迅速通货膨胀）；象波兰那样

的大量外债；以及我们不愿其永久存在的其他特征。所以，第一种前景并不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继续存在。甚至在我国，有人正试图利用改革以全面剧烈地提高物价。这是非常危险而有害的。

加 我们继续谈第二种前景吧。不过，以后我要问你：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苏联从何处得到对他反官僚政治的支持呢？

緬 我认为我们应当现在就讨论这个问题。他有党的支持；有很大一部分人民、特别是企业中工人的支持；有需要更自由地经营其农场的农民的支持；有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创作能力的知识分子即文学艺术界、新闻界、一般传播媒介的很大支持。

加 象我们这样的人呢？

緬 如果你希望的话，还有学术界人士和作家。

加 你一笔带过了这句恭维话。

緬 我认为，现在居于反官僚主义前线的，并没有很多经济学家，尽管他们对此也做了一些事情。居于这种前线的是文学界、新闻界人士。比如，《文学报》就对经济、政治和司法等各界的官僚主义活动进行着深刻而广泛的批评。所以我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得到支持的地方。

第二种前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这就是走向更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这并不意味着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它将远为广泛地运用私人首创精神和私人企业家精神。它主要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就象我们讨论经济改革时你建议的那样。而且将引进自由劳动市场。在决定工资方面将有较多灵活性，而在这种体制内部将有一种灵活的资本与

信用市场。总之，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

加 这将是仿效目前匈牙利模式的体制吗？

缙 不真正是。因为如科尔内所说，当前匈牙利的情况是间接的官僚控制，而不是完整自由化体制。后者可能是匈牙利前进的方向，但我所说的一个更好的例子是南斯拉夫，那里已完全没有集中计划。如我所说，那里有来自地方当局的干预，但没有集中计划。

加 我并不感到你完全热衷于这种前景。你看到它有哪些困难呢？

缙 我已说过，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这牵涉到你本人在你的书中提出过的一种概念——抵消力量的概念。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中，据认为工人的集体将主管企业，没有抵消力量来防止它们无节制地增加现金收入和物价上升。我现在谈的是管理部门与劳工之间、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抵消力量。我怀疑没有这种抵消力量，就会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这是我看到的第二种前景中的一个困难。

加 用稍为不同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控制工人工资的增长和那种工资对市场的压力，是吗？

缙 完全正确。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论你怎么想，公司的经理人员或者资本家本人，是对工人要求的制动器。我完全支持工人得到公平份额，但我不赞成增加工资以至超过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正是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

加 在我原来关于抵消力量的讨论中，我的论点是：工人、工会、合作社、甚至连锁商店或超级市场，都终于显示出抵消生产公司力量的力量。而这儿谈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看到的将只是存在于工人集体手中的力量，但没有雇主

的抵消限制。

緬 或者说没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抵消限制。不过，假定这种弱点可以被克服，假定在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内部市场活动足够有效而且没有失控的通货膨胀，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比具有更完整的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运转得更好呢？

加 我相信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超越了现时的可能性与想象。

緬 可能是这样。但是，假如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仅要一种伪装为市场体制的东西呢？

加 你谈的市场社会主义还远非资本主义，因为它不包括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制，是吗？

緬 不，不大规模地包括生产工具私人所有制，但它将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比如，将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比如匈牙利。我不是批评那里的情况，但近来一次普查表明，在那个有限市场体制之内，有一小撮很富（据说是合法收入）的人，约占总人口的1%。这并不很不同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的模式。

加 这很有趣。那么，第二种前景中的自由劳动市场是怎么回事呢？

緬 所谓灵活的劳动市场，不就是失业的可能性和利用就业来调整制度吗？从工人收入来说，这又是一种建立抵消力量的办法。但是，这样人们又将真正碰到传统上资本主义必须对付的问题。我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应当这样做。

加 你是说为什么社会主义应当承担资本主义的社会问

题吗？

緬 完全正确。

加 现在请告诉我第三种前景吧。

緬 第三种前景可称为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它把中央计划中最好的东西和市场机制中最好而害处最少的东西结合起来，很好地利用两者。

现在，我们知道而且谈过许多次，市场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工具。而且价格与利润都不会给企业（生产公司）提供适当信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计划与集中控制可以用来纠正和改进市场运转，并且解决人们试图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时必然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以价格体制为例。你曾经问过：为什么不完全自由地决定价格？我的答复是：价格机制并非完美无缺。未来的计划，需要比现时价格提供的更多的信息，而未来的价格则是未知数。原则上，国家计划委员会能够做的事，是估计一种未来价格的体系，这个体系将与国家计划及总经济战略完全一致；与现有的能够计算这种未来价格的方法不矛盾。我国已故极著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作过一系列研究，发现了计算西方通称为影子价格的方法论。在我国，这种影子价格现在称为最理想计划的价格。也许，现在是把这种方法论由理论阶段变为更实用阶段、并由计划当局使用更多现有计算方法按照这样预测出来的方向以指导经济的时候。这是中央政权能够做的事情之一。

加 我对这种前景没有完全弄清楚。这牵涉到一些相当困难的技术问题。你对市场机制确定的价格是接受的。不过，如果通过长期计算，这种价格可以被利用，可以使之从社会

方面和经济方面说更有接受价值，你就不接受。我这样说对吗？

緬 我想你基本上是对的。

加 请举一个实际例子，说明在什么情形下，市场价格不对，而计算出来的价格是对的。

緬 比如，假使我们回到 20 或 30 年前的石油价格，那是相当低的，但是，从当时市场形势看，似乎应当这样低。不过，这种估计没有考虑到石油是一种日益稀少的商品这一事实。如果计划当局当时就看到 20 年以后的情况，他们就会得出结论：将来石油的实际价格会高一些。

加 假设今天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就会提高石油价格作为保护措施吗？

緬 对，作为保护措施，也作为减少经济过分依赖一种暂时被认为便宜，但 10 年或 20 年后将很昂贵的物质的措施。要不然，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就不会去适应日益昂贵的燃料。

加 你可以降低原子能的价格以便更好地建立原子能工业吗？

緬 对，可能。对于新产品或者技术革新来说，开始时也许要把价格定高些，以便促进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业。对这些工业可能要由国家给予津贴，以便开始时的高成本由国家承担而不致转嫁给消费者。

加 假如这样优惠原子能生产，你们或许会有一些数量的美国青年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门前进行纠察。

緬 我想会有。

加 我了解你的论点了，而且由此看出一些有趣的可能性。你们可以提高汽车价格以减少空气污染和运输量，也可

以维持大众交通低价以鼓励人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緬 以往这样做过。实际上，我认为我国汽车价格已经高得太多。可以低一些，而且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安有较好反污染装置的汽车。但是，从公共运输看，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不认为在这个领域由市场定价有好处。即使是现在，也有人力图把公共交通价格提到远远高于目前实际成本水平。公众——通过新闻媒介——正在向这种企图作斗争。

加 所以，你的第三种前景将是一种市场经济，不过在改变价格结构的的确确对社会有好处时例外。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我的哈佛同事科尔内教授所说，象匈牙利的那种改革计划，不还是留下一个非常实在的官僚机器吗？

緬 我不认为如此，因为这种物价控制不需要许多官僚人员。大多数价格——而且这将是些真正有限的基本价格——将用电子计算机而不是用手计算，而且将不涉及许多价格的集中调整。

加 很久以前，我对需要那么多人来确定价格感到十分意外。1941年，我被委任管理美国物价，当时我下面只有6至7人。我离职时，有几千。

緬 不过当时你没有计算机，你们的物价政策，也不是以最理想的价格体系为基础。你们做的是某种其他事情。

加 实际上，我们是管理所有物价。不过，我并不坚持我的例子是完全贴切的。

緬 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机构办这件事。现在，让我指出在这种前景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应当负责做的一些其他事件。

你知道，在经管市场经济方面，我们的经验极少。当我说我们时，不是指我自己；我是指的企业管理人员。所以要有教育经理们，要建立制度，给他们以必需的企业教育，并提高那些在这方面已有某些经验的人。我想，这还要求教给我们的经理们以西方的购销业务。

加 我们必须考虑让你们有更多的人到哈佛商学院来学习的可能性。

緬 好，但我认为你们不能在那里教育所有的人。我们自己现在也有些商学院，不过我们还应当再有一些。然而，中央当局的基本职责，应当是找到有足够独立精神、有足够能力为我们的企业、它的工人以及整个工业界寻求兴旺发达的人。他们不应当是用旧的官僚主义方式训练出来的人。

加 还有两、三个问题我想问你。失败的、那些明显不能赚钱而仍然存在的企业怎么办？你们将制订我们第 11 部分破产法那样的法律吗？

緬 如我所说，实际上我们的确有一个破产法，或者是在我们的新企业法中有这样一个条款。我们是在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国也一样，它们那里正在试行破产法。

加 是企业据此简单地被停业的安排吗？

緬 是的，在失业一个时期以后，工人们被调换其他工作。

加 将有一个惩罚性的失业期吗？

緬 是的，但关于这个问题让我再说几句。我认为宣告破产实际上是解决失败企业问题的一种极端偶然办法。你将承认，在你们制度下，宣告破产现在并不是用得很多的办法，

特别是对大公司而言。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个办法用得很普遍。

加 是的，不过就在今天，《纽约时报》用一整版篇幅来刊登关于林—坦科—沃特公司破产的各种公告。

缙 我看到了。不过根据你们的破产法，公司并不真正被关闭，通常只是由银行或其他什么机构作某种改组。

我现在说的将在苏联发生的情况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有责任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企业。如果它们预见到某一工业领域将遭受长期困难，他们就将事先采取步骤以帮助改组其工厂并使之现代化，或者改变其产品性质。

加 我懂了，但看起来你们的每一补救办法都要由中央管理部门作出，不是吗？

缙 是的，而这正是我要说的。你知道，市场可能不表明企业将在三年内破产，但中央管理部门可以而且将有责任预测那种形势。在那种情形下，它们将需要有一个适用于即将破产的企业的应急计划。

加 我想大概你如此剧烈谴责的那些官僚机构仍将有一定职能。每次有什么事情出了毛病，你就提到它们。

缙 中央管理部门必须给破产的或不盈利的企业以实质性援助，使之现代化或改变其在经济内部的购销方向。这是它们的职能。新的合理的计划部门将考虑工厂的转产、现代化，并为其寻求适应新形势的顺利途径。

基本的关注是：工厂工人不应因工厂管理错误或计划体制中官僚机构的错误而失业。这就是我想说的：中央当局的职责是防止破产或失业。

加 刚才我们说过将有短期的惩罚性失业。我想那种惩

罚不至于很严厉。

緡 这种惩罚性失业是有规定的，但只在极端的情况下才出现。

加 我懂了。

我以往访问苏联时意识到，我尤其听你本人说过，在苏联工业中，研究机构的技术革新——苏联和西方、日本的已知技术——及其应用之间有一条鸿沟。这是一个问题吗？将如何解决呢？

緡 这是个问题。在30年代和4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对技术变化是极端敏感的，但目前在许多方面变得官僚主义了，而且在跟上和预测现代科技的基本方向方面，很是迟缓。不仅多数部是这样，“科学的领导部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院——也是这样。在近几十年中，科学院走的是所有日益增大、管理不善、没有效率的机关走的道路。在许多情形下，领导人来自那些对任何科学领域都不精通的人，而他们是天生不能在科学或技术领域领导人们前进的。

我觉得，中央当局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地使科学研究及其机构摆脱官僚主义；否则，在我们制度中将出现严重的脱节现象。

加 我又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说那些目前在这些机构中掌权的人在科学院有权，而且将被要求改革他们自己？这是实际可行的吗？

緡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在新体制下，将有一种安排（而且科学部门和学术界正在广泛讨论）；通过这种安排，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将由这些机构的成员选举。选举时根据的是被选者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而不是他们做官的本领。

加 他们将由研究机构成员选举而不是由各部委任,是吗?

缅 是的,将不再由各部或科学院的最高主席团任命。

加 我觉得这是非常诱人的。但对那些被赶走的老家伙来说,将不是一种受欢迎的办法。

缅 完全不是,但将不得不这样。需要改变这些机体的血液。

加 请再说几句这些研究机构和科学院是如何将苏联的革新或者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地方来的革新投入实际应用的。而且我想对这种工作如何可以做得更好了解得更具体一些。

缅 我提出三种办法。首先,我们应当利用和学习西方某些较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经验。在那些企业中,研究和开发——你所称的 R&D——是与生产和销售直接联系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有表明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子。在那里,那些将研究与发展和生产结合起来的企业,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它们的对应企业来,取得更大成功。

第二个办法:在 30 和 40 年代苏联的早期经验中,突击组、特别是军备与军事技术领域的突击组,是组织起来迅速发展特定新技术的。在核能或空间开发那样一些对技术进步的需要似乎非常尖锐的领域,突击组是很成功的。

加 我们也有这种精通更具有毁灭性的人类活动的倾向。

缅 我说的是外层空间与和平利用,而不仅仅是军事需要——是核能的和平利用,而不仅仅是炸弹。

加 我想,那种早期成就的例子之一,是加加林先生的著名飞行。

缅 是的。但是还有横越大西洋和横越欧洲的第一次喷

气式飞机飞行——著名的俄国 TU—104 飞行。

加 我坐在上面，那是我第一次坐喷气式飞机。

缅 在 1955 或 1956 年，当它首次飞行时，真是举世瞩目。这是些突击计划的例子；现在也可能在我们当前落后的各种不同领域制订类似的突击计划。

加 我觉得这很有魅力。当你静下来想到喷气飞机、人造地球卫星和加加林的空间飞行这一系列发展时，你就会记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怎样想象苏联成为技术界领袖的。现在我们不这样想了。

缅 原因是：一个在其他许多方面技术落后的国家，当时在某些特殊领域技术上非常进步；这是这个国家设法在突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这是引起变革的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是利用美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在所谓风险资本方面的某些经验。这就是储备一批可以导向较小企业的资本和物资，这些较小企业（或许组成合作社）比起大工业组织来能够较迅速地取得成绩。

加 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有过混淆加尔布雷思改革和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可以接受的改革的某种危险。你现在谈的是缅希科夫改革或者戈尔巴乔夫改革呢，还是两者是一致的呢？

缅 我谈的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他的经济改革计划中表达过的思想，同时，我对他提出的思想补充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不过也可以这样说，我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一般说是符合当前苏联提倡的路线的。

加 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是关于风险资本的。根据正

统经济学，较高价格通常是用来抵消风险的。这种较高价格将是你们体制的组成部分吗？

緬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错。社会应当准备为冒风险付较高价格，特别是如果这种冒险引起技术进步的话。

这里我想总结一下：在微观经济中，社会主义有许多领域必须向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市场——学习，而且要加快学习速度。如果社会主义这样做，那么，我们不仅会把市场和私营企业的有害影响减到最小程度，而且又发挥了计划体制的宏观控制和最高程度社会化的有利条件。这样，我们就能比资本主义干的更好。这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

加 非常感谢。

我想我可以补充一句澄清的话。我以为我们对于所用术语的理解是一致的。我们提到微观经济学时，基本指的是个别公司和市场的行为。这和宏观经济学是有区别的；宏观经济学指的是财政、货币或其他一般政府政策影响下的经济总行为。

緬 或者社会主义制度宏观经济计划影响下的经济总行为。

加 我想，这样提醒一下，对那些已经忘记了他们早年在緬希科夫和加尔布雷思指导下学习的经济学课程的人，是有用的。

十一、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加 在我们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有一种我长期以来认为不幸的倾向；我怀疑我们是否在摆脱它。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里，人们总以为资本主义运转不灵，或者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社会阶段。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多地方，则有一种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假定：社会主义是一种失败。我们能否承认两种制度比起 50 或 70 年前人们想象的运转得好得多呢？能否承认事实上它们两者都很可能存在下去，而且即使碰上相当蹩脚的治理也能存在下去呢？假如这样，就要求我们的态度要有根本性改变。

緬 我觉得认为另一种制度运转很不灵的观点，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在我们两种社会的某些地区发展起来是老生常谈。我不认为企业人员——或者我们那里管理经济和决定外交政策的人——对这种看法太认真。

加 在你的演讲和我们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中，是这样说的，但是不是任何人都很相信呢？

緬 至少在制订和执行政策时人们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想你会承认 30 年代西方出现过大萧条、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很显然，当时你们的制度运转很不灵。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和美国的贸易与一般关系、从而与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与一般关系，发展速度非常迅猛。

加 罗斯福是在当时承认苏联的吧？

緬 对，在 1933 年。

加 当时还有个非常令人钦佩的驻苏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吧？

緬 对。但是，那些较好的关系甚至开始于罗斯福执政之前；而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许有助于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或重新建立。我将告诉你是什么原因。这是我国追求迅速工业化目标的时期，我们对进口机器的需求极大。事实上，有一个时期，我们进口美国出口机器的40%。我国在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是它的一个很好市场。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帮助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加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高兴再得到那种帮助。

緬 我希望我们将回头再谈谈这个问题。

加 让我问下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们能同意良好的经济成就一般说有利于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吗？具体说，有没有任何理由使你们担心资本主义的较好经济成就，或者使我们担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呢？

我自己认为我们双方都能经受得住对方的成功，而且应当欢迎这种成功。你同意吗？

緬 我同意，但历史记录颇为混杂。大萧条——你们经济最不成功的时期——给我们带来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良好关系，但经济萧条也导致非常危险的倾向，比如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这种倾向导致侵略，而且最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加 这是确凿无疑而且值得记住的。

緬 有些人会说，这种不幸后果是独特的，决不会重复，但我认为，现代世界里的经济衰退和停滞，倾向于导致生产更多的武器，因为对有些人来说，军事开支似乎是摆脱经济困难的一种方法。而且在这种时期，还有一种向别国出售更

多武器的倾向。更大量的军事生产和更多的军备出口，总是造成恶劣的国际关系。

加 我并不完全不赞成这种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30年代首先在意大利、然后以一种更极端形式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法西斯事件抛在我们后面。我并未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将造成那种程度的极端主义与反动的可能性。不过，促使人们运用军事开支作为公共事业的一种形式的引诱力的确是存在的，所以我也将问你这个问题：是否在你们国家有利用经济停滞之机作为扩大军事开支借口的危险呢？

缅 我想，我们也许应当用一种不同方式来观察这个问题，并且讨论改革而不是停滞的时期。在苏联的各个改革时期中，总有将资源从军事用途转往民用的企图。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的年代是这样，当时出现过第一批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尝试。在美国肯尼迪时期也是这样，与此同时苏联出现过经济改革的尝试。

现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是这样，这时你看到我们制度内部在工作要点上的剧烈变化。戈尔巴乔夫改革正试图造成一种远为和平的政策，一种目的在于在核武器这样一些事件上取得与美国一致的政策。在我们国家，改革与和平倡议是一同出现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不过，这并不是说，停滞时期就必然使人们试图损害关系。很清楚，关系恶劣的时期只是增加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问题。

加 这些话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你说苏联改革的根本之点是军用资源转为民用资源。是否在任何改革时期这将是努

力的中心呢？

緬 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样。在我们以前的一次讨论中，你本人建议的改革就真正有赖于军事开支的减少。我说的是福利国家及其相关事务的扩展。

加 我想这是真的，而且这是我非常欢迎的一种我们两国趋同的形式。

緬 我也欢迎这个领域的趋同。

但是，为了结束这个军事问题的讨论，让我仅仅再说一句：在我们两国，关系恶劣的时期与由于各种原因制订长期扩大军事生产计划的时期之间，似乎存在着相当的相互关系。以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积累战略核武器为例。一旦这种积累结束，就出现缓和。这种缓和期多少被认为是一种加强军事化时期之间的间歇。

加 请对此作些澄清；我有点难于理解。你是说无论在苏联或美国，都有军事积累的时期，而且在那些时期中，由于对国际事务感到不快而出现支持这种积累的倾向吗？

緬 这是6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发生过的事；当时在美国也在苏联出现过军事积累。

加 这是我不赞成的一种趋同形式。

緬 绝对不。我们也不支持这种趋同。

但是我也忧虑另一个问题。我读过你们某些政治家的少数声明。比如，理查德·珀尔和其他人……

加 理查德·珀尔不是政治家，他是个社会官僚。

緬 你想称他为什么都可以，但他仍然是理查德·珀尔。

加 他现在在写小说。这是我很愿推荐给他的职业。

緬 也许我应当把这看成他的才能由军用改为民用的转

变。不过，我并不特别担心理查德·珀尔本人，然而美国象他这样的人却提出几个问题，问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要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因为这样做只不过是帮助社会主义更加强大。我在你们的一份报纸、我想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读过一篇评论。它说，社会主义变得愈好，它就愈对第三世界具有吸引力。而那时它就构成对美国政策的威胁。

请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看法。然后，我将补充我对我国形势的想法。

加 美国公共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你都可以听到几乎任何意见，包括理查德·珀尔的看法。

不过我相信，而且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苏联的幸福对美国并无危险。它在你们国家带来安宁，正如我们的幸福在我国带来安宁一样。而且这有利于和平。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非常希望看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对此，我是无条件的，而且我断定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也如此。

至于第三世界，我不认为是它们在两种制度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如你所知，我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出现得很晚。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占支配地位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没有地主统治的小规模农业、特别强调消灭文盲。在最近这些年里，美国公众思想与公共政策主要错误之一——也许在苏联是更流行的一种错误——是相信社会主义是刚开始发展经济的国家的一种可能模式。

稀有资源的保护对一切社会发展都是带根本性的。在下撒哈拉非洲国家中，最稀有的资源是行政管理能力，而社会主义（我认为你将同意）比起市场经济来，在行政管理能力与资

源上承担了更为巨大的负担。

緬 你的意见是公司官僚机构不想向非洲的撒哈拉或下撒哈拉推进吗？

加 不，除追求石油或其他天然资源外，不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社会主义都无所事事于乍得或埃塞俄比亚。

緬 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乍得将来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技术进步中心之一。我不相信非洲国家命定将永远留在文明的地窖里。

加 我并未这样说；我说的是它们必须通过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居此阶段之首。

緬 这也许可能。我说还有……

加 你同意我这种看法，是吗？

緬 我说这是可能的。

加 听起来有点闪烁其词，但我接受这种闪烁之词。

緬 对这个问题，并无清楚答案；是否正确要由历史来证明。

不过我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确有人会说，在整个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与较良好的经济运作情景并不是我们应当赞成或希望的。

加 它延缓（比如说）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吗？

緬 对，它延缓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有助于缓和资本主义的某些矛盾——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我们称为美国、西欧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所以，我们苏联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应当帮助资本主义？

加 几个星期以前，我读到你们非常知名的同胞叶夫格尼·叶甫图申科在一次访问记中说：“你们主张强硬路线的

人有助于我们主张强硬路线的人，我们主张强硬路线的人有助于你们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他们互相加强对方的危险与仇恨的形象，包括因另一方成就而产生的危险。

緬 我们主张强硬路线的人说我们正在帮助资本主义，让我十分认真地对这种特殊评论作一答复。社会主义模式应用于世界上欠发达和最发达的工业国作用如何，我一般同意你的意见。原因是明显的。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社会主义到现在尚未能在生产率、经济效益、或生活水平等方面表明其优越于发达资本主义。

因此之故，我必须说，如果社会主义真正想成为世界上其他人民的模式，它就必须是生产能力最强、最有效率、最人道、最民主的制度。它必须能为其全体人民创造最高生活水平。列宁本人说过，一旦达到这种境界，社会主义就将取得历史性胜利。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大优越于我们近来看到的那种停滞状态。我认为，经济领域的、而不是军事领域的竞争，是有利于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它将表明其优越于我们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制度。这是一个论点。我还有另一论点。

加 请你谈谈另一论点，我非常有兴趣。

緬 问题是：所有这些是如何影响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呢？是否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与革命阶级呢？

我说，这些事情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必关心。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只应是这些国家及其人民关心的事情。我现在驳斥的那种态度反映工人阶级或其他革命阶级的一种非常狭隘的利益观点。至于我自己，我诚恳地相信现

代社会中任何阶级的首要利益是维持与保护和平。

加 并且避免核毁灭。

缅 并且避免核毁灭。不管人们作什么事情，只要能防止核毁灭，就将是现有任何阶级的最大利益。

加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感人的声明，我又一次表示同意。显然你是在背离革命的概念。这在苏联具有普遍性吗？

缅 我想你没有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们不是在背离革命的概念。我们说的是，和平环境促进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变化的那种社会发展，而且也许有助于加速那种过程。为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促进认真的、影响深远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停滞时期、有大规模贫困的增长、有斗争的加多加重和普遍恶劣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加 我懂了。但这里让我再问一个问题。在你提到社会阶级时，你是否有点过时？在美国、还有西欧，工人阶级、永久工人阶级的观点，肯定有些陈旧。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第二代，去作专业人员、政府职员，从事于科研和文化活动，进入管理阶层。在美国，体力劳动者的工作不久以前由南部农民取代，现在由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岛移民取代。在欧洲，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由外国来的工人取代。比如西德就不仅仅依靠本国工人，而在极大程度上依靠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我记得若干年前，有一次科隆的福特汽车公司头头对我以为他们雇佣德国人造汽车表示惊讶。所以我问你，是否在十足由经理人员管理的资本主义中如此不定形的社会阶级行将消失呢？

缅 我并不这样想。我们说的工人阶级，是指大量依靠

工资与薪水而不是依靠财产收入为生的人。你说的是这种阶级并非永远不变，工人主要是外国移民，是吗？

加 工人阶级处于经常转变的过程之中。

緬 这是真的，被雇佣的劳工阶级是处于经常转变的过程之中。由于有更多的劳工移入发达国家，它的结构变化着。而且，这也是真的，曾有一个时期，人们习称为无产者的最坚强的核心，主要由受雇于基本工业的工人组成，而今天则日益不是这样。

不过，情况本身并没有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的巨大多数，仍然是那些向公司或私人企业出卖其劳动力的人民。

加 我所说的是，这是一种非常散乱的结构。任何一个一定的时期，其成员的大多数是在使自己或其子女转入其他职业，而他们则由农业区域或欠发达国家来的人所取代。

緬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不认为大多数第一代人的子女转到了比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很不不同的社会地位。我们必须核对统计数字，看你说的是否真实。

加 我看你似乎有点陈腐。你试图保持阶级斗争。

緬 不，我不是。而我却认为你过于夸大了西德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例子。实际上，在经济停滞的近些年里，西德减少了移民劳工；西德现在的基本劳动力是德国人。

加 相反，现时西德的基本工业劳动力包括大量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在你的合作下，我将安排马克思回来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让他看看资本主义西德的产业后备军现在部分来自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我想他对此将留下深刻印象。你是否这样想？

緬 也许，但我说的是，不管产业后备军是些什么人，大多数目前在西德劳动的人是德国人。德国人基本上是力图保持他们劳动力的德意志特征。

加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不同，而且不得不查查统计数字。

緬 也许，当西德摆脱近来长期停滞时，情况将有所变化。你的分析一度肯定是正确的，将来也可能再次正确。

加 我承认你这种说法：比起 15 或 20 年前来，西德现在不那么依靠外国劳动力。

但还有一个关于我们两国经济关系的问题我想提出来。这就是利用贸易或贸易限制作为政治行动工具并不明智。我说的是卡特总统发动而我认为是被里根总统明智地取消了的小麦禁运。我也指的是现已放弃了劝说我们欧洲盟国禁止给那条著名输油管提供设备的努力，以及由于某种有损人权行为而拒绝在贸易中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瓦立克法案。

我愿意表示我自己对这种政策的不满，而且我怀疑我会与你严重分歧。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并不是不愿意批评苏联过去政策，所以我不能不愿意批评美国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你迫使我达到一种很高的行为准则。

緬 我同意，而且我高兴你作自我批评。在我的记忆中，苏联从来没有利用贸易作为反对美国或因此而反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武器。所以我毫不迟疑地同意：我们两国现在或者将来都不应当这样做。

十二、超级大国综合症

緬 在我们前面的谈话中，也在你的某些文章中，我听你提到过你所谓的超级大国综合症（综合特征）或超级大国神秘性，请告诉我这是什么。

加 在社会评论中，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命名落后于现实。我们说的所谓超级大国，就是如此。实际上，从力量 and 影响来说，最近 25 年来，苏联和美国的影响一直在退缩。

緬 你这是什么意思？

加 从你们国家说，与中国闹翻了，也许这是最近 1/4 世纪中最重要的个别外交事件。

緬 此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但从你们国家来看，至少在经济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影响的高峰，不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快就达到了吗？

加 等一会我就谈美国的情况；首先让我把苏联情况说说。你们在埃及、阿尔及利亚、远东和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也在下降。而且我认为，苏联在东欧的影响是否和 25 年前一样大，人们是有怀疑的。

緬 显然，你是被苏联力量遍世界的观念迷住了。

加 不，假如你允许，我准备马上谈美国类似的让步。但在此以前，关于苏联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说。尽管我知道的只是在报纸上读到的情况，但我猜想你们在阿富汗并没有

受到普遍热烈的欢迎。

緬 为什么你不提越南问题和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影响下降呢？

加 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难过。1/4 世纪以前，我们还有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双边条约网，现已大都不存在。我们在中东（那里的伊朗是我们的最亲密盟国）有过我们赞助的中央条约组织。我们在东南亚有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些都完了。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曾有牢固影响，但就希腊和某些其他国家而言，现在我们的影响削弱了。我们在中、南美洲得到的支持，过去比现在大得多。而且，我爽快地满足你要我谈越南问题的要求，我们在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遭到了灾难。

如上所说，80 年代晚期是个什么情景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两国都在退缩之中，然而与此同时，“超级大国”这个词仍然用来描述我们。它并不反映当前现实。

緬 但是，你所称的超级大国综合特征的实际基础不是仍然存在吗？这也就是说，我们两国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国家吗？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国家吗？我们两国都能够将核武器投向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们的核攻击能力远大于法国、英国或者中国以及其他核国家，这不就是通常说的所谓超级大国吗（至少在军事领域）？

加 我不完全同意。按照二次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演变的情况看，人们提到超级大国时，指的是一种广泛的影响，的确是对其他国家某种程度的控制。是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强国。不过，我愿意承认你关于军事优越性的论点。这种优越性是苏联和美国都不能使用的惊人的核武器积累。

緬 我并不想把问题过于简单化。我们两国核能力的上升，一直是两种制度之间深刻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客观的原因。在现代史上，也许是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能摧毁美国的国家；你们是第一次变得易于受到轰炸。我们同样易于受轰炸，但我们曾经受到其他侵略国家的威胁，所以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感到威胁。

由于这些原因，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我们两国之间军事冲突、毁灭性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高兴地说，现在看起来美国和苏联似乎认识到这样一种结果是不能忍受的，而且双方似乎在追求削减核能力的共同目标。假如中程核武器、以后或许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能削减，或者这两者都能被消灭，我们希望我刚才所谈的冲突的客观基础将来会进一步缩小。

加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你说的是：即使在军事层次上，超级大国的提法也在日益过时。

緬 将来可能成为过时的提法，这正是我刚才所要说的。不过我认为过去是真实的，现在也仍然是真实的。

加 关于未来，你是勉强同意我的，而我则准备接受即使是勉强的同意。

緬 如我以前常说，这种超级大国综合症的另一基础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的领袖，和各自社会制度内部最强大的国家。看看美国吧。它一直在进行扩张，实际上在世界所有地区（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都建立了它的军事存在。它通过攫取出口市场并增加其在外国的直接投资，以扩大其经济参与。这种局面，是和二次大战前美国的地位很不相同的。而这种扩张有些基本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美国认为不仅对苏联、也许是对全世界具有军事优越性。还有它日益增长的、超出国界的经济影响——我愿称之为跨国帝国的建立。美国心甘情愿地通过增加其政治影响以支持这种经济扩张。“美国是自由世界领袖”这个短语得到广泛应用，现在还常常被提到。美国通过使其他国家依赖其军事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其经济与技术潜力以促进其在海外的政治影响。这是一种导致超级大国综合症的推动力量。不是吗？所有这些的借口，则是停止、遏制和推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加 也许这些一度是事实，但现在不再是了。现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我们已有若干年的稳定。近时以来，没有一个任何重要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所以，我们不再谈论社会主义的接管，或者用你们的名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緬 的确是这样：已成为国际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美国扩张，美国不管在什么地方感到社会主义传入它认为是它势力范围的地区，就一定出现冲突点。尼加拉瓜和阿富汗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

人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美国关心出现一个象尼加拉瓜那样的、其社会结构不同于美国周围国家社会结构的社会。在阿富汗存在着明显的内战性质的冲突，美国支持一边，苏联支持另一边。

加 我早就感到我们对尼加拉瓜过分固执，我也肯定对苏联干涉阿富汗表示遗憾。所以我接受批评，许多苏联人也接受批评。但是，在世界舞台上，这些国家很难说是重要演

曼。如我所说，很明显，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没有向全世界传播。

福 基本上，你看到的是一种国际基础上的保持现状的局面。你说的是这种情况吗？

加 绝对是这样。其结果是，人们一度认为的超级大国形势特征——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推动力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推动力——不再存在。

福 但是，也许在最近的将来，或在某种较远的时间，类似的冲突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应当注意这种可能性。我想，我们应当回到这个问题上，并且看看假如真的发生，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它们。

加 我同意。但是，我追求的是世界形势中我能找到的任何聊以自慰的东西，而把尼加拉瓜和阿富汗置之一旁；我认为苏联和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某个不幸的角落发生冲突的危险已经减小了。

福 但愿如此。不过，我们也许忘记指出这样一些地区；它们把我们引入对抗，并非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冲突，也并非由于存在内战，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中东地区，在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有把我们引入军事对抗的危险，因为在那种反复无常的形势中，我们两个前超级大国不得不站在某一方。这也是一种危险。

加 我并不轻视这种危险。不过我愿指出，中东目前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激烈冲突，完全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这是两种伊斯兰信仰之间的冲突。

福 我提到的不仅是那场冲突，还有以色列与其一些邻国的冲突。不过，这其间也没有明显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之间的冲突。

我所说的是，我们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区被引入冲突之中，即使原来冲突发生在第三者之间。我认为对我们未来关系而言，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加 我同意，这是我们应当不断关注的问题。

緬 为什么我们不能讨论你所谓的超级大国及其影响下降的一些原因呢？首要原因是什么？

加 首要原因是我们双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大低估了的原因。这就是较小民族国家巨大的独立于外来控制的愿望。这种愿望导致或有助于导致殖民主义的终结；而且一旦殖民主义终结，前殖民地国家就不想接受任一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势力。

緬 苏联、在某种程度上美国都曾表明自己赞成消灭殖民制度。我们在联合国中曾一同为此努力。而在苏联，我们一直是在原则上支持任何地方的民族解放事业的。

但我同意你所说的，最近 75 年来，世界局势起了剧烈变化。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后，世界是由有限的殖民帝国所组成。现在，这些帝国已经变成 150 或更多的主权国家。这是应当考虑的事情。

加 而且这 150 个国家为捍卫它们的主权，反对苏联和美国。

緬 而且为捍卫自己主权互相对抗。

加 是的。不幸的是，前殖民地世界是战事还在继续的地方。

緬 我相信，你说的另一个变化原因是：属于同一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竞争。

事实上，从经济关系和市场势力范围来看，日本、西德和某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吗？你是否认为日本在这一领域是一种威胁呢？

加 肯定这不是军事威胁。日本人太机灵，没有把贫穷资源完全用于军事目的。如我前面所说，这一直是他们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不过，你提出的论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也是我将强调的。

在美国，当我们想到世界上的经济竞争时，当有必要在国会对此问题作演讲时，我们想到的、我们说的是日本而不是苏联。在我国的政治心理中，日本的经济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日本的兴起，一直是我所谓的超级大国综合特征衰落的另一因素。

但这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吧。苏联不也一直象美国一样吗？当你们考虑到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时，你们不是时时想到中国吗？

緬 在市场或投资领域方面，苏联和中国之间没有很多经济竞争；我们两国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这种冲突一直体现在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促进发展的不同态度、不同观点方面。它现在而且一直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加 这就是我的论点。象我们现在有或将有二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与日本——一样，你们是否将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二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和中国——呢？

我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日本那样看待，但我相信中国在苏联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

緬 许多年来就是如此。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我们邻国，但是我没有看到中国对苏联有任何威胁。在最近几年中，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很成功，而且一直在试验几种社会主义管理的新形式。

加 这又是我要说的：美国现在看到而且谈论着日本的经济威胁；你们苏联则看到而且谈论着中国的意识形态威胁。

緬 不，我们并不多谈这种意识形态威胁。在如何追求社会主义目标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大体上已成为过去的事。我们和中国近年来的分歧更是在外交和对外政策领域。我们两国之间的谈判，是关于我们共同边界这样一些问题。据我看，这不是一个具有特别巨大利益或重要性的问题；我们谈的是些小块领土。我们之间其他两个重要争论点是对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意见不一。这是中国和我国意见不一致的三个基本领域。但是，这是些我们已经和平讨论了多年的事情；我们并未看到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

加 我也没有看到日本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日本是我们大为钦佩的一个国家。但是，的确，你们社会主义世界比起中国、北朝鲜、北越都是亚洲共同社会主义体系组成部分的斯大林时代来，已有很大不同。

緬 我们曾同中国结盟是事实。但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就终止了。我们大规模地在经济上帮助过中国。事实上，中国的迅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主要来自苏联。

我认为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是：我们双方制度内部的一些发达国家帮助其他国家从上次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看到的只是后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独立。自然，这没有什么错。这颇象父亲帮助孩子们长大成人，却因他们的独立见

解或独立地位而感到意外。美国在战后不是用了许多资源复兴和重建日本吗？

加 我们是有过强有力的支持日本的政策，但我认为必须说明日本的恢复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主动性，基于它自己的努力。

不过，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年，的确存在以美国与苏联各为一方的两极世界。现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由具有多数巨大实力的国家组成，而这肯定是超级大国衰落的又一个因素。

编 我们刚才谈到日本，但自然我们不能忘记西欧，或西德。我以为，至少在发动这场运动中美国是起了作用的：这场运动是：将西德变为你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者之一，以使资本主义具有你所说的更多的强大组成国。我记得，我们苏联把这种战后对日、德援助的政策，视为有意识地复兴与重建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帝国主义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两个帝国主义曾经是侵略者。我们视此为对苏联的实质性威胁，而且也许是美国加强我国两大敌国——一个在我国西部边界，一个在我国东部边界——的诡计。这里，我得出另一个论点。是不是我们彼此对对方看法，至少部分不是根据客观的基础，而是根据主观的基础形成的呢？你是否认为这是事实？

加 绝对是这样。而且我愿指出，我们看你们支持中国，恰恰象你们看我们支持德国和日本一样。有一个长时间，美国人经常提到中苏集团——甚至在这种提法中把中国放在前面。

让我再谈另一个问题吧！尽管我们承认超级大国的境况

已经变了，但在我们文化深处，我们不是仍然信奉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吗？我认为我们美国人是这样，你们苏联人呢？

緬 我认为我们是这样，这是真的，而且将来有一段时间还会这样；我们将不得不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一直谈的是我们两种制度近来的经济形势。显然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一个人拥护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人拥护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我问你喜欢哪种制度，你的答复会是明白的；如果你问我喜欢哪种制度，我的答复也会是明白的，但我们的答复将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们每人仍然至少相信我们自己制度的社会与经济（如果不是军事的话）的优越性。你相信你们的现时的优越性，我们则更相信我们的潜在的优越性。由这些信仰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根源，在许多年中仍将纠缠着我们。

加 我想这是对的，但我愿意补充点别的东西。这又回到我们讨论得很多的课题——官僚主义。

当你们国家或美国的各巨大组织信奉一种思想模式——而过去这种思想模式的一个方面是存在着超级大国和超级大国扩张的观念——时，它们就不会发生变化。你个人也许能不无困难地改变你的思想；尽管我也能经过很大困难改变我的思想，但要一个官僚组织改变它的思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仍然官僚主义地而且在文化上信奉超级大国思想。即使超级大国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我们双方经历过巨大的力量收缩，依然是这样。

緬 实际上，我看到我们社会中有大批大批的人并不把自己和官僚机构以及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属于官僚机构；他们按我前面指出过的路线思维。他们对

社会前途有不同看法；而且，如果他们感到自己错了或者客观形势起了变化，他们愿意改变思想。

我认为我们应当试图以一种清晰的头脑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在未来100年里，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它是否将全部成为资本主义的？抑或全部成为社会主义的？它将象现在这样是一种两者的混合、两种制度共存吗？它将是由于两种制度的交光互影而并成一种社会，还是变成两种更不相同的社会呢？它将是一种我们甚至现在还不能想象得出的不同种类的社会——著名的黑格尔正（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合（我们可称为未来主义或某种其他名称的某种未来社会）概念的结果吗？这是我们仅仅能够猜测的事，不过你是怎么看的？

加 尽管我作最大努力并且过决不受任何污染的生活，我也并不希望百年以后仍然在世。因此，我可以非常安心地答复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没有人将来能够来到我面前并且幸灾乐祸地说我错了。

我猜想我们将有一个混合的社会。现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将有一种沿着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路线走向市场的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将致力于对社会事业的更大关注。从现在起再过100年，仍将有一些国家进入这种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体的行列。我说清楚了吗？

福 是的，我认为你把你的意见说清楚了。在未来的100年里，我也不会活着对我们现在提出的这种猜想负责，但一般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未来社会将是一种现存社会形态的混合体，也许有某些新社会形态出现。我相信，那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社会循着何种道路发展，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一致认为：在现代核世界里，我们两种制度除按照我们现在走的道路走下去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在循着这条道路走时，还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走向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加 我同意这种看法，而且我愿意再说一次，我对超级大国退缩而不是超级大国扩张的看法感到满意。如果超级大国继续扩张，最后的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也对苏联重新检查而且修改它的制度的方式感到满意。最后，作为一个长期关心社会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我非常希望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美国人将继续追求一种和谐的更为正义的社会。

缅 我们已经谈过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的革命，但是，我们还有在如何看世界及国际关系的未来方面的革命。我们称之为新思维方式。也许应当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加 让我们下次讨论这个问题吧。

十三、和平共处的条件

加 昨天你说苏联有一种新思维方式。确切地说，这是什么？它和和平共处问题有何关系，而且实际上对和平共处本身有什么影响？

緬 这种新思维方式可以被视为我国的一种意识形态革命；它和我国经济政策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这两方面，鉴于所有国家的日益互相依赖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核现实，都有一种全新的看待当前现实的方式、一种新的看待我们的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中如何生存和共存的方式。

加 请你谈得更具体些。我们美国有些政治家经常说他们赞成新思维。但常常是：新思维实际上或者是旧思想，或者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出来的东西。我不能让一位苏联访问者象我们那些更不可捉摸的知名人物那样说些套话。

緬 我不想详谈我们现在认为的新思维方式的所有方面，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三个突出的论点。

第一，我们两国应该走各自的道路。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曾谈到两种制度都有自己的问题，而双方都认为有各种各样办法处理这些问题。

加 明确地说，我们双方应该认识到，在这个星球上可以有两种经济制度，是吗？

緬 的确如此。但是，必须还有一种认识：当我们各自

走自己的道路时，不要试图妨碍对方，相互间不要采取任何蓄意的行动给对方制造更多困难。

这话听起来有点笼统，让我举几个例子。人们曾经认为，一个政府在国内无论作什么事，都是自己的事；也许，在很长时间里，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国家主权概念意味着，政府有绝对权利在本国境内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然而，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原子核和互相联系的世界里，不仅在核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事务方面互相联系。让我们先看看军事方面吧。

一个国家在自己版图内进行这方面的行动直接影响着另一国的版图。比如，一方中、远程战略导弹的部署，直接威胁着另一方的安全；它们是专门对准对方国家境内的。它们可能击中和摧毁对方国家；而当这种可能存在时，就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一方的军事行动是否侵犯另一方的利益。

加 你是说远程战略武器不仅与本国的防务有关，而且能引起另一个国家的担忧。这问题挺明显，不是吗？

缙 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直到现在，美、苏双方都确实在那样干。他们不仅部署战略武器，而且都派出海军驻守在对方邻近地区，保持着战略轰炸能力，等等。所有这些行动都直接影响对方的安全。在未来日子里，一个国家开始考虑自身安全时，必须一再斟酌，在采取行动前，考虑到对方的安全。

让我回到我先前曾经谈过的一个问题。有时，当一个国家过于重视短期利益时，其结果无形中损害了它的长远利益。我回忆起，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决定部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他认为那样干可在与苏联的

力量对比上占优势。然而，只过了几年，我们便赶了上来，而美国安全恰恰象尼克松总统试图削弱苏联安全那样受到削弱。

加 你举此例是说明短期优势被长期效果摧毁了吗？

緬 是的。这是新思维的第一点：走自己的路，不要因自己的行动把另一方推到敌对方面去。与其谋求短期收获，不如强调长期利益，因为双方利益互相联系，所以要考虑对方的利益。

加 我完全同意。让我们接着谈和平共处的第二个必要条件。

緬 第二点就是要理解：我们仍然极有可能陷入直接和间接的对抗。世界上的冲突将不断发展，但重要的是，当它们发展时，我们的行动要与过去极其不同。我们必须停下来，想一想，一定不要立即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那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可能导致我们两国间军事冲突的逐步升级。

这使我想起中世纪法兰西一个国王提出的古老法则。当时法国封建主之间征战频仍，致使农村荒芜。他提出所谓“国王的四十天法则”，要求每一个封建主发动对另一个封建主的战争前，都要事先考虑40天。为此，法兰西避免了许多场战争。

加 我以前没有想到要回顾封建时代，但你这样做我也同意。不过，一个来自苏联的人大谈封建主义的好处，这是第一次。

緬 事实上，联合国宪章内载有一些类似“四十天法则”的东西。安全委员会的整个程序实际上建立在那个原则上。

加 对我的话不要过于认真。

緬 在直接或间接冲突逐步升级时，应该相互协商，并

寻求一种建设性的、和平的解决办法，不论局势初看起来多么危险。

加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你建议的下一点是什么？后面我将谈谈我的想法。

緬 我的第三点是：尽管两种制度对抗，也许存在冲突，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合作的技巧可以不断发展，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学会把对方看成在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前进中的伙伴，而不是竞争者或敌人。

加 在经济事务中尤其应当这样，是吗？

緬 是的。在开发新能源、对付不发达问题和癌症、艾滋病以及吸毒成瘾这样一些医疗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加 对此，我无条件地赞同。我在印度呆过相当长时间，我知道总有一些美国人经常为苏联在那个国家的影响感到担忧。我猜想也有差不多数量的苏联人担忧美国人的影响。你说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其道而行之，共同支持印度的经济发展，而我认为可以加上一点，与其提供军事援助，不如倾全力提供经济援助，对吗？

緬 我认为这是个好例子，但我不想说得过于理想主义。

加 别害怕理想主义。我们如何更好和更稳妥地和平共处，我认为首先要消除害怕。当有人告诉你一定不要太理想主义时，你就可以断定他或她完全赞成世界应是一成不变的。

緬 可是我赞成世界应有所改变，有所进展。我说不要过于理想主义的原因是：我认为，贯彻我刚才阐明的原则的唯一机会是重视现存的对和平共处的威胁，并阻止它们。威胁是实在的，我们身边到处可见，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它们。

加 你说在当前总形势中有我们必须加以反击的危险。请举例说明。

緬 让我们从我认为也许是危险性最小的事情开始。那就是谈到涉及对方的事情时的措词问题。

加 我们互相说了对方一些什么话吗？

緬 是的，的确如此。我们时而听到对方说的我们认为侮辱和挑衅的评论。

你记得赫鲁晓夫先生来美国时，他的一句话被译成“我们将埋葬你们”吧。这使许多美国人理解为苏联一心要摧毁美国，杀害和埋葬美国人。

加 我当然记得。它大大促进了我们采取冷战立场。

緬 我必须说，我完全肯定赫鲁晓夫先生不是那种意思，但不幸的是，他的措词使美国公众相信实际上这就是他心里想的。

另外，还有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那就是几年前里根总统使用的“罪恶帝国”一词。我们知道，他是在作神学讲演时讲到那个词的，而在苏联，这个词却被理解为说我国是个属于魔鬼或由魔鬼建立的帝国，里根则好象是……

加 摧毁苏联的报复者，是正义的、反对魔鬼的神。

緬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苏联十分严肃地认为这个词具有侵略色彩。

加 我也倾向于同意。希望再加一句：我们应该学会不理睬公开性时代的这种修辞学。我们美国总会有人，包括政治家们在内，作一些令人讨厌而且是挑衅的评论。

緬 但是，除这些诡辩和陈词滥调外，还有许多其他更重要的危险，其中之一就是不停顿的军备竞赛。尽管有中程

核武器协议，军备仍在增加；核武器库仍在扩大；核试验仍在进行。常规武器库也没拆除，还保留着大批常规军，而且双方还在制造也许不会使用的大量化学武器。星球大战计划正在发展。这一切对世界是一种威胁。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尔干半岛国家被形容为坐在火药桶上。现在，不仅是巴尔干半岛国家，而是全世界、整个文明社会都坐在可以随时完全由于失误而摧毁世界文明的核武器库上。

加 由于错误而产生的战争。

缅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控制军备竞赛；这是我们计划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加 这里让我也提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都会同意把武器控制的秘密神学留给其他人去讨论，但我有两个想法，其中一个我以前也许提到过。

我为当代那么多人似乎认为常规部队没什么坏处感到不安。我的年龄使我记得两次世界大战都主要是使用常规部队进行战斗的。我觉得，死于那两场战争中的人，和死于核武器没有什么区别。

我以为，本世纪中任何一次战役也不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索姆河之战的第一天更为悲惨，将近2万名英国士兵在迎着隐蔽的机枪狂扫的连续进攻中丧生。今天，我们看到伊朗和伊拉克的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中死于非命。我希望看到人们更多地讨论常规战争的危险和罪恶影响。

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死了2000万人，而那是一场常规战争。

加 一个非常好的注解。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我对苏联为什么挑起星球大战——华盛顿称为战略防御主动权——这样一个争端感到困惑。在美国，普遍的印象是，它行不通；事实上，这是我国最科学的观点。而且，它当然要耗费一大笔钱。为什么苏联要坚持争论这个我们自己应当更担忧的问题呢？你能解释一下吗？

緬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从逻辑上讲会与你们的观点稍有区别。如果我们确知你们的计划是一场大失败，完全是一次灾难，我们不会担忧。然而，它必定会生产出一批新武器；虽然其中有些武器也许对反击从另一方射向美国的导弹不那么起作用，但事实上它们可能被用来从外层空间形成对我们的威胁。我特别考虑到部署在空间、并瞄准苏联领土的激光和能动武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对此特别关注。

另外，虽然你们也许对你们资源的浪费不特别担忧——你们惯于浪费资源，因为你们的资源总是如此丰富——但你们的空间计划将助长苏联要求现在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星球大战计划的那些人的欲望。从我们的情况看，这样的计划将耗费用于老百姓身上的大量资源，而这正是我们现在优先考虑的社会重点工作。这是我希望说明的两个基本论点。

但也许还有最后一件事。我感到，问题不只是你们浪费资源的癖好。我认为你们的武器制造商对今后 20 年一个完全有把握的市场有着深刻的既得利益；他们把星球大战计划视为未来岁月里一个惊人的富矿和非常有利可图的经营领域。

加 你不认为他们恰好是希望帮助你们的主张强硬路线者的慷慨的人吗？

緬 我不知道，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们心中想的是

利润。

加 我乐意接受你们的帮助，以使星球大战计划得到停止。但现在我想谈谈为了和平共处而必须克服的某些危险。

我有这种看法，甚至相信，我们双方都有人在超级大国（如果我仍可用这个词的话）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中具有既得利益，其中有些我们已经提到过。

缅 你指的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吗？

加 在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确有这种既得利益，而在我们的谈话中，显然这不只是美国一方的问题，双方都存在这种既得利益。在我国，我想在苏联也一样，在争执、紧张关系和冲突中，还有我们可以称为知识界的既得利益的东西。

缅 那指的什么？

加 我们这边有人毕生都在发出共产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危险的警报。我斗胆认为你们那边也有人——记者、研究人员和其他人——致力于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危险发出警报。

缅 是否那些人在大众传播工具中大造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加深我们两国民众中的疑虑呢？

加 绝对是这样，甚至在学术杂志上。由于他们具有那些信念，并终身都抱定那些信念，他们不想变革。

我知道，美国有为数很不少的研究人员，倘若我们两国的敌对关系缓和，他们将不得不否定自己多年来的言论。尽管我能控制我的伤心，仍为他们感到几分悲哀。我能理解，对于他们来说，相信关系不断紧张，以证明他们一贯正确是多么必要。

缅 大概是他们的年龄太大，难得改变。较年轻的人也

许愿意走更富于建设性的道路。

加 我希望会如此。当然，年龄本身可能对错误的纠正多少有点阻碍。

下面我要引证我认为经常谈得不够的另一种危险。我们在讨论中使用了“官僚体制”一词，而且用得太多，听来使人厌烦。但是，人们必须再次强调，官僚组织通常坚持一种思维方式，要使之转换为另一种思维方式极其困难。这种组织的成员如提出某种不同看法，则被视为反常。

缅 也许你能举个例子吧？

加 我想到的是五角大楼（也许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国务院）坚持长期与苏联为敌的思想。我大胆认为，你们也不会完全没有类似的情况。

缅 是的，是存在一些国防工作人员的共同职业特征，这种特征使他们多少有些从单方面看待更为广泛的问题。他们紧紧地站在军事立场上。他们有时理解不到他们支持的武器争论所包含的更广泛的意义。

加 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又一次找到两种制度中的一些类似情况。

缅 你似乎有点宿命论。既然我们两种制度中各种官僚机构掌握着大量权力，看起来它们是和平共处的真正威胁，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种危险呢？

加 我不完全是悲观主义的态度。我是关心，而不是悲观。在我们的社会中，克服这种危险的途径，是通过政治意志的力量——在这里，是与苏联达成和解的政治意志。就全体美国人而言，不论死得有无痛苦，死于核战争的思想在政治上是不很受人欢迎的。所以，我们已经在开展倾向和解的

强大政治运动。如我前面所说，我国将在 1988 年举行总统选举，大部分有关候选人将谈到武器控制的需要和提出反对核毁灭的保证。

緬 我认为我国用政治意志克服危险的一个好例子是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行动。自担任总书记以来，他非常有效地改变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观念，并抑制了某些国际争端概念中你提到的官僚体制的惰性。重要的是，他在这方面得到我国人民的普遍支持。

加 我希望力促其成的避免危险的另一件事，是更加强调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在以前的一次对话中，我们曾谈到今后 100 年以内的世界远景。我敢说，如果到那时一直没有出现核对抗，人们将把今日苏、美间的紧张关系看成小事一桩。然而，倘若爆发过一次核战争，如有什么人活下来的话，他们将把这次战争视为头等大事。因此，我坚决主张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待我们两国当前大大小小的分歧。与核灾难相比，它们必然会显得微不足道。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緬 是的，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认为，在你们国家历史上有运用政治意志的伟大实例。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你们具有抑制官僚政治力量的政治意志的政治家之一。我记得，在去雅尔塔之前，他听取了身边大多数人的劝告。他们说，他对待苏联必须采取非常坚决的、即使不是僵硬的立场。因为当时苏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正成为对美国的军事威胁。然而，他无视那种劝告，并与斯大林和丘吉尔前往雅尔塔会谈，一起为未来几十年奠定了和平结构的基础——最终成立了联合国。

你知道，人们有时说我们之间过去 40 年没有爆发战争

是因为有一架恐怖的天平，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之间基本上没发生真正的对抗，是因为具有这样做的政治意志的领导人建立了和平结构。

加 某些修正主义者曾给雅尔塔会议加上罪恶的内涵，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记住战时的那些会议；这些会议为我们追求更伟大目标树立了好榜样——在这里是对付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与此同时，这些会议还使较小但并非不重要的分歧处于从属地位；要不然，这些分歧将使与会各国发生分裂。我们这些从那些年代过来的人，将把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作为成功而不是失败留在记忆中。

缅 对。接着是波茨坦会议。波茨坦协定由杜鲁门总统签署。在苏联人记忆中，杜鲁门并不是特别友好。然而，他签署了那些协定，也是他的明智之举。

加 在这里，谅你会允许我讲一件我的轶事。

缅 请讲。

加 当时，我正在欧洲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里工作。我有个同事叫乔治·鲍尔，你见过他。有天早晨，他叫醒我并且说：“你知道下星期欧洲的大人物们将进行会晤以决定世界的前途吗？”我答道：“当然知道。我读过《星条旗》报。^①”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做伤感情的事妨碍我们赴会，我们就友好解决没邀请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掌握有一架飞机，我们就同近来常常提到的军备控制谈判代表保罗·尼采一起飞往柏林，并前往美国人驻地。我在那儿的朋友伊萨多·卢宾让我同他一起参加赔偿委员会。鲍尔和尼采也找到了类

① 一种军队报纸。

似途径。我们呆的时间不长，但反映了当时人们设法出席最高首脑会议的情况。

緬 我虽运气不够好，没有得到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机会，但战后不久，作为一名年轻人、一名学生，我有一次成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所谓大国外交部长会议苏联代表团成员之一。与会国为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观看那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如何一起工作，是一次很好的阅历。那就是冷战的开始，但他们仍然坐在一起试图解决共同的问题。

加 我们的代表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吗？

緬 不，是贝尔纳斯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代表美国，乔治·比多代表法国，欧内斯特·贝文代表英国，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我国。

我认为战时我们的同盟和战争结束后共同问题的解决，是两个对立体制可以合作的完美例证。事实上，德国和日本的社会结构更接近美国的社会结构，因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你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却与社会主义社会合作消灭法西斯主义。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工作的完美例证。

加 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1941年6月的那一天。当时，由于希特勒入侵俄国，传来了苏联在战争中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消息。那年夏天，我住在北弗吉尼亚，在前去华盛顿时，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新闻。我第一次感到也许有了希望；在此之前，那场战争的前景看起来是极其严峻的。

这里我只再谈一点。苏、美一起对付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威胁，但即使那场威胁，与核战争的威胁也几乎无法相比。我们应时不时地想到这一点。

緬 在现代史上，约翰·肯尼迪在我国被看成那种准备

使我们两国处于剧烈对抗状态的美国总统。所以在他任期内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由于这种危机太可怕，他于是试图以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式解决这场危机，并进而缔结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条约之一，即禁止核试验条约。

加 《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

编 是有限的。但从实际效果看，它使大气层避免了核污染。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加 象肯尼迪同其他许多人说过的那样，他曾对我说，他从不指望哪一天早晨醒来不想想当天能为减轻核战争的威胁做些什么事。

编 不论你对尼克松总统的看法如何，他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将作为 70 年代初缓和局势的缔造者载入史册，而这也是确有积极意义的发展。

加 我从不是尼克松总统的热情支持者，但我为此而称赞他。由于同中国关系解冻，我认为他和亨利·基辛格有很大功劳。那是早就应该由我的民主党同僚们做的事。

不过再想想，还有另一种我们必须意识到的危险。这种危险我们以前谈到过。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站到其他国家之间冲突的某一方面去。

我们这个时代令人悲哀的特征之一是：虽然无人死于美、苏两国间的战争，但在一些小国之间和它们内部，却发生过极多地区冲突，许多人在其中丧生。我们双方都要意识到支持那些冲突对立面可能招致的危险。不管在中东、亚洲或其他任何地区都是如此。

我以过去越南和印度支那以及现在的阿富汗冲突为例。我希望有一个通则，一个总的谅解：我们双方都退出其他国

家的内部冲突。你同意吗？

缅甸 我不仅同意你的这个意见，而且认为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极力消除其他国家之间和它们内部的军事敌对状态。我们一定不能把它们视为遥远的、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

我引60年代中期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战争为例，你也许能忆起苏联曾主动促使这两国坐在一起，而且事实上帮它们和平解决了争端。我们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先生与印度总理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一起到塔什干。在那里，很快达成一项协议，停止了两国间的军事敌对状态。

但从当前来说，我们应该为终止中东冲突做出更大努力，因为它实际上已发展得不可收拾。我知道，有一个时期，美国采取的立场是他们可以单方面解决以色列和其邻国间的争端；尽管苏联非常希望对此进行合作，但美国方面不大情愿与我们合作，这显然是因为你们认为那样会扩大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我以为，那种不情愿仍然存在，而这是我们用对抗眼光互看对方的一个例子。这种观点妨碍我们双方帮助终止一场已真正成为世界文明那个地区的脓疮的冲突。

加 我们美国打算维持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这牵涉到大量过去历史和一种巨大的感情义务。然而，至少我们一定不要将中东看成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冲突的地区。我斗胆认为，对共产主义而言，没有任何事情能象一个共产主义的伊朗那样制造麻烦的。

缅甸 既然我们谈到了地区争端，我提出一个自我们以前某次讨论以来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问题。你曾提出一个评论，大意是说，就我们两种制度而言，你希望维持国际现状，意

即两种制度都发展。

现在，非常现实的是，不能排除国家之间的国际均势出现变化的可能性。例如，假定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世界某地——拉丁美洲、非洲或亚洲，什么地方并不重要——某国政府建立起 70 年代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式的政权。美国将如何处理这种形势呢？你们将用对待阿连德先生，或者，比如说，后来对付格林纳达那样的方式吗？你本人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以对付格林纳达和阿连德先生的同样方式，那就会造成我们两国间更多的摩擦，我将为此感到遗憾。

加 入侵格林纳达后，我立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遗憾。关于我们对阿连德的行动，我同样表示遗憾，特别因为我认为，如果某国政府通过民主程序执政，我们就必须承认它。对智利来说，也许阿连德不是最佳选择，但那不是应该由我们决定的事。我期望苏联受同样的约束。

緬 也有一些地方的政府上台，不完全是通过你们所谓的民主或议会手段，而是通过革命方式，这就会导致两派之间的内战，其中一方也许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而另一方则是资本主义的。那种情况就可能增加两种制度的摩擦。

加 我赞成我们双方都置身事外，实际上，我是极力这样主张的。不过，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先前谈过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可行性的选择。我再引证马克思的一段话：在有资本主义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美国曾一度耗费大量时间担心比属刚果（现为扎伊尔）是否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那种可能性。

编 作为一个学者和政治人物，你并不非常恐惧共产主义的阴影，我知道，但……

加 我不害怕没有过资本主义地方的共产主义阴影。

编 我指的是共产主义的全面阴影。美国有许多人仍然把共产主义者视为他们的敌人。70年代，当我在联合国任职时，有一次，我从肯尼迪机场乘出租车回住地。出租车司机显然一直在收看电视新闻，他说：“瞧，这些共产主义信徒现在在安哥拉，明天将出现在布鲁克林。”你看那种心理状态！

加 有些人从纽约出租汽车司机那里获得他们的全部知识，我真心希望你不会是其中一员。

编 我说的是他从美国影响广泛的传播工具那里得到知识，而传播工具是从你先前谈到的既得利益那里获得知识的。

加 我建议我们接着谈另一个危险。

编 为干涉格林纳达，你们提出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武装部队保卫美国在那个国家里的财产和公民。现在，有大量美国财产和投资在海外，有大量美国公民在其他国家。我想，任何地区爆发冲突，都将有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巨大危险，这种干涉是以我称为“美国强制下的和平”心理状态为基础的。我劝你们对经常出现局部冲突的地区招致的对美洲的危险采取更为明智的看法。

加 作为一种实际问题，我不排除营救陷入灾难性局势的美国公民的必要。我的确希望我们的这种行动不被看成是美帝国主义的演习。

编 阿瑟·施莱辛格提到“超级大国错误”，而不提美帝国主义，我想，他也许颇有道理。

加 我们将把他算作支持我们关于超级大国综合症的看法的人。

不过，我想提出另一件事，一件也许我们已搁置得太久的事。如果我们打算尽量减少我们两国间的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双方都存在着仍然可能严重危害双方关系的国内政策。我指的是人权问题，对此我能谈谈我的看法吗？

缅 当然，请讲。

加 这是我们必须采取明智观点的问题。美国有人权问题，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及其在大城市里的生活方面。但我国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严厉抨击苏联在人权方面的不足之处，这不是因为他们对人权格外关心，而是因为这是一种便利的武器。对于许多人攻击苏联的这种缺点，而另一方面又十分容忍比如南非更恶劣得多的践踏人权的行爲，我总是感到不安。然而，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一直有持通达而文明观点的男男女女真正为苏联的人权问题担忧。这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内政策的例子。对此你能给我一些希望吗？

缅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苏联也关注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这里，我希望说的是，人权是一个双方、而不是单方面存在的问题。

加 我承认这一点。没有钱，没有任何生存手段，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限制，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我希望回到苏联的问题上。

缅 我特别想到的是，我相信，美国没有批准联合国的一个协定、即提倡世界各地人民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协定。

不过，让我们回头谈谈苏联的情况吧。当然，人们应该

认识到,自从所谓红色恐怖——内战中的革命恐怖——和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的时代以来,我国已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那个时代的许多非法事件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不过,我们还没有健全的司法制度。这不仅牵涉到被称为持异见者的人或少数民族集团,而且同其他一些缺陷有关。目前,由于有了公开性政策,苏联舆论界正在就这些缺陷展开广泛讨论。

还有,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先生特别强调要在我国制度中发扬民主。他后来又强调,民主和经济改革是当前革命最重要的、互相联系的目标。民主将成为与官僚主义俱来的消极面(个人崇拜也许是其中之一)进行战斗的主要工具之一。所以说,我们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迈进。

你也许知道,有些事情,比如从两个候选人中挑选一人以代替一个候选人,已在苏联选举中广泛实行。目前,苏联新闻报道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自由。人权情况也在一些其他领域内得到纠正。所以我感到很有希望。我不清楚是否你们国家的人民对我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抱有同样大的希望,但我对我国人权方面的进步是抱有极大希望的。

加 去年冬天,当我在苏联时,我对那里的人们讨论问题时比我前几次访问期间自由得多,人们对影响他们的制度的批评大胆得多,留下深刻印象。我还可补充一句,我注意到我们所称的黑色幽默多么频繁地用来讽刺社会主义制度。

不过,让我再问一个多年来我一直考虑得很多的问题。你如何看待希望离开苏联的人们移居国外、尤其是移往以色列的前景呢?

编 我认为,那个问题现正得到解决。移居国外的规定更加开明,我感到这方面有了进步。

你应该知道，移民问题触及我国民众意识的一个非常敏感点。在美国，当人们谈及从苏联向外移民的问题时，通常指的是苏联国内的特殊种族集团。

加 事实上，我就是这样。

緬 但你必须认识到，从原则上讲，每个公民应该地位平等，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不只是两三个种族集团，都应有移居国外的权利。我国有 2.8 亿人口，积极要求移居国外的人远低于 50 万。就全体国民的心理而言，这是一个敏感而不甚简单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方面有所进步。

加 如你允许，我想再谈点个人轶事。我历来赞同自由出入国境。我生长在加拿大，前往美国或从美国回国，几乎无需理睬任何法律禁令。年轻时，秋冬两季，我经常去底特律找工作；春季或夏季在加拿大参加选举，11 月又参加美国选举，也全然不稀罕。我从不觉得那是很不正常的。

緬 不，完全不。现在出入苏联国境的人比过去多得多。这里我说的是旅游观光、出国探亲访友。然而，我必须说，我们在这种旅行方面有重要的经济限制。尽管我们的国际收支赤字不象你们国家的那样大，但我们确有问题。你们通过允许日本人购买你们的公司和政府债券，轻易地使你们的赤字不致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我们的见解不同，我们并不准备让我国的经济制度冒崩溃的危险。因此，我们正在努力逐步实行可兑换卢布制，并制订关于人们出国时可以兑换的货币量的更加宽松的规定。

我们完全赞成实行全面兑换货币制。可兑换卢布是戈尔巴乔夫先生经济改革的正式目标之一；随着我们走向这一目标的步伐，我国人民出国前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将

越来越自由。

加 我感到我们的讨论已涉及一些新鲜事情，但我特别对这种想法感兴趣，即日本人可能也会帮你们缓和国际收支赤字的问题。

编 当我们提到日本，或许还有西欧时，我想到了对和平共处的进一步威胁。70年代初缓和正在发展时，便引起了人们很大关注，在西欧尤其如此。人们关注的是美国跨国公司与共产主义官僚机构结合起来的危险。美、苏间的和睦关系被认为是在建立一种苏、美的共同统治，是两个超级大国瓜分世界的阴谋。我认为，这是影响我们两国关系并使之恶化的一个因素，这种影响是不应该的而且是多余的。

加 这很重要。我们必须使人们理解：我们并不是忙着瓜分世界。我承认，我仍然认为你个人对跨国或多国公司过于担忧。但我认为人们对于美、苏间更加友好交往的后果的担忧，现在并不很严重。我们相信西欧大多数人民将欢迎我们两国间的和睦关系。我希望他们会这样。

编 实现你这种愿望的方法之一，是促进我们两国之间更富建设性的合作，并在事实上使这种合作成为全球合作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全球合作中，其他国家也积极地、平等地参与。也许那时我们会找到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办法。

十四、合作的项目

加 现在，当我们的交谈接近尾声时，让我们谈谈一些完全是可以促进我们合作的办法。当紧张关系缓和（我们也希望它将缓和）时，我们两国如何才能合作呢？因为我们两人都是经济学者，我想我们会首先想到经济事业，但我们不要把自己仅限在经济事务方面。

戈尔巴乔夫改革可望增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经济交往，我的这种想法正确吗？

编 绝对正确。戈尔巴乔夫改革为国际经济提供了两个重要发展条件。其一是一种立法，它使苏联企业在国际贸易领域与国外公司直接打交道成为可能，而以前这是由国家外贸部垄断的。

加 企业现在可以不通过政府的部直接与国外卖主联系吗？

编 可以不通过该部直接与国外卖主或买主交往。至少对大部分大型企业是这样规定的。较小企业将仍然要通过中间人。外贸部下面设有各种不同的公司，这些公司专门负责进出口一批特别商品。

加 另一个发展条件是什么呢？

编 另一个也是一种立法；它使我们的企业与国外以及苏联国内的外国公司建立联合企业成为可能。

以前，我们在其他国家已设有合营企业，例如在英国、比利时和若干欧洲其他国家。在比利时的那一家专门负责在外国市场上出售苏联产汽车。

我们现在谈的是在苏联领土内建立合营企业，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发展。就此而言，这给外国公司通过投资于我国工业、贸易或其他无论什么需要发展的领域以参与苏联经济的机会。

加 你们不再把这些合营企业看成资本主义颠覆活动中心吗？

缅 我们希望它们不是，但我要说明的是，依照法律，外国资本参与将不得超过总资本的 49%，我们将保留 51% 的控股。不过，49% 已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它保证了外国投资者几乎平等的参与权。

加 根据实际情况和这些合营企业的长期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基本控制权是掌握在经营上最敢做敢为的领导人手中的。在大多数情形下，49% 和 51% 的所有制差别完全不重要。你同意吗？

缅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谁控制公司的管理部门，法律要求总经理是苏联公民。然而，也为外国人的积极参与提供了条件，而且我认为，这将保证平等控制和或多或少的平等伙伴关系。

这种合营企业的建立，是希望发展苏联同包括美国和其他主要合作者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眼下，我们的主要资本主义伙伴是联邦德国。我们感到，与该国的贸易还需要扩大，同时，我们也感到极有可能增加与美国的贸易。

加 我希望这成为事实。不过，让我们谈得具体些。为

增加贸易额，你们必须卖而我们可以买的是什么呢？显然，我们在经济事务上可以提出的主要合作形式之一，是购买苏联货。你们有什么足够的货物可卖吗？

緬 这是你们美国人经常提到的问题，我必须说，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答复的。你必须认识，直到最近，苏联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面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向他们出口的份额一度占70%至80%左右，现在仍然非常接近这个比例。目前，你也许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十分强烈的竞争；市场不是真正靠战斗取得的，而只是通过长期协定逐步发展起来的。

最近10年里，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货物大部分是燃料，诸如石油、天然气或原料。这两种买卖是比较简单的。这些产品的质量一般比较容易鉴定，价格一般是世界通行价格。人们要做的不过是把自已的商品交到一个著名的该特殊商品买卖的国际中心。

加 这些我都知道。但未来的国际市场肯定将会是以制成品，我想，尤其是以消费品构成。

緬 我想会是那样。我们成功地向少数欠发达国家扩大了设备的出口，那是事实。然而，也许除少数情况外，我们向西方或日本销售制成品未获成功。武器销售可能是个例外，但武器不是我们应该努力扩大出口的货物。我认为武器买卖应该由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加以限制，对吗？

加 对增加武器买卖我毫不热心。但我必须请你回到基本设备和消费品话题上来。消费品经常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适应新风尚、提供新设计、开拓适应不断变换的消费口味和需要推销技术的新产品。有时，如果我们花在做广告、上电

视方面的钱不象生产商品成本一样多的话，我们不再发明新产品，甚至不更换设计。你们打算如何同这种情况斗争呢？

緬 在世界市场上做那种工作我们经验不足，但这正是合营企业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外国资方的销售经验，而且希望外国资方参与合营企业将是解决销售问题的实质因素。

加 你们设想你们生产商品，至少在起步时，联合经营的外国人则负责商品的宣传、推销和出售吗？

緬 我们希望全部经营活动由合股人联合处理，这就是说，外国资方也参与商品的生产。这样，我们将充分利用其生产方面的经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在产品管理上相当有经验。我们也希望向它们学习各种复杂的推销技术。

加 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联合办企业看成一种教育事业吗？

緬 它是教育事业，但从一个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经济事业。我们希望，合营企业不仅考虑进出口贸易，而且将在我国经济各部门孕育出一大批子公司。就我国在发展市场关系方面的管理而言，以及为了在我国发展经济过程中使我国更注意消费而言，这是一所有益的学校。我想这将会澄清我们和美国的大量误解。如果作为一种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从而我们双方都能缩减各自的军事开支，那将是一件好事，并为经济合作奠定非常牢固的基础。

加 我想有一些人，包括我的一些同胞在内，他们会说，即使苏联经济是一种计划性更少的经济，对于所谓自由企业公司来说，也不是非常适宜的环境。

我的老朋友、百事可乐公司的唐纳德·肯德尔在使俄国人

以百事可乐代替伏特加方面毫无成绩。不过，我不知是否其他公司也会遇到这类困难。对此，你有话要说吗？

缙 我曾听到过一些类似问题，但更多的是从美国意识形态部门中的人那里，而不是从公司行政人员口中所说的。一种抱怨是：对公司来说，资本主义世界远比苏联的条件要好，为什么在别处投资的可能性很多时，要投到计划经济中去呢？

我的回答是，双方都存在客观困难，对这些困难不应该轻视。大型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如何在我们的计划体制中站稳脚跟呢？倘若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向合营企业指手划脚，而外国资方对此颇为不快会怎样呢？苏联国内合营企业和国家企业之间工人的地位不同，又会怎样呢？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我认为，在双方的合作下都可以克服。基本情况是，对我们双方扩大新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

加 除此之外，这是一种真诚的发展合作关系的动向。

缙 正是这样。事实上，几百家公司已明确表示与苏联共建合营企业的意向。这是一种征兆：无论某些意识形态部门成员怎么想、怎么说，而企业家却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发展领域。

加 我们可以顺便指出：这并不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我的极受人尊敬的老朋友之一艾夫里尔·哈里曼，曾于20年代去俄国建立了一个合营采矿企业，不是吗？

缙 他父亲或他家中某一其他成员曾去格鲁吉亚共和国创办一家开采锰矿的合营企业。20年代中期，哈里曼先生来此进行管理。他发现那个时代被称为特许采矿场地的条件并不特别令人满意。

加 但他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吗？

緬 实际上，那个特定的特许采矿场地在若干年后被收回了。不过你的说法符合 20 年代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情况，那时，我国允许外国人来我国经营特许企业，而且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们的发展。

加 我希望再谈谈我们以前谈到过的另一种有关合作道路的想法，即苏联向我国商学院派遣留学生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无权说明哈佛商学院每年到底可以接纳多少留学生，但我认为，每年接受一定数量俄国申请者是完全可行的。

緬 苏联有一些培养各级管理人员的商学院。但我同意有些渴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真正去美国受训或至少接受部分训练。我们有些学生已经前往你们的商学院，其中有一二名在哈佛商学院毕业，但毕竟寥寥无几。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人利用这种可能性，那将会大有裨益。

加 如我们所说，我们必须关注，不让他们被戈尔德曼、萨克斯公司挖去。

緬 希科夫博士，我以为这项合作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我想，从我们的观点看——或者至少从某些美国企业家的观点看——一个有利的方面是我们不必担忧我们是在树立一个新对手，不必担忧你们将成为一个新日本。我认为，我们对我们与苏联竞争的能力可以持颇为乐观的看法，这种想法对吗？

緬 你使我感到意外，加尔布雷思教授。在我们先前的若干次讨论中，你曾说你是个国际主义者，对日本或西德跨国公司打进美国市场，或者其实是买走戈尔德曼公司、萨克斯公司和华尔街其他所有公司，你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然而，认真地说，苏联接管美国经济的危险是遥遥无期

的；如果我是你，目前决不为此焦心。

加 现在，让我们接着谈谈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将从双方合作中得到什么，因为我喜欢把它看成一种双方交易。如果我们扩大与苏联的贸易，我们可以指望为我们的消费品扩大市场，对吗？

缅 那是完全可能的。一旦我们扩大了我国在国外市场上销售的潜力，和在那些市场上赚取硬通货的能力，我们将能购买多得多的我们需要而美国有的无论什么消费品和生产成品。

加 我们的农产品也会找到一个更有保障的市场吗？

缅 那也有可能，而且也许更复杂一点。眼下，我们只向你们购买小麦和玉米，因为我们自己的农产品产量不足。将来，这种交易可能会更加复杂，包括美、苏双方生产的其他农产品。

加 我想，我们的另一种特别成就是我们经济中目前显得最繁荣的领域，那就是大型服务企业。

缅 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加 我想到的是服务业和特许经营活动。这些经营活动已在很大程度上进入欧洲，甚至在日本也小有所成，而现在则有进入苏联的大好机会。我设想就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红场上有个麦克唐纳公司。

缅 我国已有麦克唐纳产品迷和其他类似企业。但我想告诉你，我对你们试图把我们驱往的方向有点担心。在最近几年中，西方不向我们出售高级技术。我必须说明，苏联经济希望从扩大贸易中获益的主要途径之一将是进出口高级技术。我觉得，你们正试图迫使我们走向麦克唐纳模式而背离

高级技术模式。这是否是美国政府目前在东芝事件中所干的事情呢？^①

加 我并没特别把你们限定在麦克唐纳模式上。我认为你的指责不公平。你提出的这个论点，在最近几年和几个月里，我曾与我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同事谈到过。我赞成与你们国家进行远为宽松的技术知识交流，并售予你们更多的尖端技术产品。

垄断自己开发的技术成果是当代神话之一。就某些军事武器而言虽有可能，但也不多。正如我想我已提到过的那样，技术开发的突出特征，是闪电似地跨越国际界线。一个国家想采用某种方式将其垄断是最大的幻想之一。因此，我完全同意超越麦克唐纳模式，在发展技术、科学和工程方面展开大范围的合作。

编 东芝事件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五角大楼叫得特别厉害，认为日、苏间的贸易危及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但是，让我给你举一个显然没有战略意图、但仍被你们搁置起来的例子。最近，苏联申请参加多种纤维协定，这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统制纺织品国际贸易的一个协定。目前，纺织品不是战略商品——绝对与国家安全利益无关——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报告，说是五角大楼日益关注我们参与这种贸易的可能性。

近来我们还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美国政府宣称不会予以支持。我认为这种态度应该改变，所有这些对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设下的人为障碍都应该消

^① 美国政府对日本售与苏联先进技术表示强烈反对。

除。

加 我同意。

緬 除非这些限制被取消，我们没有办法与西方国家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加 我也同意。而且，我确实认为这会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合作领域。我不了解多种纤维协定，但我不觉得苏联知道我们的长绒棉甚或尼龙织品将构成巨大的战略危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员资格问题，也是应该予以考虑的。但让我们看得更远一点。为了更进一步合作，苏联应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资格，你认为那可能吗？

緬 戈尔巴乔夫先生最近相当坦率地表示，我们自认为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我先前指出的，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使货币可以兑换。没有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正参加其活动）在内的资本主义货币管理部门的合作，我看不出我们如何能达到并维持这一目标。

我还必须指出——而且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特定方面——苏联是黄金生产大国，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二大黄金生产国，尽管我知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机构采用的办法，黄金失去了流通价值，但它仍不失为货币市场和金融事务领域的重大要素。我认为苏联会对黄金的前途和价格发生的变化具有浓厚的兴趣。

加 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是我们应予以考虑并欢迎的事情。至于黄金，我认为它现在不具有重要的货币价值。我也不希望它与货币的重要性同步增长。目前，在一个被认为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黄金是一种最后的价值手段；

而且，当然是投机的主要对象。我反对恢复金本位制，也反对黄金价格超过惊恐而神经质的人们和投机者抬起来的价格的任何措施。

緬 是否里根政府有一个时期曾考虑恢复金本位制？

加 我在先前的谈话中说过，我不是里根先生经济政策的虔诚支持者。

让我也提出一个合作形式。今后，不要用贸易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我认为，以往美国比苏联更频繁地采取这种行动。它是不成功的，而且我认为激起了起反作用的对抗性。我们已提到过小麦禁运、反对帮助苏联建设输油管的制裁和杰克逊—瓦尼克法案。这个法案拒绝在苏联人权问题大大改善以前，在贸易方面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如我指出过的，我是人权的坚定支持者，但我认为那种做法不会解决人权问题。

我想接着谈另一个方面，即我所希望的，对双方都有利的更大合作，这就是科学和文化交流。以往，当人们谈到改善对苏关系时，有把这种合作看作最不容易引起争论的项目而求助于它的倾向。提倡文化交流一直是作为有点心灰意冷的慰藉。然而，我认为这方面的交流仍是重要的。你是否认为科学和文化交流对我们双方都有利呢？

緬 1958年初签订的美、苏科学交流协定，规定双方定期进行多方面的科学交流。苏联科学家来美国大学工作，美国科学家到苏联大学和科学院研究机构中工作。

这些年以来，有相当多的人进行过交流。我必须说，这个在我父亲任苏联驻美大使时开始实施的协定是极其成功的。过去30年中发生的一切政治危机，都没有使它中止。

我记得，我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按交流计划来到贵国的。那时，我正在完成拙作《百万富翁与经理们》；虽然当时古巴危机使每个人忧心如焚，但它丝毫没影响学术交流。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征兆。

但是，我也认为，根据这个协定设想的那种交流极为有限。它们仅和少数在对方国家工作的学者有关。我认为，在关键领域开展更广泛的科学交流，对我们两国和整个人类都是重要的。

加 让我们顺藤摸瓜。在哪些更广阔和更特殊的领域我们可以采取联合行动呢？

緬 其一是开发新能源——太阳能、潮汐能、包括温泉水在内的地下能源，以及核聚变。核聚变是我们两国多年来探究的课题，而我必须说，一直未取得重大成功。我们两国利用核聚变发电的工厂一直是没多大成效的。

加 你认为我们合作也许能保证再不发生类似切尔诺贝尔灾难吗？

緬 不。我指的是一种全新的核工厂。当前，运转着的核工厂使用的是铀和它的各种同位素那种较常规的原子能资源。当我谈到核聚变时，指的是将氢弹而不是原子弹作为民用。原子能发电厂现已制度化。虽然应该更安全一些，但在许多国家中，它们已经在大量发电。核聚变工厂是建立在氢弹聚变原理上，而不是建立在原子弹裂变原理上的。

加 我认为这种讨论有点好高骛远。我认为我们目前只应该讨论一些不那么宏伟的事情。我对任何意义如此深远的开发事业感到不容易。我们这时能不能只谈医学上的合作呢？我们双方都为致癌的环境因素苦苦折磨着。我们目前和将来

都有艾滋病问题。我希望我们只谈这一类问题，而不去探究氢弹的经济潜力。

缙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与原子能工厂运转有关的安全和保障问题也十分重要。当然，我们极其感谢你们的人夫在切尔诺贝尔灾难中给予我们的帮助。这是由贵国主要实业家之一阿曼德·哈默支持的美方民间的主动精神，但是，如我所说，这是我们充分合作的一个实例。它还导致了我国在设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中与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加合作，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条例，以保证当今运转着的原子反应堆的安全。请允许我再略谈谈聚变问题。

现在，美、苏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工作都在开展。我同意那种能源是会带来危险的，但因为工作正在进行，就必须有一种确定的合作制度。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值得花时间继续研制它。如果继续研制，我们必须在核聚变投入使用前决定应当发展什么安全程序。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有必要使用那种肯定代表未来文明世界巨大潜力的能源。我们必须停止这种开发吗？还是应该促进它呢？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决定的事情。我们两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合作决定。

加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你和我都曾试图把我们的讨论尽量保持在实用范围内，而我认为核聚变的管理问题有一点越界，也许太不切实际。

缙 这是我们两国政府首脑近来在高级会谈中讨论过的问题，因此应该认为它具有实际可能。而且因此我们同法国政府就同一问题交换了意见，虽然还没签订协议，至少它已是会谈已经开始的一个领域。

加 探讨一个远为现实的话题，即在教育领域进行更多

的合作怎么样呢？对现在每年我国有那么多教师，尤其是大批学生去你们国家旅行，你们国家那么多学生访问我国，我感到相当高兴。我们不应致力于这个领域的更多合作吗？

緬 我认为完全应该。今年夏天，我在美国佛蒙特州结识了几个正计划带着他们的中学生去苏联的教师。他们进行着详细的准备，打算去我国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他们非常仔细地列出他们希望访问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时感兴趣的方面。

我认为继续这种交流特别重要。近来，一大群美国俄语教师去苏联旅行，他们感兴趣的是我国如何教外语。他们访问了我国许多所学校，并且在研究我国现用教学法方面取得真正第一手经验。

旅行快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先生接见了他们，表现了我国政府极为关注这种事情。我认为必须更多地开展这种交流。双方必须对对方的文化和语言有更多的了解。

加 在维护里根总统方面，我应该更坚定些。我想指出，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他向今夏来纽约州北部地区肖托夸访问的230名苏联人发表了演说。我对此非常高兴。

现在，我可以谈谈我考虑得很多的事情吗？这是指我们可以称为娱乐时代的合作。美国一直对我们如何从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开展着大量讨论。我将修正说我们已实际进入娱乐时代。人们有了充足的商品后，就追求精神享受——美术、音乐和文学方面的享受。

回溯往古，俄国一直以其艺术成就而骄傲。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苏联戏剧、写作、芭蕾舞以及一般艺术中获得更多的教益，而且作为同行，也希望将来给你们介绍大量经验。

緬 对。我拥护。尽管苏联人在物质商品方面还未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程度，但他们历来信奉出自《圣经》的教训：人不能仅仅满足于面包。他们喜欢阅读美国的文学作品，聆听包括爵士乐、流行歌曲和更严肃的古典音乐在内的美国音乐，看更多的美国电影，欣赏你们的歌剧和芭蕾舞剧，甚至在食物和汽车的需要得到满足前，他们就想得到上述享受。

加 你们愿意接受我们某些从文化上说比较堕落的电视，对吗？

緬 在电视方面，我们已进行大量交流，我本人参加过相当数量的美国节目。

加 那是些比我所指的节目水平更高的节目。

緬 目前，苏联电视经常演播被称为空间桥梁的节目，举行列宁格勒和洛杉矶、莫斯科和波恩或第比利斯和巴黎公民之间的讨论会。这是些实例，说明在卫星通讯时代，从技术上说，人类能够做些什么。

加 我想我们还应该谈谈旅游业，毕竟，这不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行业。你认为这方面有哪些可能性呢？

緬 在苏联，旅游业正迅速发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我国，更多的苏联公民前往海外。我认为，除了旅游的愉快和欢乐外，从个人角度来看，增加了对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这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努力。

加 你们货币的可兑换性怎么样？在我们能接受大批苏联游客来纽约和黄石公园旅游之前，这不是必要的吗？

緬 是的，不错。现在，任何出国的苏联游客都有可能兑换足够支付旅行费用的外汇。但是，如果游客数量增大，我们将出现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如我谈到过的那样，扩大对

外贸易，特别是与西方的贸易，将提供与其他国家兑换货币的更大可能性，对旅游者来说尤其如此。

目前，我们不可能学你们美国那样，允许日本人盘进我们的生产设备和银行，以使他们同意为我们的旅游业支付费用，为我们的公民出国提供资金。你们也许不为那种情况担忧，但我们为我们的经济可能出现日本化或美国化忧虑。我们希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加 因此，你们打算暂时让旅游者继续在国内旅行吗？

缙 不，我们打算发展旅游业。随着贸易发展，旅游业将扩大。我们只是使旅游业适应于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加 我们能否预想把美国人和西欧人在苏联旅游的总收入交由第三者保管，以允许同样数量的苏联旅游者去西欧或美国呢？我们可以将此看成独立的交流项目，这需要一点计划性，但结果将是更多美国人去俄国旅游——我本人从中获得了极大享受——将有更多可供苏联公民去西欧或美国旅游的资金。

缙 那可能有所助益。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很高兴，经过我们讨论后，你开始看出计划的好处。

加 我不反对计划。

缙 你应该知道，加尔布雷思，为了接纳更多外国游客，我们将必须修建相当数量的饭店，发展我们的公路建设计划。

加 这样，我们又可以在修建饭店方面进行合营。能不能共同修建一些度假旅馆、希尔顿饭店和马里奥特饭店呢？

缙 希尔顿饭店和马里奥特饭店大概将修建在中心城市，至于度假旅馆，一般必须修建在公路沿线。眼下，我们

没有足够公路允许我们建立度假旅馆式企业，因此，我们可以合作的另外一个领域也许是公路建设。

加 我想这是对的。不过，我们可以合作的最好办法是敦劝你们在这方面更理智一些。我国在牺牲原本很好的铁路网的情况下铺设了长距离的公路，使铁路网现在可悲地处于衰败状态，得不到修理。我并不想对社会主义世界提出劝告，但我希望你们不犯我们这样的错误，为铺设高速公路而不顾你们的铁路系统。我希望你们继续大量投资修筑铁路，即便牺牲公路也不足惜。

编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们还没有淘汰我们铁路的打算。如果几年内你仍想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快车进入我国，它肯定将在那儿等待你。但我想你不是想驾驶轿车从我们的一条横贯大陆的公路上穿越苏联吧？

加 绝对不是。无此愿望。我将享受乘火车旅行的乐趣，但在一条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高速公路上旅行的想法强烈地刺激着我。

编 我们必须看看是否还有美国人、西欧人和日本人也想那样旅行。

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过境人口的增长，我们必须提防诸如疾病和毒品那样一类东西进入我国。

最近 20 年里，国际毒品运输量的确已急剧增加。你也许会为此感到吃惊，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每 100 名男人或女人中，就有一名瘾君子。他们占世界总人口的 1%，或者说有 5000 万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散布和跨海越洋销售可卡因、海洛因、粉蓝烟叶、大麻和其他毒品的地下帝国扩张之故。毒品贩卖已成为多国贸易。我们

正日渐到达毒品也许会成为农产品市场上比土豆和黄瓜更易购得的境地。这是一种巨大威胁，对年轻一代和整个文明来说，尤其如此。

加 你肯定不是建议为了控制毒品而停止旅游吧？

缅 不，我谈的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在控制那种特殊地下活动方面，我们应该开展包括美苏联合行动在内的更多国际合作。

加 我完全同意。

十五、合作的项目：结束语

緬 我们谈过更多地开展医学方面的合作，我对此感到满意。在苏联，我们非常关心反酗酒的斗争；与此同时，吸毒问题也让人揪心。我有个当医生的女儿，目前正在积极参加那个特殊领域的活动，但我觉得，仅靠医学界努力是不够的。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必须共同努力抑制生产毒品和对我们社会如此危险的地下帝国。

加 的确如此，这是一个急需探索的合作领域。

那么，我们联合起来保护环境、保护海洋、保护大气层，并致力于我们已提到的其他方面合作，你看怎么样？

緬 我还是想加上核工厂的安全。

加 为的是不再发生美国在三里岛发生的灾难、以及你们在切尔诺贝尔发生的更大的灾难吗？

緬 我绝对赞成这种合作。实际上，我们的报纸最近曾这样指出：我国原子能工厂的安全措施已有了许多改进，但有些装置仍可怕地落后。

加 在美国，原子能工厂的安全措施也是个令人严重关注的问题。我们核工厂的建立，不是在较高权力机构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而是在地方公用事业公司有时非常轻率甚至可能不合格的管理下进行的。我们打算将来比过去做得好

得多。

緬 还有一个我想谈谈的领域，这就是在可耗竭资源方面的合作。地球上矿物资源的蕴藏量是有限的。将来某个时刻——也许100年，也许150年，我不想贸然作确切的预测——我们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这就是我们需要开发新能源的原因，需要探索包括通过科学研究制造的超导材料和其他新物质在内的新原料来源的原因。

我们还必须共同走向空间，走向月球或其他行星，去寻找新能源。这一切势在必行。这也是你指出过的带点幻想的领域，或者至少是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将发生什么或如何发生的领域。我们真正知道的是，现存矿物资源将在某个时候濒于枯竭。这就是我们甚至现在就应该共同就资源管理这个特殊领域开始合作工程项目的原由。

人口持续增长是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目前，世界总人口稍稍超出了50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下世纪初将达到100亿。然后，如果我们认可联合国非常乐观的预测，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停止增长，那时人口将在100至150亿之间。

那将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数字，但是，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相应提高时才会是稳定的。

加 你说是较高的生活标准消除多生孩子的压力吗？

緬 不错。这是普遍承认的事实。控制人口有些不同的办法。我们知道，有些办法目前在中国特别成功。中国最近正式宣称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使其维持在一定数量上。尽管数量仍然不少，但比如果不作这些努力要少一些。不过，在世界其他地区，人口控制措施不一定是成功的。

这里，我们有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说，一方面，事实证明，如果生活标准提高得更快，人口将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准上；另一方面，生活标准越高——第三世界国家越接近苏联或美国的消费水平——世界资源将越枯竭。为了未来，全世界必须自觉地保护我们的资源。

加 我认为，这方面需要有计划。我还认为需要仔细设想一种生活标准，根据此标准，我们可以比目前较少大规模地消费可耗尽的资源。我们的生活标准在未来某个时候必须适应可以得到或可能被发现资源。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现在，只有少数国家，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日本、西欧和苏联，应对即将耗尽的资源负责。也许，我们这些国家享有的生活消费标准将不得不改变。

缅 我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看来不仅是我们逻辑上的错误，而是一个真正的矛盾。我们谈论在其他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还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面向消费经济的必要性，接着却又谈论如何避免现存消费社会的必要性，因为目前地球上的资源不可能无限期地按照现状维持这种社会。这似乎表明，世界文明面前没有一条非常轻松的道路。

加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共同呼吁的问题。我们还是谈谈另外两个问题吧。

我们刚才谈的是世界上不那么幸运和发达的地区。毫无疑问，短期内这些地区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基本生活条件（生活标准）的改善。我们两国能为此做点什么呢？让我提一、两个建议。

首先，我们要努力纠正我们造成的、很不光彩的不幸事

件。这一事件我先前提到过，即向第三世界出售武器。

緬 我认为，我们双方已同意对此应加控制。这是必须由我们政府来完成的事，但必须完成。

加 作为第二步，我们必须设法将目前作为军事援助提供给这些国家的一些资源，花在武器方面的钱，转用于改善和支援它们的经济生活。

緬 这是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建议和支持的事情。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似乎没有向达成协议前进一步。但是，最近苏联提出了一个新建议：用缩减下来的武器开支的一部分向发展中地区提供各种补充经济援助。顺便提一句，包括法国在内的有些西方国家已表示支持我们的建议。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也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加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不是特别好商量的。然而，我确实认为，美国有一个极为流行的观点，赞成对象巴基斯坦这样非常贫穷的国家少给军援，多提供经济帮助。因为对巴基斯坦减少军事援助，我们就可以缩小印度把钱花在武器方面的表面需要。当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一切的实现有赖于你们找到一个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办法。在某些方面，那里的战争成为更多武器投入那个地区的借口。

緬 我希望美国政府也能在那个问题上起作用。

加 我也这样希望。现在，最后，我要强调我们先前讨论过的某些事情。我认为，最重大的需要是我们在缓和我们两国间紧张关系方面的合作。这将导致一个有效的武器协定，一个范围远远超过目前正在讨论的内容的协定。我们希望双方以及其他甚至更需要的地区大幅度削减武器开支，并将资源转向民用

目的成为可能。我视此为我们合作的根本目的。

緬 同意。我还视此为影响我们最终充分合作的条件之一。如果继续展开军备竞赛，如果紧张关系增强，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语重心长地讨论全球和平的未来、一个所有种族和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可以通力合作奔向更美好世界的前程。

关于作者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与经济学结缘始于1931年他在伯克利大学作研究生的年代。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教过书，而大半生时间则在哈佛大学度过。现在，他是哈佛大学的**保罗·M·沃伯格**经济学名誉教授。他从事公职始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政府时期，当时他负责组织战时物价管理体制，并在制订与执行战时经济政策中起重要作用。从此以后，他还任过许多公职，包括**约翰·F·肯尼迪**政府的驻印度大使。

加尔布雷思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他是50人的美国艺术与文学学会负责作品的成员，新近任美国艺术与文学学会及研究所联合体主席。他的三大著作——《富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是近几代学生经济学知识的可观来源。这几部书和其他一些著作，被译成十余种语言，销售量达数百万册。

加尔布雷思教授因的战时服务曾被授予自由勋章，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最近授予他荣誉军团三等荣誉勋章。加尔布雷思一家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夏天则住在佛蒙特州的一个老农场上。

斯坦尼斯拉夫·福希科夫 61岁，是在布拉格出版的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杂志《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编辑部成员。在他的一生中，曾有过近于独特的机会，把苏联经济知识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知识结合起来。在他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从事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行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苏联科学院的赞助下，他在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利用投入——产出模式，从事美国、日本和苏联的计量经济学比较研究。他也宣讲西方经济中长波或孔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作用。他的著作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包括《百万富翁与经理们》、《经济危机周期》，还有新近的《没有前途的经济吗？》。

缅希科夫曾离开过他的比较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但他的兴趣仍然在这方面），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任职6年，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国际部任职6年。他已婚，前已提到，现居布拉格。他是赫鲁晓夫年代很受人尊敬的苏联驻美国大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缅希科夫的儿子。